

# 从华小师资短缺 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

引言：李金桦、李彦葶、黄先炳

■ “从华小师资短缺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座谈



# 《独中教育研究期刊》简介

董总每两年举办华文独中教育研讨会和“教享悦”教学成果分享会，随后把独中教师和关心独中教育的专家学者们的宝贵学术研究成果，汇整出版为《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随着上述教育研讨会和教学成果分享会已成为两年一度活动，配合独中教改事务的推动，以及进一步深化独中教研工作，董总已经把《教育研讨会论文集》转型为《独中教育研究期刊》（电子版）。此研究期刊旨在提高独中教育学术研究形象，提供独中教育学术交流平台，扩大独中教育学术研究影响力，以及汇集独中教育学术研究成果。

《独中教育研究期刊》是一份由同行评议的电子期刊，每年出版两期，且邀得国内外专家学者组成涵盖各项教育领域的编辑委员会。欢迎教师和学者投稿，以华文、马来文或英文撰写研究报告。研究内容包括独中教育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评量、管理等。

**独中教育的  
现实与理想**

2015年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Malaysia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5

**独中教师的  
实况与演进**

2017年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Malaysia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7

《独中教育研究期刊》  
(电子版) 网址:  
<https://micss.dongzong.my>

**MICSS**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独 中 教 育 研 究 期 刊

馬來西亞  
教育評論



# 目录

1 编辑弁言

## 本期专题：华小师资短缺与培训

---

- 3 “从华小师资短缺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 引言：李金桦、李彦葶、  
座谈 黄先炳  
整理：谢春美、张碧之、  
沈天奇

## 纪实叙事

---

- 40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57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中文翻译版）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  
联合会  
73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发展规划 沈天奇

##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

- 109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华教巨人郭全强 整理：林玉娟、谢春美

## 书评

---

- 135 达祖丁著作 庄华兴  
《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与构想》读后  
145 柯嘉逊著作 洪敏芝  
《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  
理解华教运动者立场的入门书

151 征稿启事

152 撰稿体例





## 编辑弁言



由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师资短缺等问题长期未获解决，董总和教总等民间团体于2020年联合成立“我要当老师”工委，进行各项工作，鼓励更多人申请就读教育部师范课程，以成为华小和中学的教师。

因此，本期主题聚焦于华小师资短缺和培训课题，特此主办“从华小师资短缺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座谈，邀得李金桦、李彦葶、黄先炳为座谈引言人，分享心得，并与出席者交流。此座谈提及的内容包括：教育部当前采用的根据各科目来培训小学教师所引发的问题，并提出未来较理想的小学师培方式；华裔青年对教师行业的了解和认同课题；华小师范课程申请人数不足，而且所出现的偏科申请现象导致热门学科课程的许多申请者被淘汰，以及冷门学科课程的招生名额未能填满；许多申请者在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KCG）和面试这两个环节不过关；除了现有常用的争取策略，也需探讨采用其他争取策略，例如与相关的各层级政府机构互动，以加强处理师资短缺等华教课题；教育部师培机构、课程和录取条件的改变，对华小师培的影响；需关注师范学院华文讲师流失问题，增聘足够的华文讲师；政府保送一些优秀的马来裔学生到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交际华语毕业回国后面面对的调派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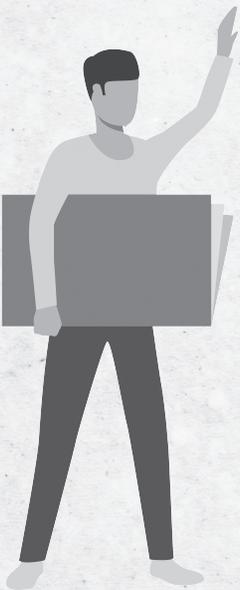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介绍了教会学校的发展历程和办学特色，以及改制为国小和国中后所面对的困境。该文提到了与政府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和执行难题，以及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团体和教会学校董事会探讨了教会学校的未来，并为此制定了10年策略蓝图（2019-2028年），包括推动创办具有教会学校特色的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

沈天奇〈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发展规划〉通过众多统计表讲解教会学校现况，以及教会等团体协同推动创办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的进展。文中亦提及学校拥有权和学校土地拥有权、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分别，并指出其中出现的误解。这些因教育部政策和行政措施所引发的误解和偏差，损害教会学校的权益和发展，更造成一些教会学校从教会学校名单中除名，成为“失落的教会学校”，导致教会学校数量日渐减少。

林玉娟、谢春美整理的〈华教人物口述历史——华教巨人郭全强〉介绍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先生的家庭背景，以及从童年、青年到参与社团活动和华教运动的生平事迹和领导特质。本篇列入郭主席太太梁丽明和孩子郭家伦的口述。此外也纳入董总前副主席许海明、前财政林国才和居銮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三人曾与郭主席共事多年，以及对其评价。

董总曾于2020年为达祖丁著作《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与构想》和柯嘉逊著作《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举行推介礼。本期邀得庄华兴副教授和洪敏芝博士分别对达祖丁和柯嘉逊的著作进行书评。有意者可游览董总书坊网页（<https://publisher.dongzong.my>），或拨电03-8736 2337（分机276、213），或电邮至info\_publishing@dongzong.my，以订购这两本著作。



# “从华小师资短缺 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 座谈

引言：李金桦、李彦葶、黄先炳  
整理：谢春美、张碧之、沈天奇

## 一、缘由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长期面对的各种师资问题至今仍未获解决。2020年，董总和教总等民间团体联合成立“我要当老师”工委，进行各项工作，鼓励更多人申请就读教育部师范课程，以成为华小和中学的教师。

为此，本期《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的主题聚焦于师资课题。本刊编委会特此主办“从华小师资短缺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座谈，邀得三位熟悉师资课题且拥有相关实践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分享心得，并与出席者交流。有109人报名参与此线上座谈。本座谈不设新闻媒体采访。

董總邀請您參加線上座談會

董總  
DONG ZONG

## “从华小师资短缺 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内部座谈

引言人：李彦葶  
(教师教育学院师资培训负责人)

引言人：黄先炳博士  
(教师教育学院华文课程讲师，  
前员培训课程编拟指导专家)

引言人：李金桦先生  
(教总师资教育主任/  
“我要当老师”工委主任/  
前华小校长)

主持人：刘荣禧老师  
日期：2021年3月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时正-4时正(请提前10分钟入场)  
形式：ZOOM云视频会议

- 活动： “从华小师资短缺谈我国师资培训方向” 座谈  
日期： 2021年3月6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30分  
形式： ZOOM云视频会议  
主办：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编委会  
主持人： 刘荣禧老师  
引言人： 李彦葶女士（师范学院总院师资培训课程协调员）  
黄先炳博士（师范学院华文科卓越讲师， 师资培训课程编拟指导专家）  
李金桦先生（教总师资教育主任/“我要当老师”工委会主任/华小前任校长）

## 二、座谈发言内容记录

### （一）引言人发言环节

刘荣禧： 有请李金桦校长发表师资课题的引言。

李金桦： 今天的分享将分成三个部分： 一、目前师资短缺概况； 二、教师学士课程（PISMP）面对的招生问题； 三、教总针对师范课程和教师调派的看法和建议。

#### 1. 目前师资短缺概况

根据教育部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统计，目前华小共有1,334个师资空缺需要填补。在最近两、三年，每逢华小新学年开课时，都会出现约1,000多个师资空缺。每年退休的华小教师约500人，这不包括教师申请提前退休、获得升级等因素而出现的空缺，这些因素都会进一步增加华小师资空缺。目前，华小师资主要有两个来源，即5年制教师学士课程的毕业生，以及公立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如果是非教育系的公

立大学毕业生，则可以担任临教，并参加假期师资课程，受训成为合格的教师。

## 2. 教师学士课程（PISMP）面对的招生问题

### 2.1 师范课程招生名额未能填满

近几年，教师学士课程华小组招生名额一直无法被填满，这是一个大家必须正视的问题。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院（IPGM）根据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BPPDP/EPRD）的师资计算法来培训教师。因此，如果华小组的每年招生名额未能填满，长期下去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虽然于2019年和2020年，教育部进行了两轮招生，可是华小组的招生名额依然未能填满。

师范学院华小组师训学员招生名额和录取人数

招生年份	毕业年份	招生名额	录取人数	差距
2019年6月	2024年6月	1,460	1,054	-406
2020年9月	2025年9月	1,220	865	-355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2019年7月21日），中国报（2020年8月28日）。

2019年6月，华小组有1,460个师范名额，最后录取了1,054名学员，尚剩406个名额未能填满。2020年9月，华小组有1,220个师范名额，最后录取人数为865名学员，尚剩355个名额未能填满。未能填满名额的师训课程主要为设计与工艺科、美术、体育和音乐。由于这些课程的申请者本来就并不多，再经过面试阶段被淘汰，最后成功被录取的申请者已经所剩无几。例如，2019年6月华小组体育课程有80个名额，只获得27人申请；华小美术课程有70个名额，只获得24人申请；华小设计与工艺课程有50个名额，只获得21人申请。华裔子弟不申请上述课程的原因，包括对有关课程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大部分偏向申请华文、数学、科学等科目。

## 2.2 师范申请者在教师人选资格测试环节不过关

近几年，很多申请者在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jian Kelayakan Calon Guru, UKCG）环节不过关，而无法参与师训课程。有关的心理测试主要是衡量申请者的个性特征、能力倾向，以及是否具备担任教师的素质。例如，在2019年6月，教育部开放6,000个名额，以招收各源流小学师范课程的新学员。符合资格参与UKCG的申请者有25,995人，可是经过这个心理测试后，符合面试的申请者只剩下13,674人。换言之，大约有50%的申请者被淘汰，最后录取的人数为5,533人。

2019年6月的华小组师范课程，一个名额有两位申请者，意味着每位申请者有50%的录取率。其他源流小学的师范课程，一个名额有十位申请者，换句话说，每位申请者只有10%的录取率。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华小师范课程的申请并不踊跃，反应不甚理想。对于如何应对UKCG，来自霹雳州的莫顺生先生对这一方面较有研究，“我要当老师”工委会希望能邀请莫先生为我们进行讲解，以便我们能协助申请者更好地应付相关测试。

## 2.3 无法获得教育部提供全面的资料

为了解决师范课程华小组的具体招生情况，教总多次向教育部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和数据，包括华小组各个课程的报名和录取情况、在笔试和面试阶段的录取人数，以及新学员报到的情况等，以作为推动华裔子弟申请报读师范课程的重要资料。虽然教育部会在媒体上公布师范课程的招生情况，但所获得的数据不完整，只能从中获取部分资料作为参考。

# 3. 教总针对师范课程和教师调派的看法和建议

## 3.1 教师学士课程华小组招生名额未能填满课题

教师学士课程华小组招生名额无法填满，是值得大家正视的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这是由多个因

素造成的，例如没有通过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KCG）和面试，华裔子弟对投身教育行列的意愿不大等等，这些都值得大家深入探讨，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需要结合各方力量加以解决。因此，教总联合董总、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和国民型中学发展理事会成立“我要当老师”工委，展开各项工作，推动更多华裔子弟加入教师行列。希望教育部能够和“我要当老师”工委配合，提供有关师资的具体资料，协力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2020年，在吉打董联会和雪隆董联会的配合下，“我要当教师”工委在吉打、雪隆地区进行了4场师范课程讲解会。在此也呼吁各州董联会举办类似的讲解会，让家长、华社、华教工作者对师范课程有更深入的了解，鼓励更多华裔子弟报读师范课程。

### 3.2 规定教师学士课程华小组学员副修华文

除了主修华文的学员在受训期间还能够有更多时间接触、学习华文，华小组其他主修科的学员都是以马来文或英文为主要的上课媒介语，而华文只是选修课，没有规定一定要副修。为了符合华小的实际教学环境的需要，教育部应规定教师学士课程华小组学员在5年修读课程期间必须副修华文。教总已多次向教育部提出此建议，但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关注，问题未能获得解决。

### 3.3 培训更多双语资格的华小马来文教师

教育部应培训更多具备双语资格的华小马来文教师，因为这是华小非常需要的师资。虽然教育部规定教师学士课程华小马来文组申请者须有SPM华文资格，但是据了解，华小马来文组的大部分学员都没有华文资格。根据教育部的师资调派，除了一、二年级的华小马来文教师必须有双语资格（马来文和华文），其他三至六年级的马来文教师是不需要具备这个条件的。这也导致派到华小的马来文教师只能教导马来文，但若让他们负责教导体育或美

术等科目，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教总上周接获类似的投诉，一位副修数学和体育的教师派到华小，但是因对方不谙华文，所以无法教导这两个科目。

### 3.4 小学师范课程应以语文、数学和科学为主修科目，美术、音乐、体育等为副修科目

师范学院的教师培训是根据小学各科目来培训，因此有数学组、音乐组、美术组等。实际上在中学阶段落实这种的专才方式来培训教师较为符合实际的教学需求。但是在小学阶段，以这种方式来培训教师并不实际，也造成在教师教学科目标签（*Tagging, pelabelan guru*）方面引发许多问题。因此，小学阶段的师资培训应以语文科、数学和科学为主修科目，而把美术、音乐、体育等列为副修科目。

### 3.5 新晋教师调派问题

近年来，教育部在处理新晋教师的调派工作一拖再拖，加剧了华小师资不足的情况。例如，在2020年6月，师范课程华小组有681位学员毕业，但却迟至2021年2月15日才派到学校执教。教总认为，明明已经有了现成的教师，可以马上填补空缺，但教育部却没有加以善用，导致学校的空缺无法获得填补，不但影响学生的学习，无形中也形成一种资源的浪费。

刘荣禧：现在请李彦葶讲师发言。

李彦葶：基于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却又经常听闻华小师范课程招生名额未被填满，华社纷纷忧心忡忡。请容我展示数据作进一步说明。

#### 1. 华小组师范课程申请与录取概况分析

根据《2019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师范学院总院学生事务局年度报告》，2019年6月教师学士课程总申请人数达51,213人，最终获录取人数为5,533人。

2019年6月教师学士课程招生名额和录取人数

事项	数量
招生名额预估	6,000
申请人数	51,213
符合资格参与教师人选资格测试的申请人数	25,995
符合面试的申请人数	13,674
录取人数	5,533
未填满名额	467

资料来源：《2019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师范学院总院学生事务局年度报告》。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联同数个华教团体，在一项呼吁华裔子弟报读教师学士课程的记者会上向媒体披露<sup>1</sup>，2019年师范学院教师学士课程招生，预留1,464个名额给华文小学师资，第一轮招生约有1,800人申请，其中1,238人获面试机会。由于尚未填满名额，教育部开放第二轮招生，有208人申请。经两轮招生后，最终有1,054人获录取。

以上述所公布的数据作粗略计算，2019年师范课程华小组有2,008名申请者，当中1,054人获录取，可得出华小组师资招生录取率为52.5%。反之，其他源流学校有49,205名申请者，获录取4,479人，可得出其他源流小学师资招生录取率为9.1%。简言之，可作更形象具体的理解：以100名申请者来说，若是申请其他源流小学的师范名额，有10人会被录取；若申请华小师范名额，则有60人会被录取。以此录取率作结论，华小组申请者的录取机会还是相对高。

<sup>1</sup> 〈王鸿财：统考生教师课程腰斩 师范华小华文组没招生〉，《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时事/王鸿财统考生教师课程腰斩-师范华小华文组没招生>），2020年3月7日。

〈师训选辅修 也能进华小〉，《东方日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0/03/07/330025>），2020年3月7日。

2019年6月教师学士课程收生概况分析

事项	华文小学	其他源流小学	总数
申请人数	2,008	49,205	51,213
录取人数	1,054	4,479	5,533
录取率 (%)	52.5	9.1	10.8

此外，数据亦显示2019年申请教师学士课程的总人数是51,213人，其中2,008名是华小组申请者，从这可以推论出华小组申请者占总申请人数3.5%。各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华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2.8%。华小组申请者向来以华裔子弟为主，区区3.5%的华小组申请人数，说明华裔子弟申请师范课程的人数太少了，跟华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率根本不成正比！华裔子弟不踊跃申请师范课程是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的问题根源所在。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何华裔子弟对教师一职兴趣缺缺？看看我们身边的华裔家庭，有谁家的父母会希望自己孩子的首选职业是当老师呢？还是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当上律师、工程师、医生、或者创业赚大钱？然而，在友族社会则恰恰相反，教师是一份相当受尊敬、地位崇高的职业。友族家长都视自己家庭成员有教师而感到骄傲自豪。

因此，若想鼓励更多华裔子弟投身教育事业，我们必须重塑教师在华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份召唤华裔子弟投身教育工作的使命，不是单靠一个人或一、两个组织所能够扛起，而是需要靠整个华社，你、我、他……大家一起努力！我认为，以目前华小组录取率相对高的现象，只要有办法吸引更多华裔子弟报读师范课程，能够让申请人数翻倍，则华小长期面对的师资短缺问题有望获得进一步改善。

## 2. 加强校方与教育局的沟通

容许我展示网络新闻平台一篇报道〈华小师资短缺老问题，JPA与校方数据反差大〉<sup>2</sup>作进一步解说。

<sup>2</sup> 〈华小师资短缺老问题，JPA与校方数据反差大〉，《热点》，（<https://xuan.com.my/hotspot/华小师资短缺老问题-jpa与校方数据反差大-56681>），2020年12月29日。

蕉赖某所华小临教告知，每次学校出现师资空缺，校方都会上报教育局，但政府有无派新教师来填补空缺又是另一回事。他亦指出，该校缺8至10位教师，都是家教协会出钱聘请临教。另一名教师则说，他几年前被派到华小服务，当时媒体报道指华小师资短缺逾900多人，但身边一些已毕业的新教师仍在等待工作安排，他就拨电至公共服务局询问，当局的回应是：谁说学校缺教师，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

大家有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点吗？为何当局掌握的数据，没有反映华小严缺师资的真实情况？各位，尽管华文媒体经常报道华小缺乏师资的困境，但是大家要记住，媒体报道是一回事，体制内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数据才是关键。

因此，我提出几点想法，供大家作日后行动思考的方向。

- (1) 华社过去经常惯用的方法，即通过媒体发布消息，这是唯一能做的吗？选择通过媒体发布的用意何在？是要对外公布“我们已在关注此问题”吗？然后呢？
- (2) 华小校长这些年是否曾向教育局反映学校师资不足的真实情况？反映的频率是多少，是一年一次吗？是通过何种形式来反映呢？是在官方会议中呈交确凿数据，还是聚餐时段口头传达？
- (3) 媒体经常会高调的重点报道华小师资短缺的严重性，并有附上确凿数据。那么校方呈报给教育局的数据也有这般详尽吗？有没有详细的列出哪一州属，哪一县，哪间华小，缺什么科目的教师，缺几位？这些详细的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越详尽越好，因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才会如此详尽。
- (4) 若有了这份详尽的报告，要注意内容是以官方语文书写吗？（呈交给教育部的报告必须以官方语文书写）
- (5) 若已完成了一份有确凿数据的详尽报告，是否有根据教育部机制里的程序上报？呈交的文件是否有请负责接收报告的官员盖章和注明签收日期？事后有没有跟进当局采取了什么行动？

就在昨天，2021年3月5日，教总向媒体发布最新展开的问卷调查<sup>3</sup>，详尽地得出结论，2021年华小将面对至少547个师资空缺。这篇报道说出了师资空缺的严重性，非常详尽。请问各位前辈，这份报告的所有分析数据会否能传到教育部？或只是一篇供华社阅读的新闻报道而已？

华社领导经常会把华小面临的困境，如师资短缺问题传达给当权的政治人物，并希望政治人物能够协助华小解决问题。实际上，一般正常的作业操作形式是，政治人物会召见教育部高层领导，以了解该课题的来龙去脉，再作进一步探讨。教育部领导高层则会询问属下各单位部门主管对有关课题的具体回应，再给政治人物正式的回答。

试想想，如果教育部基层负责掌管师资数据的部门，没有收到华社传达有关“华小严缺教师”的真相，事情会如何发展？最终教育部高层还是会根据官方数据办事，而华小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是会继续恶性循环。今天，我们谈的，不是发表了多少篇文告，办了多少场新闻发布会，而是我们弹琴的对象，找对了吗？

2021年3月1日，董总向媒体发布〈董总对国盟执政一周年之教育施政检视〉<sup>4</sup>，其中第3项关于重大华教议题，有关师资持续短缺，董总作出的建议是“教育部的师资统计与临教所需等数据与事实不符，以致每回学年初始，浮现师资短缺，教育部在师资统计数据、培训、面试和调配、临教聘请等方面需要彻底检讨和改进，包括建立严谨师资补缺追踪机制以及检讨师资来源，增加政府师范培训之管道。”

<sup>3</sup> 〈教总：今年将再增547师资空缺，华小仍师资不足〉，《星洲日报》，（<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305/教总：今年将再增547师资空缺- -华小仍师资不足/>），2021年3月5日。

<sup>4</sup> 〈董总对国盟执政一周年之教育施政检视〉，董总网页《文告与声明》，（<https://www.dongzong.my/resource/literature-n-information/declare/1782-declare-2021-06>），2021年3月1日。

文中所指“教育部的师资统计与临教所需等数据与事实不符”，属单方面指控。我想问董总对此“与事实不符”的指控采取了那些具体的行动，把这个“与事实不符”的指控，带到有关行政单位，使官员正视此问题的存在，并监督其采取行动应对。

文中也提及“教育部在师资统计数据、培训、面试和调配、临教聘请等方面需要彻底检讨和改进”。我认为，如果当局没有意识到华小缺乏师资的“真实情况”，再多的指控，都是纸上谈兵，自说自爽。目前，最迫切需做的是把确凿数据通过官方管道上达，层层推进，这有赖华社领导的智慧、沟通力和行动力。比如，文告中提及的“建立严谨师资补缺追踪机制”的建议，我认为是可行的，需要好好计划落实。

我再引述一则2013年6月13日《星洲日报》报道<sup>5</sup>，跟大家说明教育部各单位的分工。时任全国校长职工会总秘书王仕发校长指出，当时一批为数460人的新晋教师原本有望被派到华小服务，这不但能填补师资的空缺，还恐会出现过剩的现象。然而该报记者则揭露，由于职位委任状（warrant perjawatan）不足，这批教师的调派被迫展延。事因若未获公共服务局批准授予职位委任状，被调派到学校服务的教师不会得到薪金。

所以若涉及设置新职位，就必须提早向有关部门申报，草拟财务预算案，再向财政部申请拨款等等。就以上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处理事情是有其程序的，必须依据步骤办事。

现在，我展示的以下例子是教育部属下各部门所处理的师资事务，从招生、遴选到毕业后的调派，都有各负责的部门。

---

<sup>5</sup> 〈王仕发：460新晋教师将派华小〉，《星洲日报》，（<https://www.sinchew.com.my/20130612/王仕发：460新晋教师将派华小>），2013年6月12日。

政府/教育部处理师资事务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政府/教育部各部门
师资招生人数 (Unjuran)	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 (BPPDP)
师资招生	大学中心单位 (UPU)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院 (IPGM)
师范课程申请者心理评估测试/ 体能评估/面试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院 (IPGM)
师资培训课程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院 (IPGM)
教师职位委任状	公共服务局 (JPA)
准教师的面试	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学校教师职位的协调	人力资源管理组 (BPSM)
国内学校教师调派的协调	日间学校管理组 (BPSH)
州内教师调派的协调	各州教育局 (JPN)

以上这些部门，华社领导熟知吗？教育部不是铁板一块，尤其关于处理解决华小师资问题，更要详细地知道每个部门所掌管的事务，才易于监督。华团可把确凿数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带到相关部门。不必事事都找教育部的华裔官员，要排除语文沟通的障碍，与教育局官员建立沟通的桥梁，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渠道。

这么多年，我们惯用的寻求华裔政治人物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问题还是继续存在，我们应该询问自己，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吗？

现在我展示的是《2019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师范学院总院学生事务局年度报告》第58页，这里有一项关于华小招生未达预期，师范学院总院提出的几项改善措施。其中包括采取多种努力，以便特定科目获得足够的申请者，特别是在华小和淡小组方面。这些努力包括宣传师范教育，把招生资料传达给州教育局的官员、华小和淡小助理主任（以前称为“督学”）。大家看到吗？师范学院总院的报告所提及的对策。各州董联合会领导认识自己州内的华小督学吗？是否有跟这些华小督学保持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的总结是董总、教总、华小发展工委等各单位，大家

都可以协助校方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但要切记，华团无法取代校方与教育局之间的沟通。各州董联合会可以督促校方将师资短缺实况向州教育局呈报，并与家协成员携手监督教育部有否对呈报的实况采取了行动。这有赖大家方方面面的配合。

以上，我已经用华小组师范生的录取率说明，招生的过程是公平公正的，我们目前要努力的是提高申请人数。若社团组织继续抨击招生过程舞弊、不透明、不公正，不仅会让人感觉不讲理，还会模糊了华社思考应对策略的正确方向。

**刘荣禧：**接下来，我们要请师范学院立碑分院的卓越华文讲师黄先炳博士，跟大家谈这方面的课题。

**黄先炳：**我们在谈师资培训时，其实应兼顾师资和师质，就是量和质兼顾。

我们先重温一下过去的师资培训情况。

## 1. 师资培训的变化

第一，独立前，英殖民政府早期并不重视师资培训，直到1808年才开始通过几个管道去培训马来亚的教师，包括*Monitorial System*、*Pupil Teacher System*、*Normal Class System*等。1872年，在新加坡设立正式的师资培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 Melayu，其后马六甲（1900年）和霹雳马登（1913年）也跟着成立了马来师资培训学院。

1947-1957年马来半岛各族受训教师人数

教师	1947年	1957年
马来人教师	500	13,181
华人教师	500	750
印度人教师	100	160
英国人教师	200	500

资料来源：The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Research Divi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68, pp.50.

在《1951年巴恩报告书》提到师资培训的重要性之后，英殖民政府才订立师资培训政策，之后所栽培的教师就增加了许多。

第二，我们再看独立后的教师培训发展。值得关注的是《1956年拉萨报告书》和《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所促成的《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在依据的《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教师培训。

1973年，教育部教师培训司（Bahagian Latihan Guru）推行联合性的教师培训系统，在西马9所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实施，取代过去分开培训小学和中学教师的传统师训。此后开始比较系统地培训教师，包括确定入学资格、入学年龄、课程期限、培训津贴，课程内容也要划一。根据早期参与师资培训的教师说，1973年之前，课程算是比较自由的，华小教师都以华文进行培训，包括副修科，后来国家教育政策愈稳定后，情况才有改变，一体化的培训就相对完善。

由于华小师资经常不足，在华社争取下，教育部开办假期师训班。从师资培训角度来看，它是应急而设立的；但它不适合长期执行，因为假期班的培训课程有较大的局限。比如说学员在假期时才来上课，要集中在一段时间赶完课程，师生都倍感吃力。一般上课时间是从早上8点直到晚上10点。有时学员为了周末回家，会和讲师商量改换上课时间，哪怕从早上7点至晚上11点上课都愿意。全天上课，就连午餐时间也上课，他们都还可以接受，以腾出星期五让他们有空回家，这算是吃得“苦中苦”吧！但是否因而会成为“人上人”呢，我们是怀疑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赶课，好像来师训学院是为了拿一纸证书，一个合格证而已。所以我们是太赞同长期这样培训教师的，因此我们向教育部副部长反映后，YB魏家祥曾争取到让临教正式到师范学院上教师学士课程（PISMP），不过那是唯一的一届。

第三，也就是今天要谈的是21世纪的师资培训情况。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师训学院于2006年就正式升格为大专院校，从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改为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即今通称为师范学院（下文以师范学院代称教师教育学院）。我曾在潘永强编的一本书——《臃肿·功利·集权化：压力下的小学教育》里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师范学院升格后华小的师培困境〉，谈的就是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师范学院的一些改变。

内阁是于2005年做出有关决策，师训学院于2006年正式升格为大专院校，成为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可以培训大学学士文凭的学生，其师范课程于2007年1月份开始执行。在入学资格方面，过去只要在SPM有5个优等（C）成绩就可申请师训学院，不过自从升级为师范学院后，入学资格提得很高，不再是5个优等，而是至少5个特优（A）的成绩。如果没有5个特优，那就不符合师范学院的招生条件了。现在的师范课程申请都已电脑化，通过网上申请，如不符合资格，在第一关就会被淘汰。这可避免靠人事关系进入师范课程的情况。入学年龄方面也有规定，学生必须在SPM后的两年内申请师范，不过这个政策可能会随时调整。课程时间从过去的3年制，改为1+4，即1年预科班和4年学士课程。培训津贴获得保留，但课程内容有较大的改变。

我们经常呼吁制度化，要求很多事情有个明确的规定，但是像师范课程、师资培训其实早就制度化了。我从独立前、独立后谈开去，是要让大家看到变化，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努力让国家教育有更加好的操作机制。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机制不太了解，一直提出体制外的要求，而不是顺应体制参与师资的培训。

## 2. 需了解政府体制的运作

刚才彦葶展示各个部门有他们管理的事务，这是正确的，这就是机制。我们不能够停留在1950、60年代，一直认为各种争取就是找副部长而已。万一副部长没接待我们，那又怎么办好呢？我们是否就没有其他管道呢？如果知道体制的运作，是不是可以和各个部门取得更好的沟通，共同商量师资培训的机制？不过，我也不否定争取需要有多种方法。如果我们聚焦在同一个管道，万一此路不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在制度化后，教育部每个部门所负责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争取的时候，也应找对对象。师训学院升格为大专，依然隶属教育部管，是教育部最高的培训机构，它不隶属高等教育部。但是既然作为大专院校，就得符合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局（MQA）所定下的种种高教的条件。师范学院也跟大学一样必须遵守MQA所定的课程标准（*programme standards*），因此我们都得把师培课程写得很清楚，各个科目的课程内容称之为课程信息（*Maklumat Kursus, MK*），讲师必须据此而授课。如果课程信息定下一个学期上课时间是45个小时，我们就要上足45个小时，否则就会被外审员（*external examiner*）询问为何没有依据规定。我们是在体制内，就必须遵循规则。当课程信息定下来后，如果在公共假期没有上课的话，我们也要找时间补回去，这个是所规定下来的。

## 3. 师培课程之变化

在课程方面，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发出的师培毕业凭证是文凭（*Diploma*），而升格后的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则发出大学学位文凭（*Degree*）。

师训学院与师范学院的课程概况比较

事项	师训学院	师范学院
总课时	1,830个小时（110个学分）	133个学分
课时分配	MPU（435个小时/27个学分） Ikhtisas（270个小时/18个学分） 主修（480个小时/32个学分） 副修3个学校科目（405个小时/27个学分） 课外活动（240个小时/6个学分）	MPU（16个学分） Ikhtisas（24个学分） 主修（48个学分） 副修（20个学分） 选修（9个学分） 实习（16个学分）
毕业凭证	文凭（Diploma）	学位（Degree）

在总课时方面有了很大的增加。以学分来算的话，一个学分相等于授课时间15个小时，学生学习时间则是40个小时。过去只有110个学分，后来在2007年增至133个学分。MPU（Mata Pelajaran Pengajian Umum）是MQA规定一定要上的通修学科，如伊斯兰和亚洲文明、种族关系，过去是27个学分，升格为师范学院后是16个学分。Ikhtisas是关于教育专业学科，过去是18个学分，后增至24个学分。主修学科从32个学分提高到48个学分。过去副修要选学校的3个科目，27个学分，在新制度下改为20个学分，只有一门副修科目。过去，课外活动（Gerak Kerja Kokurikulum/Gerko）是6个学分，现在纳入通修学科（MPU）内。增加的是实习，有16个学分，32周。

升格为师范学院后，教师学士课程（PISMP）强调培养具有专长的通才（*Generalist with Specialization*），要求教师有一个专业的资格，即有其主修科，就如李金桦校长刚才所说为何小学教师需要有主修科。这是根据国际的教育发展趋势，不能再要求小学教师是通才、通识，像过去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通，可教导任何科目。进入新时代，教师要更专业，要有主修科，即具有专长的通才。

在华文科培训方面，对比师训学院的教育文凭课程和师范学院的教师学士课程，我们对课程作出很大的调整（见下表）。到了教师学士课程时，所作的调整并不是根据旧的课程内容，只是专注在技能的培训，而是大学课程会偏向知识（*Cognitive*）的建构，以及情感上

(*Affective*) 的升华。当局定下课程必须按60:40的划分, 即主修科的内容范畴 (*Content Knowledge, CK*) 占60%, 至于教育专业领域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 则占40%。这是考量到日后毕业生可到其他大学攻读学科领域的硕士、博士课程, 而不局限于教育范畴而已。因此在师范学院, 主修华文科的学员也得学习古文、文学之类的中文系课程。

华文科师范课程内容和课时比率

课程内容	课程比率 (%)	
	师训学院教育文凭课程	师范学院教师学士课程
语音	9.7	7.4
语法	12.9	5.6
文学	19.4	24.1
教学法	58.1	46.3
教育研究	0	16.7

下表列出2007年至2015年的师范课程架构调整。根据MQA的要求, 师范学院 (IPG) 基本上每5年必须调整课程, 因此课程常有改变。譬如早前有一门副修科, 后来改为两门副修科。副修科也从过去的12个学分增至20个学分, 而其专业则表现在主修科方面。

师范学院课程架构

课程类别	2007年		2015年	
	学分	比率 (%)	学分	比率 (%)
大专必修课	8门课/20个学分	15	6门课/16个学分	12
基础课程: 教育学	9门课/27个学分	21	8门课/24个学分	18
基础课程: 教育实践	14个学分	11	16个学分	12
基础课程: 主修科	15门课/45个学分	35	17门课/48个学分	36
选修课程: 副修科一	4门课/12个学分	9	7门课/20个学分	15
选修课程: 副修科二 (2017年只副修一门科目)	4门课/12个学分	9	3门课/9个学分 (选修课, 内容属自我增值的课程, 如戏剧表演, 体育项目等, 与学校科目无关)	7
总数	130个学分	100	133个学分	100

#### 4. 师训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后引发的困境

师训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后引发了一些困境。如我的那篇文章提到，第一个困境是招生条件的改变。我们的社会还没调整过来，很多人还是觉得教师是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的职业，不是其首选，可能还停留在过去只要有5个优等（*credit*）就可申请了，这恐怕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不太了解国家政策。如果其他源流学校能做到这点（优先选择教师职业），为何华社不能够改变呢？我们可否努力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呢？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第二个困境的问题比较大。在过去的教育文凭课程时代，是根据学校源流（国小、华小、淡小）来招生，经录取的华小师训学员就必须主修华文，毕业后去学校教数学、科学都不成问题。所以那时候SPM毕业生就算不喜欢华文，当他来到师训，还是要修华文，去到学校时他也会教华文科或用华文进行教学。

升格为师范学院后，华文变成一个科目，不再像过去算是一个源流的媒介语。当华文是一个科目时，所招收到的师范华文学员越来越少。2018年毕业学员当中，只有10人主修华文。近几年，每年招收约20位来自华文独中统考的师范学员，如果收生仍不足的话，情况真的不敢想象。还有些学生副修华文，不过总数也就是千多人。

师范学院栽培的华小教师毕业人数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主修华文	副修华文
2010	161	-
2011	154	-
2012	138	174
2013	304	198
2014	496	258
2015	354	155
2016	96	206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主修华文	副修华文
2017	50*	408
2018	10	214
合计	1,763	1,613

注：\*50名毕业生当中的39人是破格以临时教师身份被录取读PISMP课程。

全国华小有3、4万名教师，而由教师学士课程自2011年起培训的教师至今只占少数。虽然大学毕业的华小教师近2万6千人，非大学毕业生近1万人，但这1万人中并非全部都接受过教师学士课程的专业训练。因此会出现的情况是，原任教师和新任教师可能在教育观念、想法方面会有些不同，所以我们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协调这些问题。

全国小学和华小的教师人数

年份	小学教师总数	华小教师总数	华小教师		
			大学毕业	非大学毕业	其他
2013	180,669	37,304	12,428	22,069	2,807
2014	184,019	37,065	14,652	20,959	1,454
2015	185,270	36,912	17,966	18,893	53
2016	182,974	37,508	19,732	17,490	286
2017	182,240	37,344	19,569	17,485	290
2018	181,740	37,029	26,044	10,646	33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年度《马来西亚教育统计》（Perangkaan Pendidikan Malaysia）。

注：“其他”是指合约教师或未经受训的临时教师。

## （二）交流环节

刘荣禧：谢谢黄博士分享在体制内怎样提升教师质量所作出的努力。接下来是交流时间。很难得今天与会者包括来自董总的中央领导和各州董联会主席，估计有七个州的董联会主席和其团队都与会，包括陈大锦先生、李添霖先生、拿督李官仁、卢成良先生、黄博淳先生、庄俊隆先生、萧汉昌先生。

对于三位引言人的发言，希望各位能提出你们的看法或提问，或在留言区提出来。我看到教总秘书长陈清顺欲发言。我想刚卸任、退休的王仕发校长是否也发言。董总主席陈大锦也在线上，好不好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

**陈大锦：**大家下午好，谢谢刘督学，三位分享嘉宾，大家好。

**刘荣禧：**陈主席有什么问题要向三位引言人发问的吗？你开个头吧！有请。

**陈大锦：**好，谢谢刘督学。师资短缺问题可说是我们长期面对的问题。我听到李彦葶讲师有特别提起，在争取的应对策略上是不是有所改变，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我们都知道每年的教师学士课程招生名额都没有填满，李金桦讲师也有特别提起此事。既然如此，教育部已经知道每一年包括2014年到2019年的数字，已经展现出师资短缺问题，是已经存在着的一个问题，为何教育部没去重视这个课题呢？

另外我听到华裔争取到的名额很少。其实，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2014年时，有3,700多人申请华小组，但为何只录取419人呢？是否在心理测试和面试的过程中被淘汰得太厉害？这岂不是影响到有兴趣者申请师训，打击他们的士气？这是一个非常困扰人的问题。另一个想了解的课题是，有些不谙华文的新老师被派到华小执教，据指是不属于马来文科、英文科的教师，那么为何他们会被标签（*tagging*）为华小教师呢？我们希望了解这些课题，哪里出现了错误。

**刘荣禧：**谢谢陈大锦主席的提问。我们有请各位提问，或在留言区发言。

**陈清顺：**主持人，我想发问一些问题。

**刘荣禧：**好，请报上大名和职衔。

陈清顺：主持人，还有三位主讲人，我是教总秘书长陈清顺。

刚才有提到学校没有正当的管道来呈报师资短缺的问题。其实，这个情况根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一直以来，学校都会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呈报师资人数等相关资料，包括师资的人数等等。因此，教育部肯定掌握了各源流学校的师资短缺资料。事实上，这些资料都必须按时呈报，所以说校方没有使用正当的管道来呈报资料，这是不正确的。

（编按：王仕发校长在留言区指出，其实教育部有网上的e-Operasi系统，可以看到全国学校的师资情况，特别是在BSKG（Borang Status Kedudukan Guru，教师职位状态表）里，记录了学校非常准确的教师数据。校方一定要于每月底打印BSKG的数据并存档。每三个月，官员会召见副校长检查师资短缺情况。）

内阁在2012年成立了“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并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担任委员会主席。在当时魏家祥副部长的积极努力下，与教总、董总、校长职工会等团体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了很多次的会议，制定各项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的方案，经过多年努力，成功把华小师资短缺人数从4000多人减少到数百人。在叶娟呈和张盛闻担任副教育部长时，也有继续通过“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来处理师资问题。惟随着2018年大选后，这个委员会也没有运作了。在后来张念群和马汉顺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虽然教总也有与相关副部长针对师资问题进行讨论，但不是通过“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是由内阁成立，因此，教育部各相关部门，特别是与师资培训和调派有关的部门主管都会出席会议。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和相关的负责官员反映问题和商讨解决方案，例如黄先炳博士提到的假期师训班，这虽然是应急的方案，但在当时的确也缓和了师资短缺情况。

华社非常关注华文教育问题。董总和教总，特别是教总，长期有收集师资短缺问题资料，然后通过新闻媒体发表，相信大家都给予肯定。我们发表所收集的资料，不但是要让全国华社关注师资短缺问题，也希望能够引起教育部的关注和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学校缺几百位老师，但是通过教育部招聘华小临教，有数百人申请，但最后只录取21位。试问这21位老师怎么能解决老师短缺的问题呢？这肯定是解决不了的。学校原有老师的工作已负担不了，特别是疫情下的网课使到老师都很辛苦。因此，学校董事会、家教协会额外付钱聘请临教。聘请临教的责任本来是教育部承担的，现在反而好像是董家协来承担经费。不论是华小、国小、淡小，其实聘请临教的责任由学校来承担是很不对的。如同黄先炳博士所说，师范学院提升了师范申请条件，因此在录取师范学员也有很高要求。因此，我们是希望可以在与教育部的配合下，共同探讨师范课程华小组的招生问题，例如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KCG）和面试所面对的问题等等。

**刘荣禧：**好，谢谢！我们也看到马六甲董联合会主席举手了。我现在请李彦葶讲师先回应一下陈大锦主席的提问。

**李彦葶：**谢谢主持人。听了陈大锦主席的提问，其实我也感触良多。对于质疑UKCG<sup>6</sup>的心理测试淘汰很多申请者的说法，我在前面的分享已展示推算数据，华小组申请者的录取率高达60%，而其他源流申请者的录取率只有10%。如果说考UKCG的过程有问题的话，何以华小的录取率还会高于其他源流？在师资遴选过程中被淘汰是必然的，不可能每一位申请者都成功被录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华裔申请者不够多。

至于质疑UKCG测试内容不透明一事，我可以进一步说明。UKCG是教师遴选程序的其中一环，我们要求的不只是申请者的学术背景，心理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UKCG笔试，能测试申请者的心理素质是否适合当教师。根据心理素质的不同面向所设定的多道问题，包括心理健康方面，有没有自杀倾向，有没有负面的情绪，有没有暴力倾向等等。这些测试题目都是教育专家团队设计的，45分钟回答100题，内容严谨且每一年都会跟进修订。通常申请者不能顺利过关的原因是用太多时间反复思考“正确”的答案，导致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作答。多达100题需在45分钟内回答，读题

<sup>6</sup> 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jian Kelayakan Calon Guru，简称UKCG）涵盖心理测试（Ujian Psikometrik，以笔试形式进行）和体能测试（Ujian Kecergasan Fizikal）。

后必须即刻根据心理真实的情况作答，不能耽误时间。

大家也对UKCG题目感到很好奇。由于大家不曾看过题目，纷纷质疑为何需要如此“神秘”。那么我就粗略地举一道题做例子跟大家说明。这道题“你发现小明没有做功课，你会怎样处理？”选择一，处罚他；选择二，通知他的父母；选择三，问他没有做功课的原因。大家看到吗？其实答案并没有所谓“对”与“错”。心理测试的每一道题反映的是心理素质的面向，综合每一道题的回答，得出的分数能总结他是否具备当老师所需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我在前面所分析和推算的录取率，是要告诉大家，不止很多华裔生被刷掉，非华裔生也是如此。严格说来，非华裔生被刷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在这个环节的遴选过程，非华裔生被选中的录取率只有10%，而华裔生是高达60%。如果说这个心理测试的内容存在不公平，何以华裔生的录取率仍高达60%？

各位，教师遴选过程需经过几项测试环节。其中一项是体能测试，是为了确保所录取的师范生身体机能状态合格，不然毕业后执教几年，健康亮红灯，需要经常去医院看诊或因病缺课等等，会影响教学质量。此外，教师的心智平衡亦很重要，通过这些专家编制的心理测验题，能够帮助教育部过滤适合的师资候选人。很多申请者在这一关被刷掉，是因为未完成作答，他们慢慢想哪一个答案才是“对”的，导致在预定时间内做不完。申请者答题时没有据实回答，而是去选“对”的答案。这类心理测验会隐藏一些测谎题，即反向题（*reverse item*）。专家编制的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探测教师应具备的心理素质面向，如果答题者没有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会予人“反复无常”的印象，这类不“据实回答”的情况也往往导致一些申请者被刷掉。

至于有人质疑UKCG的内容，控诉题目对某一族群存在不公平，要求公开UKCG的题目。我的回应是，这些题目都是教育专家和学者编制的，不应该公开任由申请者预习，公开心理测验题供学生预习等同于作弊。尤其这个心理测验是要遴选适合的师资，题目怎么能够公开呢？

接下来，我尝试回答有关不谙华语的教师被派到华小的课题。历年，政

府奖学金的保送计划，会把一些优秀的巫裔学生保送到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学习交际华语。在中五毕业以前，他们没有学习华文，是以零基础的华文水平，在政府奖学金保送计划下被送到中国学习交际华语。毕业后回到马来西亚，需在师范学院完成一年半的大学毕业生教育文凭课程（Program Diploma Pascasiswazah Pendidikan, PDPP），才能被派往学校执教。

一般上，他们是被派往国小教华文。现在浮现的问题是，国小的华文课已经没有初期的需求量。为什么国小开办交际华文课的需求减少呢？国小很重视学生掌握第三语文的能力，除了马来文和英文，国小生可以自由选择多一种语文作为第三语文的学习。近几年，校方把阿拉伯文和华文的上课时间安排在同一个时段，所以很多巫裔家长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阿拉伯文，这也导致近年选择学习交际华文的国小生减少了。如果没有学生选修，校方也就不需要开办国小华文课。国小华文老师一职是根据学校需求而设的。

然而，政府的保送计划还是继续进行，每一年还是会有一定数量的国小华文老师“被推出市场”，导致出现过剩现象。不获委派到国小的教师不能长期赋闲在家，必须获得教职，最终能派去哪里呢？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极有可能会被派到长期缺乏教师的华小，以解决政府奖学金保送生毕业后的“赋闲”和“过剩”现象。但是这些以第二语学习华文的老师，却不是华小期待的能够以母语学习模式教导华文的老师，因此各社团领导严谨把关是正确的、应该的、必要的。

每一个问题的产生必定有其根源所在。我也知道，我们仍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有不足之处。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国教育政策进行评析<sup>7</sup>，曾指出我国教育系统在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的效率面对四项挑战，其中有谈及教育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不足。所以，更因为这样，需要华社领导协助打通沟通的管道，把对的资讯传达给相关的部门。

<sup>7</sup> UNESCO, Malaysia Education Policy Review, Abridged Repor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11/221132e.pdf>), May 2013, pp.11-12.

刘荣禧：谢谢李讲师的回应。其实这些海归教师不符合华小坚持以母语为教学的模式，虽然他们有汉语教师资格，但只能担任国小的华文教师。我们有请马六甲董联会萧汉昌主席提问。

萧汉昌：谢谢主持人。我觉得这场讲座非常有意义。三位讲师阐述了一些我们这些董事还不是很明了的地方。我是觉得这有一个误区。如果申请读师范课程的人数以种族来区分，是非常不适当的，照理不应以种族方式来区分申请者，应录取最好的学生为教师。

传统上，我们称教师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们非常庆幸，许多华小和独中的教师，都抱着使命感在学校服务，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从师范课程毕业的教师有时会出现错配（*mismatch*）的情况，不符合小学的需求。这有没有办法作出一些调整？

刘荣禧：这个问题是黄博士要回答呢？还是李讲师要回答呢？

李添霖：主持人，我先问一个问题，然后一起回答，可以吗？

刘荣禧：好，我们请槟城的李添霖主席提问。

李添霖：主持人，三位主讲人，大家下午好！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师资会不足够？我们的申请者录取率能够达到60%，就是说10个人里有6个人会被录取，这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数据。我想说的一些问题就是，当学生申请的时候，就要选主修科目。是否有资料证明，申请者选择主修英文、国语，他们就会得到吗？还是说主修体育之类的，没有人申请？如果申请主修英文，但英文的名额已满，那么他可以转换学科吗？我想了解这方面的申请，是否能给予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有一些学生来问我，说要申请师训，是否可选择很多种学科，或是只能选一个学科？若只能选一个学科，一进去满额了，就没有机会了吗？

**刘荣禧：**第一个问题是培训出来到学校服务时出现错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申请师范课程时，有人比他更好，他就会自动地被刷掉，没有机会翻身，不会给他相近的学科或比较适合他申请的科目吗？请在体制内的李讲师或者黄博士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

**李彦葶：**李添霖先生的提问跟申请系统有关。申请者需符合几个层次的条件。基本上学术成绩须有至少5科特优，就是A+、A、A-。学生在申请系统输入SPM成绩后，系统会以他的成绩为依据，自动过滤他能够选择的科目。通常，那些获得特优的科目，都会是选项。接着，是科系选择的排序，即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等。然而，一些申请者没有根据自己的成绩优势填写，导致错失机会。

每一次招生，当局会准备详细的申请指南，列明每一学科的基本成绩要求。你要申请哪一科就需要符合特定的学术条件，不是随心所欲填写。根据自己成绩的优势填写选项，才能提高录取的机会。例如音乐科，虽然不需要SPM音乐科成绩，可是必须具备音乐技能的证书，证明擅长某种乐器。

谨慎填写表格和阅读申请指南是非常重要的。听闻大家抱怨8个A的申请者也没有被录取，是怎么回事？各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表示他在填写表格时态度谨慎。大家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再来就是面试环节。由于疫情期间，面试改为学生呈交录影，但是有些学生在录制说话内容时，没有根据指南说明的媒介语，导致审核录影的面试官无法评估该名申请者的表现。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这些申请者就如同在高速公路过关斩将，到了收费站要用一触即通（Touch 'n Go）通关，收费站有很多个车道，若大家偏偏挤去“数学组”、“科学组”的车道，而每一个车道只允许特定数量的车辆通关，满额就不让通车了。申请者不知道“还有其他车道”，倾向选择数学、科学、华文。教育部是根据当下师资需求预算，设定各学科的招生名额，比如说华小需要

40位数学教师、20位科学教师，40位设计与工艺教师，如果申请者都一窝蜂挤去申请“数学”、“科学”，但是“设计与工艺”却无人问津，就会出现很多人被淘汰，却又留下未被填满的名额的情况。

申请者应该根据自己的强项，即学业成绩的优势来考量和选择科系。往后，希望能够为学生介绍师范学院的科系，让他们对师范课程有更全面的认识。

**李添霖：**好，谢谢。这其实就是讲，当申请者不能过关的时候，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去申请了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李彦葶：**没有（不过一般上每一年开放申请，招生广告都有写明可以用近三年的SPM成绩申请师范课程）。很庆幸，教总都会跟进处理申请者的上诉。教总在这一方面的协调做得蛮好，在脸书、网页或以文告方式，呼吁未获面试机会的申请者，联系教总。教总收集他们的资料后，会协助申请者上诉。

**陈大锦：**我想既然如此，假如说经过第二回合录取，是否能开放第三回合录取，能通过这样的机制把招生名额填满吗？

**李彦葶：**这取决于行政高层的决定。需要看第一次招生的结果，如果申请人数达到预期，就不会开放第二轮招生。去年由于疫情，第一轮申请人数不达标，所以才会有第二轮招生。

我建议，若能够的话，3月8日教育部网站即将公布招生消息，3月15日起SPM毕业生就可通过相关网站申请教师学士课程，可动员华社团体在每一个州办一、两场说明会给有兴趣的中学生。我很感谢各方的努力，近年“我要当老师”工委、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教总、董总曾在多地办说明会，取得蛮好的进展。据了解，这些宣导说明会能协助提高师范课程申请者的录取机会。

**刘荣禧：**雪隆董联会研究与发展专员在留言区提问，教育部有何招生管道？面对师资短缺问题，尤其在华小，教育部是否比较被动？教育部是否有额外的招生策略或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所有SPM后的升学管道的招生，全部放进来，包括大学预科班、师训的申请都放在一起，以一个方式来处理。黄先炳博士或李彦葶讲师能够回应吗？

**李彦葶：**其实师范学院的招生是随当下政策或指令执行的。去年的指示是通过国立大学中心单位（UPU）统一处理。中五毕业生以SPM成绩申请，可以选择大学预科班、中六或师范学院。师范学院也意识到UPU统一处理大学预科班、中六或师范学院的招生，导致去年师范课程的申请人数稍有下降，所以已向当局提出交由师范学院负责协调师范课程的招生事宜。

大家可留意即将公布的招生资讯，今年不是用SPM成绩提出申请，因为SPM考试成绩还未公布，所以学生是用预试成绩。若学校没有考预试的话，可用中期考试成绩。请大家留意下星期一发布的招生广告所公布的细则。

**刘荣禧：**接下来就请大家注意星期一的教育部广告，看我们怎样协助有兴趣的SPM生申请师范课程。

**李金桦：**我想补充。

**刘荣禧：**李校长，因为时间关系，好不好你补充了，也当作是你3分钟的总结好吗？

**李金桦：**好的。我想补充三点。第一，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已存在了50年。董教总在应对方面可说有非常好和很多的经验。所以我相信董教总会尝试各种能够达到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董教总都会尝试。政治的方法或者非政治的方法，我相信董教总都会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

第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华裔申请者不多。举个例子，在2019年，教

育部要招收1,460名学员，只有2,000多人申请，最后经过心理测试和面试，只录取到1,054人，相差达406个名额未能填满。

我做了一个粗略分析，华小组每一个名额，只有2个人申请。在国小，一个名额有10个人申请。这表示我们申请的同学不多。在申请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再经过心理测试和面试，就达不到所要的录取人数。所以教总在此问题上做了一个“我要当老师意愿”的调查。我们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华裔学生报读师范课程的反应不那么热烈。

我现在稍微跟大家讲这个调查的结果。“有意愿当老师”的只有16%，“没有意愿当老师”的约50%，“没有决定”的约34%。意思就是说，在华裔子弟里，想要当教师的学生不多。在此情况下，申请的同学很少。为什么这些同学没有意愿当老师？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有其他的升学管道，当医生、律师、各样专业人士，这占了60%。还有一个值得大家探讨的是，以后我们就鼓励孩子当老师。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感兴趣，为什么不感兴趣呢？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家长有很多投诉，老师的工作很辛苦，担心被派到偏远地区，还有家人不鼓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思考，要认真去应对和解决。不然的话，以后的华裔子弟，同样对报读师范课程的意愿不高。如果意愿不高的话，那么申请者就不多，被录取的就更加少。反观我们的友族朋友，他们的意愿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教师行业是很崇高的。反观华裔子弟当老师的意愿，大家知道吗？第一个理由是“薪酬福利待遇高”占了50%。“老师的社会声望高”只占了30%。“父母家人朋友的鼓励”占了35%。这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去提高年轻人对教师行业的了解和认同。不像友族朋友，他们对教师行业的认同度很高。这是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所要去做的，要努力想办法，去鼓励，提升年轻人的使命感，对投身教育工作有浓厚的兴趣，有奉献精神。这样，我们未来的申请者才会多。

最后，教总促请教育部恢复“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的运作，配合董总、教总、校长职工会，以很实际、很务实的态度，根据华小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妥善解决师资问题。刚才教总秘书长有提到，魏家祥当副教

长时召开的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圆桌会议，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所以，我们促请教育部能够迅速的恢复这个委员会，来解决师资问题。

**刘荣禧：**谢谢李金桦校长的发言，也争取机会再一次促请教育部打开圆桌会议之门。在这个场合，我们希望你的声音有被听到，因为所讲的是民间疾苦！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为什么董总、教总都有这种想法。我们现在就请第二位发言人李彦葶作简短的总结，时间3分钟，有请。

**李彦葶：**请容许我展示演示文稿。我想告诉大家体制内的一个管道，可以反映我们面对师资短缺的困境。首相署有一个公共投诉局（Biro Pengaduan Awam, Jabatan Perdana Menteri），我相信大家并不熟悉它的功能。（语音不清，网络出现问题）……

**刘荣禧：**因为技术问题，我们等下再给李彦葶讲师一点时间做总结。

第三位是黄先炳博士，在他总结之前，我们先谈谈刚才大家所说的UKCG，其实有两个部份。第一个部分是体能测验，就像中学生做的那种体能测验，有一定的比例分数。第二个部分就是心理测验（*Mental Test*，或*M Test*），或教师心里素质评估。我们请一路走来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莫顺生前辈来讲解教师心理测验，回忆一下他过去为中学生所做的心理测验。书店已没有销售莫顺生讲师所出版关于教师心里测验的书，那么莫顺生讲师与教总是否能够合作出版这类书？

**莫顺生：**谢谢邀请。我来这听到不少的高见，收获不少。我有出版几本关于心理测验的书，主要是告诉那些参加师训的学员，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心理测验。因为要先通过这个心理测验，他们才能够受邀请去面试。这个面试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书里面都有谈到怎样去面对这种测验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使到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师范学院。

**刘荣禧：**既然如此，教总日后再跟您合作、再跟你联系好吗？

莫顺生：可以，可以。

刘荣禧：当局已取消能力水平评估（Penilaian Tahap Kecekapan, PTK），因此书店就没售卖心理测验书籍，现在都找不到了，已成绝版。莫讲师，谢谢你今天能够上线。我们现在请黄先炳博士做总结。

黄先炳：我刚才提到我反对长期开办假期师训班，是基于教师素质作考量。但这不等于说我反对应急的策略，何况有不少假期班的教师毕业后也有很好的表现。对于董总、教总或民间团体的合理争取，我是钦佩的。大家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法争取。我们用的方法可能稍微不同，但不必因此形成对立，多沟通和了解是重要的。我一直来都比较注重教师的素质。

我觉得如果把教师素质提出来谈的话，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教师的形象，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往往对教师的形象不像以前这么高呢？我想主要是因为老师在很多场合，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能够走出来。在以前，如果一个新村来了新的老师，你会发现这个新老师会涉及各方面的工作，大家几乎都认识他，老师真的很好，他来时带来很大的不同和改变。我想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大家对教师的形象肯定会是非常好的。就好像上两个星期，《星洲日报》报道，有一些老师自己组合起来，在吉胆岛晚上开课，晚上开图书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老师都在尝试和努力改善现状。如果教师的专业形象可以提升，我想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当然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为了应付燃眉之急，我们有一些应急的策略，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在宣传鼓励中学生当老师的时候，我一直都很反对“利诱”他们，告诉他们现在教师的薪水很高，福利好。我认为，如果这些年轻人是为了这些来当老师的话，恐怕十年过后，我们的教育界会出现更多问题。我们真的要让他们打从内心觉得当老师真的很好，才选择当老师。这是从根本性解决问题，也是必须做的宣导工作。所以我提出这些的时候，不是在否定你们的努力。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是在不同岗位用不同方式来做事。

如果真的要做得好的话，就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传承我们的语文和文化。这一定要用母语来达致的。如果不是这样，华文将贬为一个科目，只要会讲会写就好，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特色，就难以传承下去。师范学院的转变，华文只是一个科目，非华文科的学生未必会选修华文。所以我们常听到校长的投诉，现在师范毕业生，非华文组的学员语文掌握能力比较弱，不能胜任华文作为母语的教学。此外，制度上选定某学院为某科目的核心学院，结果其他学院减少录取有关科目的学员，过去学院有开办华文组的讲师首当其冲，面对没有学生教的问题，造成人力资源的流失。华文讲师人数本来就不多，现在又面对没有新人进来，讲师年龄层衔接上出问题，这也是令我们担心的，会断层。所以希望大家在关注师范课程招生的同时，也应要关心师范学院华文讲师的生力军，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问题。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做一些说明，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做交流，谢谢大家。

**刘荣禧：**谢谢黄博士。就是说在招收师训学员方面，我们要晓以义，而不是晓以利，如当教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更多的福利。接下来，有请李彦葶讲师进行总结。

**李彦葶：**好，有看到我分享的演示文稿吗？

**林毓聪：**看到了。

**李彦葶：**好！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体制内的管道，我们可以反映学校面对师资短缺的困境。

首相署公共投诉局的设立，是为了改善政府体制内任何一些行政上可以做得更好的、可以如何提升的方方面面。所以，可以应用这个管道，反映学校长期面对的师资短缺问题，寻求改善方法。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在正确的管道上达面对的困境。体制内可供我们反映问题的管道很多，尤其我们面对的是涉及教育层面的困境。

跟大家分享有趣的发现。有关部门在接收到公共投诉局的建议后，如果不认同该项投诉报告，但公共投诉局认为事关大众利益，就可把问题带到以政府首席秘书为首的公共投诉常任委员会。很多的行政偏差就是从这里修复的<sup>8</sup>。首相署公共投诉局有州级办公室，不是只设在布城而已。根据该局2019年度报告<sup>9</sup>，教育领域只有474宗投诉，占各领域总投诉的6.3%。当中，就普通类别的269宗投诉，有高达266宗投诉已获得解决，其中188宗投诉是在15个工作日内获得解决<sup>10</sup>。所以投报获得解决的机率是很高的，首相署公共投诉局都会认真去处理大家反映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管道是教育部公共投诉管理系统（Sistem Pengurusan Aduan Awam (SISPAA) KPM）<sup>11</sup>。这些单位的设立是协助民众反映问题。

我的总结是，华裔生不太踊跃申请师范课程，会导致华小长期面对的师资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董教总等华团领导在解决华小师资短缺方面，可以就教育部各单位的功能，来寻找正确上达问题的管道。当然，鼓励华裔生踊跃报读师范课程仅能够解决师资“数量”的困境，黄先炳博士提到师资“素质”的困境，亦不容忽视，那是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鼓励华裔生报读师范课程方面，建议提前在学生中四的阶段，就开始向他们传达成为教师必须具备的学术条件，不要等到中五SPM考试成绩出炉后才做宣导说明会。如果学生想当教师，却发现某一科成绩不理想未达申请基本条件，则已经申请无望。因此策略性的针对中四学生举办宣导说明会是有必要的。

<sup>8</sup> 〈首相署公共投诉局摆平争议大事化无〉，Biro Pengaduan Awam,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ttp://www.pcb.gov.my/akhbar/scd\\_july2008.pdf](http://www.pcb.gov.my/akhbar/scd_july2008.pdf))。

<sup>9</sup> Laporan Tahunan 2019 Biro Pengaduan Awam,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ttp://www.pcb.gov.my/pdf/laporantahunan\\_2019.html](http://www.pcb.gov.my/pdf/laporantahunan_2019.html)), pp.29.

<sup>10</sup> Laporan Tahunan 2019 Biro Pengaduan Awam,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ttp://www.pcb.gov.my/pdf/laporantahunan\\_2019.html](http://www.pcb.gov.my/pdf/laporantahunan_2019.html)), pp.37.

<sup>11</sup> Sistem Pengurusan Aduan Awam (SISPAA) KPM, (<https://moe.spab.gov.my/eApps/system/index.do>).

以上种种的建议，需要各方的配合，单靠一个组织去推动，力量是不足的，它需要华社全员的合作配合！华小师资短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这些后辈要随着先贤的脚步，继续努力耕耘，日后子子孙孙才能无忧的乘凉。

刘荣禧：我们看到，虽经过2个小时，讨论还是这么的热烈。我看到王仕发校长举手了好多回，请王仕发校长发言。……或许是技术问题，可能话筒未打开，没有语音。

另外，黄先炳博士已在留言区解答了邓艾琳督学的提问。有关提问是：

- （1）要如何给申请者更有信心修读冷门课程，如工艺科或学前教育？
- （2）有关教师心理测验（*M Test*）的书已绝版，要怎样找到最新的*M Test*资料？黄博士回答时指出，根据主持人刚才的说法，是希望教总可以出版莫顺生老师的书。

今天的讨论将在《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8期刊登。我们非常感谢三位熟悉师资课题且拥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工作者，那就是李金桦校长、李彦葶讲师、黄先炳博士，能够无私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要代表董总《马来西亚教育评论》向他们致谢。今天座谈有近100人上线参与讨论，非常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支持此座谈活动。此座谈谢绝媒体采访。有关内容将会在《马来西亚教育评论》刊登。我们谢谢董总领导、教总领导以及三位引言人，谢谢大家，我们有机会再见。

（编按，还未回答的提问。森美兰董联会梁丹亮在留言区提问：（1）体育/美术/音乐科目的申请资格，是否可伸缩性处理？因为很多在体育/美术/音乐方面很优秀的学生，学术成绩可能并不标青，那就错过了拥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才；（2）教育部数据库里的资料，与现实不符。因为很多原本华文科的教师，到校任职后，被调去教其他科目，但在教育部系统里，仍然标注该教师为“华文科老师”。所以教育部数据显示华小并不太缺“华文科老师”，导致录取华文科的师训名额较少。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 三、座谈发言内容重点归纳

兹将本座谈与会者的各种看法和建议归纳整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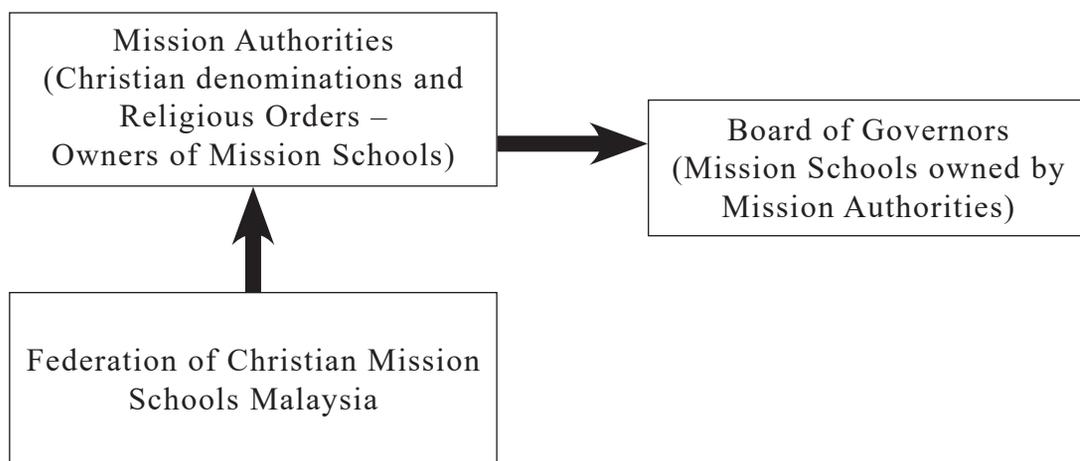
- (1) 升格为师范学院后，师范课程强调培训具有专长的通才，遂改以学科培训各源流小学教师，即华小教师可分别是主修马来文、英文、华文、数学、音乐或美术等学科的教师。此方式并不适合用于小学教师的培训机制，与这种培训方式对应的教师标签系统（*Tagging, pelabelan guru*），往往不能切合实际情况中的华小的真实需求（如编排课表和分配教师教学任务），引起行政上错综复杂的连带问题。因此，建议师范当局把语文科、数学和科学定为小学师范课程的主修科目，而美术、音乐、体育等则定为副修科目。
- (2) 在师资课题方面，确保师资数量充沛和关注师资的培训质量皆很重要。原本华文被视为华文小学源流的主要媒介语，故此规定华小师培学员都必须修读华文科。然而目前的培训机制，华文科被视为一门主修科目，不再是以往所有华小师培学员必修的科目，因此华文科老师的人数逐年减少，近几年，每年只录取20至40位主修华文科的教师。当局应规定华小组其他主修科目的学员都必须副修华文科，以确保华小教师具备基本的华语文素养。
- (3) 华小的马来文教师需同时具备马来语和华语的双语资格。需培训更多这类教师。
- (4) 近年华小师资短缺每年逾千人，而教师学士课程（PISMP）华小组招生名额却未能填满。据观察所得，偏科申请的现象导致热门学科课程的许多申请者被淘汰，以及冷门学科课程的招生名额未能填满。华文、数学、科学申请者较多；比较少人申请的科目是马来文、设计与工艺、美术、体育、音乐、咨询与辅导、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往后的招生宣导说明会，需要鼓励申请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优势考虑申请科目。
- (5) 根据数据推算，华小组的师范课程申请者的录取率高达近60%。所以，若能吸引更多华裔子弟申请师范课程，是有希望填满每一年师范课程的招生名额。

- (6) 华社应积极宣传和提升教师的专业形象，激励年轻人优先考虑当教师，打从心里愿意和喜欢当教师。鼓励更多华裔子弟申请师范课程。
- (7) 有许多师范课程申请者在教师人选资格测试（UKCG）环节不过关。有者建议出版关于教师心理测验的书籍，另有者认为此举不恰当，指出心理测验题目由教育专家和学者编制，旨在遴选适合的师资，不应公开任由申请者预习。
- (8) 有需要举办说明会，让申请者了解申请师范课程应注意事项，包括各种申请条件、各类师范学科课程、教师人选资格测试（心理测试和体能测试）和随后的面试。有建议认为应提前向中四学生传达成为教师必须具备的学术条件，不要等到中五SPM考试成绩出炉后才举办宣导说明会。
- (9) 需关注师范学院华文讲师流失问题。师范学院华文讲师人数减少现象令人担忧。师范当局应加紧招收足够的师范学院华文讲师，让华文讲师后继有人。
- (10) 华小校方向教育当局呈报师资短缺等实况（如使用教育部线上的e-Operasi系统），把师资数据列印存档，以便日后被官员召见时进行讲解。校方与教育当局保持沟通。董总、教总、董联会、教师会、华小发展工委、学校董事会和家教协会等团体，可协助校方解决师资短缺问题，监督当局有否对所呈报的师资实况采取行动。
- (11) 在解决师资问题方面，除了现有常用的争取策略，董总、教总、董联会、教师会、华小发展工委、学校董事会和家教协会等团体，可就教育部各单位的功能，寻找正确上达问题的管道。例如与教育部各部门、州教育局、县教育局、首相署公共投诉局等政府机构进行互动，以加强处理师资短缺等华教课题。
- (12) 争取恢复自2012年内阁成立由教育部副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的“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委员会”，并举行例行会议。配合董总、教总、校长职工会，务实地根据华小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解决师资问题的有效方案。

#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By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 1. Brief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to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is incalculable. 424 mission schools are still serving the nation in East and West Malaysia. Some have done so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British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19th Century opened the way for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ary educators to come to Malaya, Sabah, Sarawak and Singapore to set up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colonialists were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imperialistic control, trade and economic exploitation, not education of the natives

---

\*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s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fcmsm.org>.

or immigrants. The initiatives to build schools were largely left to the pioneer missionaries and the congregations that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missionary pioneers wer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ir faith but their overriding concern wa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Because the gospel has a compelling social concern dimension, beside schools, they also started homes for the poor, orphanages, hospitals, leper settlements and other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they were called to serve.

The English medium schools set up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served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civil servants for the colonial establishment. These mission English schools welcomed children of all races, gender and background, especially the poor. They were much sought after by some Chinese and Indian parents who saw English, the medium of education then as the avenue to better prospects and job opportunities. However, in the early years, the enrolment of Malay children in Mission Schools was relatively low because these schools were held with a measure of suspicion by the Malay community.

It was Rev. R.S. Hutchings who petition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nang Free school in 1816. Although Penang Free School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 mission school toda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country. St. Thomas School in Kuching followed in 1848 through the pioneering efforts of Rev. Francis Thomas McDougall. St. Xavier Penang and Light Street Convent, Penang were established in 1852. Since then, many more Mission Schools were set up over the next 120 years. By the time Malaysia was formed, there were about 400 Mission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ey continued to grow in number and popularity until the 1970s. The post war years – 1950s to the 1970s were remembered fondly by mission authorities and alumni as the golden period of mission schoo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 (1) **The Pre-Independence phase** where the missionary pioneers were able to establish Mission School quite freely and administered them on their own.
- (2) **The second phase** had its beginnings with the Razak Report (1956), followed by the United Teaching Service scheme for teach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ziz Commission Report recommendations (1971). Some of the Aziz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which would have had a positive resul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ssion Schools were not followed up. During this second phase, increasing

pressure was exerted on mission schools to conform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ministry circulars. During this phase, the impact of the Education Act 1961 affecting mission schools began to be felt with increasing severity, at first in West Malaysia and eventually in Sabah and Sarawak as well. The setting up of mission schools gradually tapered off by the 1970s.

- (3) **The third phase**,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 day, saw Mission Authorities going through a period of severe testing and disillusionment. Mission Authorities had to struggle incessantly to preserve what remained of the identity, character, academic standards and national building role of their respective mission schools.

## 2. The Identity and Character of Mission Schools

The imposing facade of many mission schools we see toda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us to imagine that most mission schools began with very small classes housed in little wooden huts or rented backrooms of shop houses. Mission schools all looked different because they owed their development to the missionary pioneers who had come from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re were many add-ons to the main buildings through the years as and when the church and the Board of Governors (BOGs) could afford to do so. The common denominators were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until 1976); and the Euro-Christian tradi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constituted a school of excellence.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share many common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ard to the culture of the schools. These can ultimately be traced back to their Christian worldview,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denominational heritage of the missionary founders.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value system that undergird Mission Schools are in fact universal in nature. They a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Rukun Negara.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non-racial outlook.
- Care and compassion for the poor and weak.
- Education which is person-centred and for all.
- Discipline, perseverance, zeal and hard work.
- Belief and the dependence on God.

Thes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re reflected in their school mottos. Some examples of mission school mottos:

- “*Aim Higher*” (St. Thomas School, Kuching).
- “*Labor Omnia Vinci*” – Labour Conquers All (La Salle Schools).
- “*Fidel et Labore*” – Faith and Zeal (St John’s Institution, Kuala Lumpur).
- “What We Do, We Carry Through” (All Saints School, Kota Kinabalu).
- “*Ad Veritatem Per Caritatem*” – To Truth through Charity (Assunta schools).
- “*Ora et Labora*” – Pray and Work (Methodist Boys School, Kuala Lumpur).
- “*Nisi Dominus Frustra*” – Without God All is Vanity (Bukit Bintang Schools).
- “*Simple Dans Ma Vertu, Forte Dans Devoir*” – Simple in virtue, steadfast in duty (Infant Jesus Convent Schools).
- “Faith, Zeal, Excellence” (Sung Siew Secondary School, Sandakan).

The aspirations and values reflected in these motto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constituted the informal or “hidden” curriculum of Mission Schools. They expressed themselves in the traditions,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which we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mission schools. Among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the following:

- School icons, school songs, distinctive badges and school uniforms.
- Sports Houses and colours.
- Boy Scouts, Girl Guides, Boys’ and Girls’ Brigades, Rotary Club, Lions club, Christian Fellowships, Catholic Societies.
- Founder’s Day, Chapel service, Religious Knowledge classes for students who intended to take Form Three (when it was still available) or Form Five Bible Knowledge as an exam subject.
-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 Special Tuck Shop Day, Walkathon, Job Week.
- Annual musical, choral and drama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years,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mission schools to be headed by dedicated Religious Catholic Brothers and Religious Catholic Sisters, many of whom left their homeland to establis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foreign land. These faithful educators and other Christian pioneers regarded teaching as a special calling and life-long vocation. They often served in the same institution for 20-40 years. Teachers recruited by Mission Authorities, many of whom were former students, also spent most if not all of their teaching career in the same mission school. This phenomenon of continuous dedicated leadership enabled Mission Schools to establish strong lasting traditions which had an enduring impact on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se schools.

Students would leave school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aring for others, a resilient and competitive spirit towards life and the perseverance and discipline needed to succeed. Fond memories were left behind in students who get to spend much of their formative years, from primary one right up to form five or upper six in the same school. All these ingredients, to a large extent, accounted for the nostalgia and loyalty of former students felt towards their alma mater.

### **3. The Decline and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1970s to the 1990s**

The cumulative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zak Report; the UTS, the Aziz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the changing of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rom English to Bahasa Malaysia, the change in the prefix to name of missions schools (SRK and SMK), the control in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and finally, the infusion of Islamis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to the national school system, and by extension into mission schools as well, had had dire consequences on Mission Schools. They gradually lost their identity, character, vitality and the positive role they played in the community. The resultant litany of woes were many and extremely troubling not only to mission school authorities and Christian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at large. What are these?

- (1) Loss of control over almost all areas, and in some cases, even over the use of the school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which they own.
- (2) Changes in the teachers, student population profile from multi-ethnic to increasingly mono-ethnic.
- (3) Lack of funding resulting in out-dated equipment, inability to maintain and upgrad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 (4) Deterioration in standard- academic subjects especially English, in school discipline, and in school pride and loyalty.
- (5) Loss of Christian ethos or school tradition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
- (6) Loss of interest of Christian young peopl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 (7) Diminishing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 (8) Loss of Christian community support.
- (9) Loss of alumni interest and support.
- (10) Difficult to find active and motivated church or alumni people to be members of Board of Governors (BOG).

Promis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Consultation” in the appointment of head or senior teacher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Grants” (for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and “Grants in Aid” (for operating expenditure) were not fulfilled. Unlike Chinese Government-Aided Schools, mission schools have had no special department in the Ministry or specially appointed officer to look after their affairs. Neither do Mission Authorities have any political influence because they have generally stayed away from any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refore mission schools often became silent victims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detrimental to their interests which basically had their root cause in political decisions.

#### 4. The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

MCSC the body that looks after mission schools in West Malaysia was registered in 1952.

During the pre-Independence era the sense of camaraderie between the senior civil servants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principals of mission schools who were also the key leaders of their respective mission authorities was very strong and problems were relatively few.

The themes of MCSC’s conferences or seminars is a good indication of the concerns of Mission Authorities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years before 2000, most of the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revolved around issues which are mainly for the benefit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such as “The Christian Educator”, “The Christian and Work Ethics”, “School Discipline – the Christian Perspective”. From the late 1990 onwards, the main issue of concern was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Heads of Churches, BOG members and heads of Mission Schools. The themes were:

-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1994).
-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2000).
- “Mission Schools –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2008).
-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2012).
- “Mission School Aspirations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Blueprint”, FCMSM Symposium (2014).

## 5.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1990s – and After

MCSC had to reconsider its role and strategies. The issues of concern affected not only Mission Schools but also the wider Christian community. The MCSC/FCMSM realised that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stand alon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like-minded national NGOs such as the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Teachers Christian Fellowship Malaysia (TCF), Catholics Teachers Association, Malaysia (CTAM)), and Scripture Union (SU) was needed for greater effectiveness. This resulted in joint efforts in conferences, training seminars and events such as Bible quizzes,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s and consultations on publications o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s.

The 25-28 October 2000 symposium on the theme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 at Awana, Genting Highlands was one such example. It was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and MCSC. This symposium brought together, perhaps for the first time, Heads of Churches, key Christian educators and mission school authorities from East and West Malaysia. The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role and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the role of mission school in particular. The plenary sessions on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by Mr. Goh Keat Seng and "*The Christians in the New Millenium: A Reassessment of our Role, Influence and Impact*" by Tan Sri Ramon Navaratnam, Mr. Phua Seng Tiong and Brother Vincent Corkery were enlightening and thought provoking. At the end eight resolutions were adopted:

- (1) "We recognise the need and urgency for unity in acting on issues related to our mission schools.
- (2) We feel the need to appoint ad hoc committees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 of schools are catered for at regional level.
- (3) We recommend the immediate appointment of a common task force to overse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Christian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nd also provide training for Christian teach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for those special needs. Priority must be given to pre-school, primary and vocational sectors.
- (4) We feel the urgency for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needy mission schools and therefore suggest that MCSC and CFM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generating such financial support.

- (5) 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diminution of the Church's right of ownership and involvement in Mission School, we resolve that steps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 All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understand and support the ideals that mission schools stand for.
  - Boards of Governors/Manager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Mission Author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make regular visits to the schools.
  - Chaplains and counsellors be appointed to assist in the inculcation and nurturing of Christian values and school's ethos.
  - Christian parent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s.
- (6) Central to many problems faced currently by Mission Schools is the dearth of suitably qualified and committed Christian teachers. We therefore urged all Churches to encourage parents and young people to view teaching as a vocation and mission.
- (7) Recognising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of Mission Schools depends on the appointment of committed Christia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we reiterate the vital need to actively pursue 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consultation with Government in the appointment of principals of mission schools.
- (8) We endorse the principle that the school pupil population should reflec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this, we recommend that in the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Government, some discretion be requested for mission authorities to admit pupils to mission schools.”

The symposium gave all the participants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already actively struggling with the many issues facing Mission Schools a “new vision and a new hope for our mission schools”.

These 8 resolutions, unanimously endors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had in many ways guided the activities and voices of MCSC, Mission Schools Councils of Sabah and Sarawak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up to the formation of FCMSM. This symposium also marked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how Mission Schools in East and West Malaysia worked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which they faced.

One major follow-through of the symposium is a dialogue sess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in Sarawak led by its Chairman, Most Rev. Archbishop Datuk Peter Chung and the Special State Cabinet Committee led by YB Tan Sri Datuk Amar George Chan. A paper “The Problems Facing Government Aided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wa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at length. This was a well-researched paper covering all the key issu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mission schools in Sarawak and Malaysia at that time. The issues addressed and the grievances which were raised at the dialogue with the Special State Cabinet Committee were also the ones discussed during the 2000 CFM-MCSC Symposium.

## 6. The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Before the 1990s, MCSC had generally kept a very low profile. It was limited to representing Mission Schools in West Malaysia. There was a great need for Mission School Authorities in the country to speak with one voice. In 2009, with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YB Tan Sri Bernard Dompok Giluk Dompok, a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MCSC was held in St John’s Institution which brought together Heads of Churches and mission school leaders from Sabah, Sarawak and West Malaysia. One major post-conference outcome was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 which was subsequently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as FCMSM.

For the first time, mission schools have an official body which can speak on behalf of all the mission schools in the country. Education officials are now more ready to engage with FCMSM on matters of which affect mission schools. At one stage, Datuk Mary Yap, the Chairman of FCMSM became the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During her tenure in the MOE, FCMSM was able to hold several meetings with senior MOE official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faced by Mission Schools.

Among the steps taken by MCSC/FCMSM over the last 20 years were publications which addressed several issues of concern:

- (1)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Management” and “A Handbook for Governors/Managers of Board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 to strengthen BOGs.
- (2) “Ethos, Special Character and Traditions of Malaysian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 to preserve Christian values and heritage, produced in response to “what is so different about mission schools”, a query raised by an EPRD official.
- (3) “Teaching as a Mission and Vocation” and “Called to Teach” to encourage more young people to be teachers.

- (4) “A Blue Print for Starting a School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cooperation with SU).
- (5) “A Study Guide” and other support materials to help SPM Bible Knowled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many memoranda were sent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Education or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 pressing issues faced by Mission Schools. Many follow-up meetings too were held.

One of such memorand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between the Mission Authoritie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Malaysia*” signed by all the Mission Authorities of Sabah, Sarawak and West Malaysia and presented to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in September 2016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mong the issues raised at this meeting was why Mission Schools were not mentioned at all in the final draft of the Education Blue Print - 2013 -2025. It was pointed out to the Minister that Mission Schools should be given due recognition as a distinct category. Upon hearing this, the Minister immediately instructed the Director General to correct this omission. During this meeting, the matter of allowing mission schools to take back possession of their school land and buildings was also brought up. The minister’s advice was should Mission Authorities have such intention, they must give the Ministry adequate time of 5 – 7 years for MOE to relocate the students and deregister the school.

Another significant meeting was with the officials of the Education Planning and Research Division (EPRD) which resulted in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3* affirming 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consultation” and the right of mission schools to maintain their special character. Besides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3*, meetings between FCMSM and MOE also yielded 4 other professional circulars which dealt with matters of concern to Mission Schools.

- (1)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 1/2010* on the maximum limit of subjects that can be taken by candidates for the SPM Exam.
- (2)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 2/2011* on the setting up of non-Islamic society in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ided Schools.

- (3)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 4/2011* on the teaching of Bible Knowledge after school hours in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ided Schools. This was followed later by a letter to formally allow the annual SPM Bible Knowledge quizzes to be held at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
- (4) *Surat Pekeling Ikhtisas Bil. 1/2011* on the allocation of 10% quota to the discretion of BOGs for admission into “controlled schools”.

Mission Schools continue to be faced many problems even with these circulars in place because officials at district or state level or even uncooperative school principals interpret them to suit their own bias. New barriers were also created which frustrates the intent and spirit of these circulars. It appears as if the concessions given by one hand were taken away by another.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were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ministry officials do not remain in the same posts for long because of retirement or promotion. As such, consistent implementation is an on-going challenge.

The work of looking after the affairs of mission schools has gone beyond what volunteers can handle. A FCMSM secretariat was set up in 2017 to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last 12 years, annual alloca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upgrading of mission schools were credited in the BOG account. This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understanding, coordination and monit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retariat was very timely. The FCMSM secretariat head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has enabled many mission school matters to be attended to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especially matters that require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Mission Authorities of Sabah, Sarawak and West Malaysia.

These allocations were indeed much needed and much appreciated by Mission Authorities as Mission Schools, especially those in rural areas were in a sorry state of disrepair. The fact that these allocations are credited into the BOG account has enabled BOGs to be much more present and engaged in the school. There is now a new awareness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of BOGS in Mission Schools.

## 7. Future Prospects and the Aspirations of Mission Schools Today

Given the realities and problems that mission schools face today and more than likely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how should Mission Authorities respond?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heart searching and debate since the 1990s. Have mission schools outlived their usefulness? Should they take a bow and exit from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Mission Authorities just confine their focus on religious education of the young and leave “secular” education to the government? After all, unlike in the past the government is more than capable of providing education for all. Going into the future, how long can mission schools hold on as a separate category nominally labelled as “Government-Aided Schools”?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desires to have one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for public schools in the country is no longer in doub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is mono-ethnic and Muslim dominated. Islamisation programmes will continue to be infused into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curriculum.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profile in mission schools have also become increasing mono-ethnic. Such trends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reverse and ultimately there will be no rational reason for Mission Authorities to hold out with regard to mission school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slamic in character.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 continuing Christian presence in Mission Schools will no longer be justifiable or viable.

It is possible that in the eyes of MOE, mission schools today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players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compared to what they were in the past. Out of the 10,223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aid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country only 424 are mission schools with a total enrolment of 197,000 which is only about 4.1% of the total enrolment of 4,772,995 students. Compare this to the situation shortly before World War II when mission schools accounted for about 75 % of English medium schools and about 78% of the total enrolment. Furthermore, not all mission schools are sited on freehold land. The leased land that many mission schools are sited on will eventually expire or may even be ac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under the Land Acquisition Act.

Is there any meaningful purpose for Mission Authorities to hang on to their mission schools and all the more so when their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have largely gone unappreciated. Instead of working alongside Mission Authorities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MOE seems to hinder the healthy progress of mission schools at every turn.

## 8. FCMSM – 10 Year Strategic Plan

Far from giving up, Mission Authorities are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Archbishop Julian Leow, FCMSM organised a special planning retreat for key leaders to work on a ten-year strategic plan for the future (2019 – 2028). Several initiatives were proposed and four steering committees set up to work on follow-up action.–

- (1) To encourage Bible literacy for mission school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 (2) To encourage more Christian young people to take up teaching as a calling and vocation.
- (3) To set up teaching training facilities to train teacher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 (4) To strengthen Board of Governors/Managers in mission schools.
- (5) To set up private mission schools 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or vocation centres by Mission Authorities on their own or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s.

Each of these initiatives will face its own challenges. Many mission schools are situated on prime land in urban centres. They have great potential and should be better utilized to meet current needs. Mission Authorities are seeking other avenues for continuing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such as turning Mission Schools into special needs schools for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follow academic courses and would otherwise drop out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school system. Vocational or trade schools or even as sports training centres are being considered.

The initiative to set up private schools either by Mission Authorities themselves or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private entities ha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Methodist and Catholic education authorities have had a fairly long history of setting up private schools, initially for students who dropped out of school in the days when promotion in government schools was not automatic. These schools have been remodelled as private schools 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which offer education to a wider range of students. Such schools have modern facilities, good teachers and are well managed. They are an alternative choice for parents who are not comfortable with the situation in Government schools. However, setting up private 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is an extremely costly enterprise. Even if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licence can be obtained, the investment needed to establish such schools is prohibitive. Partnership with private entities is also not the answer as private businesses are driven by commercial rather than charitable considerations. Only the well-off will be able afford the fees charged by

private 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which will exclude children from B40 and marginalised families. This is at odds with the traditional objective of Mission Schools which is for all, especially the poor. There are no easy answers to these dilemma.

## 9. The Desire and Will to Press On

Mission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o press on regardless. The nexus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education is inseparable. Mission Authorities believe that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with its accompanying value system of honesty, discipline, hard work, compassion for the weak, and respect for all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good education.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 including academic standards will rise toward excellence and the nation will benefit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as it had done in the past if the ethos and character of Mission Schools were allowed to flourish. Additionally, Mission Authorities have to be good stewards of the legacy left behind by the missionary pioneers and the countless dedicated educators whose sacrifice went in to build the schools. Mission Authorities therefore purposed to press on with faith and hope even in the face of seemingly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They believe the future, though uncertain, is ultimately in God's hands.

## 10. Conclusion

Since the formation of FCMSM much momentum has been built up and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among all 25 mission authorities who own the Mission Schools. Given the changing education landscape and the uncertain political scenario, the coordinating and guardian roles of FCMSM are all the more crucial. Mission authorities must be alert to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ction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the well-being of Mission Schools taken by education authorities must be responded to speedily and with coordinated effort. How the circulars are interpreted or applied by one headmaster or one district official may eventually spread and affect other Mission Schools in the country as well. The predominant sentiment is - Mission Authorities will trust God and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and be "salt and light" to future generations.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 APPENDIX

### Mission Authorities in Malaysia

MISSION AUTHORITIES (SABAH)	MISSION AUTHORITIES (SARAWAK)	MISSION AUTHORITIES (SEMENANJUNG MALAYSI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Mission of Sabah</li> <li>• Basel Christian Church of Malaysia</li> <li>•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Kota Kinabalu)</li> <li>• Catholic Mission (Keninga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Catholic Mission (Sandakan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Protestant Church in Sabah</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Mission (Diocese of Kuching)</li> <li>•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e of Kuching)</li> <li>• Catholic Mission (Sib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Catholic Mission (Diocese of Miri)</li> <li>•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li> <li>•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Iban Annual Conference</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Diocesan Education Board of West Malaysia</li> <li>• Malaysian Catholic Education Counci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La Salle Brothers</li> <li>○ Infant Jesus Sisters</li> <li>○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li> <li>○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li> <li>○ Marist Brothers</li> <li>○ Brothers of St Gabriel</li> <li>○ Archdiocese of Kuala Lumpur</li> <li>○ Diocese of Malacca-Johor</li> <li>○ Diocese of Penang</li> </ul> </li> <li>• Christian Brethren Education Board</li> <li>•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Council of Education</li> <li>• Presbyterian Education Board</li> </ul>

Note:

25 Mission Authorities: Sabah 6, Sarawak 6, Semenanjung Malaysia 13.

424 Mission Schools (SK+SMK 369, SJKT 3, SJKC 38, SMJK 14).

## Refer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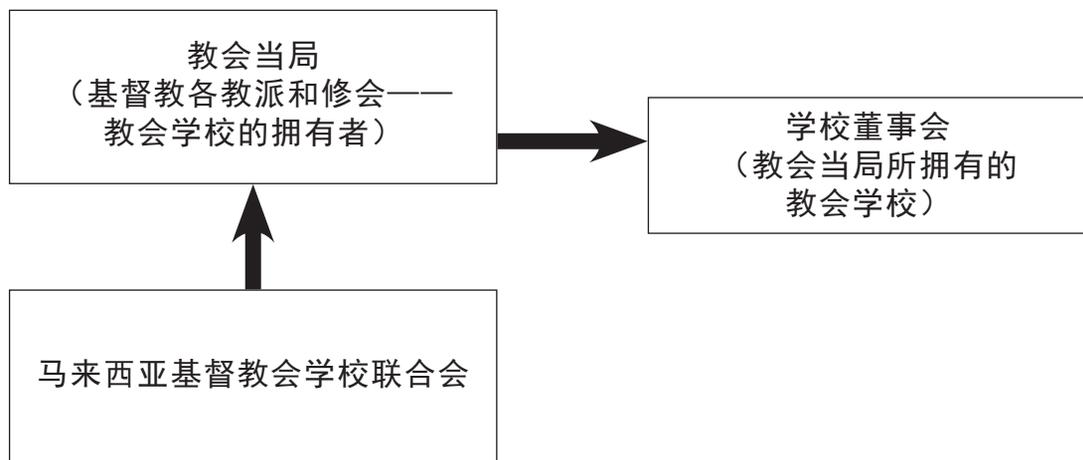
1. Extracts from Razak Report (KPM 1956), Aziz Commission (1971).
2. Yong Chee Se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92.
3. Brother David Liao FSC,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1994.
4. Caspian A. Pappu FSC, “Catholic Schools in Malaysia: Their History and Fu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Education Practices – An Abstract/Summary”, 1995.
5. Goh Keat Seng, “A Christian Presence in Malaysian Education: Retrospec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1997.
6. Mrs R Rajendra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Mission Authorities regarding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Board of Governors”, 2003.
7. Dr Lim Boon Hock, “Mission Schools: Role of the church In Nation Building”, 2009.
8. Report on the MCSC – CFM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Mission Schools”, 2000.
9. “The Problems Facing Government Aided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 submitt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Sarawak for the dialogue with the State Cabinet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ffairs Sarawak, 2001.
10. Judy Wong, “Meducation”, presented in Workshop for SCAC English Ministry 2nd Methodist Heritage Convention, Sibul, Sarawak, 2010.
11. Jane Moh, “Methodist Schools at the Forefront of Education”, Borneo Post Online,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12/03/31/methodist-schools-at-forefront-of-education/>), 31 March 2012.
12.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 Ethos, Special Character and Traditions of Malaysian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mcsc\\_ethos\\_book.pdf](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mcsc_ethos_book.pdf)), February 2012.
13. Yap Kok Keong,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Problems, Aspirations and Prospect”, 2014.
14. Yap Kok Keong, “Mission School: Current Dilemma and Future Prospect”, undated.
15. \_\_\_\_\_, “Malaysia’s mission schools facing Islamisation with alleged conversions”, Malay Mail,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16/02/12/report-malaysias-mission-schools-facing-islamisation-with-alleged-conversion/1059477>), 12 Feb 2016.

16.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 God's Faithfulness Our Heritage 1956–2016,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60th-Anniversary-Comm-BOOK.pdf>), commemorative book celebrating 60 years of MCSC's mission school work in West Malaysia.
17.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between the Mission Authoritie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Malaysia,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MOU-Content-Page.pdf>), September 2016.
18.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 Direc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FCCMSM-Directory-July-2017.pdf>), July 2017.
19. FCCMSM, FCCMSM Strategic Planning Steering Committee Report, 2018. Note: FCCMSM is now FCMSM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20. Peter C.T Lim,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the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 Issues and Response", November 2020.
21. Brief Not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glican Mission Schools in Sarawak.
22. Brian Taylor and Pamela Midway Heyward, "The Kuching Anglican Schools, 1848-1873", 1973.
23. "The Basel Christian Church of Malaysi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from Basel Mission Authorities, undated.
24. Douglas Telajan, "History of Mission Schools", 2021.
25. Wong Teck Ong,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Schools established by 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2021.

#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的组织结构



## 一、历史背景简介

基督教会学校对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424所教会学校仍在东马和西马为国家服务。一些已如此做了逾100年。

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扩张，为基督传教士和传教教育工作者来到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设立教育机构开辟了道路。殖民主义者主要

\*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网址：<https://www.fcmsm.org>。

注：此华文译文由董总《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执行主编沈天奇翻译自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所撰“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英文原文，译文并获得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过目同意。

是对帝国主义控制、贸易和经济剥削感兴趣，而不是对当地人或移民的教育感兴趣。建造学校的举措大多是留给传教先驱者和他们所建立的会众去做。传教先驱者自然对传播他们的信仰感兴趣，但他们最关心的是社群的福祉。由于福音具有令人信服的社会关怀层面，因此除了学校，他们还为穷人、孤儿、医院、麻风病人安置区和其他慈善机构开设了家园，他们受感召以服务 and 满足当地社群的需求。

在殖民时期所开办的英文学校，旨在为殖民政权提供公务员。这些教会英文学校欢迎所有族群、性别和背景的孩子，尤其是穷人。它们受到一些华裔和印度裔父母的欢迎，这些父母们认为英语是当时的教育媒介，是获得更好前景和就业机会的途径。然而，在早期，教会学校的马来人儿童入学率相对较低，因为这些学校受到马来人社群的猜疑。

传教士哈菁（Rev. R. S. Hutching）于1816年倡议和创办槟城大英义校（Penang Free School）。虽然槟城大英义校现已不再被视为一所教会学校，但它标志着在我国创办教会学校的开始。随后，在弗朗西斯·托马斯·麦克杜格尔牧师（Rev. Francis Thomas McDougall）的开创性努力下，于1848年在古晋创办了圣多玛学校（St. Thomas School）。槟城的圣芳济学校（St. Xavier School）和莱特街修道院学校（Light Street Convent School）于1852年创办。在此后的120年里设立了更多教会学校。当马来西亚成立时，全国约有400所教会学校。直到1970年代，它们的数量和受欢迎度持续增加。战后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教会当局和校友们所深情铭记的教会学校历史之黄金时期。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的发展进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独立前阶段：**传教先驱者能够相当自由地设立教会学校，并自行管理这些学校。
- (2) **第二阶段：**始于《拉萨报告书》（1956年），随后是教师联合教学服务计划和《阿兹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实施（1971年）。阿兹委员会的一些对教会学校发展有积极结果的建议没有获得跟进落

实。在此第二阶段，通过教育部各种通令的执行，对教会学校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其符合国家教育体系。在这个阶段，开始感受到《1961年教育法令》对教会学校的冲击越来越严重，首先是在西马，最后在沙巴和砂拉越也是如此。到1970年代，教会学校的设立逐渐减少。

- (3) **第三阶段：**从1970年代至今，教会当局经历了一段严峻的考验和失望的时期。各教会当局必须不断努力，以维护各自教会学校所遗留下来的身份、特质、学术水平及在国家建设的角色。

## 二、教会学校的身份和特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教会学校的宏伟外观，令我们难以想象，大多数教会学校在开始时的班级非常小，设在小茅木屋或所租借店屋的后房里。各教会学校看起来都不一样，因为它们的发展都归功于来自不同教派和教育背景的传教先驱者。多年来，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教会和学校董事会在学校主要建筑物增设了许多附加设施。它们的共同点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至1976年）；以及欧洲基督教的传统，和对什么构成一所卓越学校的理解。因此，它们在学校文化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的面貌和特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最终都可追溯到它们的基督教世界观、价值体系和传教士创始人的教派遗产。



实际上，基督教教育哲学和支撑教会学校的价值体系，是具有普世性质的。它们符合国家教育哲学和国家原则。一些共同特质是：

- 尊重人的尊严以及非种族观点。
- 关心和同情穷人和弱者。
- 以人为本的全民教育。
- 纪律、毅力、热忱和勤力。
- 对上帝的信仰和依赖。

这些教育目标反映在它们的校训里。教会学校的一些校训例子是：

- “更高的目标”（古晋圣多玛学校）。
- “劳动克服一切”（喇沙学校）。
- “信心与热忱”（吉隆坡圣约翰书院）。
- “我们所做的，我们坚持”（哥打京那巴鲁诸圣学校）。
- “以慈善走向真理”（阿松大学校）。
- “祈祷和工作”（吉隆坡美以美男校）。
- “若不是上主，一切皆徒然”（吉隆坡武吉免登女校）。
- “朴实于德，踏实做事”（耶稣圣婴修道院学校）。
- “信念、热忱、优越”（山打根双修中学）。

这些校训所反映的愿望和价值观，有意或无意地构成了教会学校非正式或“隐藏”的课程。它们在传统、实践和活动中表达了自己，这些都是教会学校与众不同特质的组成部分。这些共同特质包括以下：

- 学校图标、校歌、独特的徽章和校服。
- 运动队和颜色。
- 男童子军、女童子军、男少年军和女少年军、扶轮社、狮子会、基督教团契、天主教会。
- 学校创始人纪念日、教堂服务、为打算参加中三（当时曾有开办此科目）或中五的圣经知识考试科目的学生所开办的宗教知识班。
- 筹款活动——特别小卖部日、马拉松步行、工作周。
- 年度音乐、合唱和戏剧创作。



早年，教会学校由虔诚的天主教兄弟会和天主教姐妹会所领导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到异乡设立教育机构。这些忠诚的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的基督教先驱者，视教学为一种特殊的呼召和终生的使命。他们通常在同一机构服务长达20年至40年。在教会当局所招募的教师当中，有许多人是以前的学生，他们的大部分教学生涯（如果不是全部）也都在同一所教会学校度过。这种持续敬业的领导现象，使教会学校能够建立起强大且持久的传统，对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学生离开学校时，会具有强烈的关怀他人的意识，对生活怀有坚韧和竞争的精神，以及拥有对达到成功所需的毅力和纪律。那些在同一所学校度过了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五年级或大学先修班二年级的大部分成长岁月的学生，都对此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毕业生对母校的怀念和忠诚。

### 三、1970年代至1990年代教会学校的衰落与生存奋斗

《拉萨报告书》实施所带来的累积影响，教师联合教学服务计划，阿兹委员会的建议，教学媒介从英语改为马来语，教会学校校名前的称谓之改变（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对学生入学的控制，以及最后把伊斯兰化

的政策和做法注入到国民学校体系，并扩展到教会学校，都对教会学校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它们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质、活力以及在社群中所发挥的积极角色。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困境，不仅使教会学校当局和基督教社群，甚至对整个马来西亚社会，都造成了许多和极大的问题。这都是些什么呢？

- (1) 几乎失去对所有领域的控制，在某些个案情况下，甚至失去控制它们所拥有的学校建筑物和设施的使用。
- (2) 师资、学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多元族群日渐走向单一族群。
- (3) 缺乏资金导致设备陈旧，没有能力维护和提升建筑物和设施。
- (4) 水平的下降——各学科尤其是英语、学校纪律、对学校的自豪感和忠诚度。
- (5) 失去基督教精神或学校传统以及与众不同的特质。
- (6) 基督教青年对教师职业失去兴趣。
- (7) 日渐减少对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和实践。
- (8) 失去基督徒社群的支持。
- (9) 失去校友的兴趣和支持。
- (10) 很难找到积极主动的教会人士或校友，以成为教会学校董事会成员。



各种承诺例如委任校长、资深教师的“最大限度咨询原则”、以及“资本拨款”（用于发展开销）和“资助拨款”（用于营运开销）的分配，都没有获得兑现。与政府资助的华文学校不同，教会学校在教育部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或专门任命的官员，来处理它们的事务。教会当局也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它们通常远离任何政治参与。因此，教会学校往往成为不利于其利益的教育政策的沉默受害者，而其根本导因基本上源自政治决策。

#### 四、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于1952年注册成立，是一个照顾西马教会学校的团体。

独立前，教育部高级公务员与教会学校校长（他们也是各自教会当局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友情非常密切，当时教会学校面对的问题相对较少。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的会议或研讨会的主题，很好地表明了教会当局在此时期所关心的课题。在2000年之前的几年里，大多数的研讨会和会议都主要围绕着教师和家长的利益，诸如“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基督教与职业道德”、“学校纪律——基督教的视角”。从1990年后期开始，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是教会学校的未来。与会者包括了教会领袖、教会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和校长。这些主题是：

- “教会学校的未来”（1994年）。
- “教会学校的未来”（2000年）。
- “教会学校——满足国家的需求”（2008年）。
-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未来”（2012年）。
- “教会学校的愿望与国家教育蓝图”，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研讨会（2014年）。

## 五、对于1990年代及之后的教会学校的未来之关注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角色和策略。所关注的课题不仅影响到教会学校，也影响到更广泛的基督教社群。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CSC）/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CMSM）意识到它们不能独自面对问题。这就需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我国非政府组织协作，例如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马来西亚基督教教师团契（Teachers Christian Fellowship Malaysia, TCF）、马来西亚天主教教师协会（Catholics Teachers Association, Malaysia, CTAM）和圣经联盟（Scripture Union, SU），以提高成效。这使到各方共同努力举办会议、培训研讨会和活动，例如圣经问答比赛、教师节庆祝活动以及就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出版物进行磋商。

2000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云顶高原Awana举行的主题为“教会学校的未来”研讨会就是其一例子。这是由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和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所联合举办的。本次研讨会也许是第一次聚集了东马和西马的教会领袖以及主要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教会学校当局。与会者讨论了在我国教育方向的大背景下，教会学校的角色和未来，特别是教会学校所扮演的角色。在全体会议上，Goh Keat Seng先生的“基督教教育经验：起源、发展和前景”论文以及丹斯里Ramon Navaratnam、Phua Seng Tiong先生和Vincent Corkery修士的“新千年的基督徒：重新评估我们的角色、影响和冲击”论文，很有启发性，也发人深思。此研讨会最后通过了8项决议：

- (1) “我们认识到，在与我们的教会学校相关课题上，采取统一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 我们认为有需要委任特设委员会，以确保在区域层面照顾学校的利益。
- (3) 我们建议立即任命一个共同的工作组，来监督各级私立基督教机构的设立，并为基督徒教师提供培训，以及为那些有特殊需求者发展特殊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学前教育、小学和职业教育的领域。

- (4) 我们感到有需要为教会学校提供财政支持的紧迫性，因此建议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和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探讨产生这种财政支持的可能性。
- (5) 为了避免进一步削弱教会对教会学校的拥有权和参与权，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以确保：
  - 所有的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都理解并支持教会学校所代表的理想。
  - 中学和小学董事会董事积极参与学校的事务和发展。教会当局及其代表定期访问学校。
  - 任命牧师和辅导员协助灌输和培养基督教价值观和学校精神。
  - 基督徒家长积极参与家长和教师协会。
- (6) 教会学校当前所面对的许多问题的核心，就是缺乏合适的合格和敬业的基督徒教师。因此，我们敦促所有教会鼓励父母和年轻人，将教学视为一种志业和使命。
- (7) 由于认识到维护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性质，有赖于委任敬业的基督徒校长和教师，因此我们重申，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委任教会学校校长时，政府积极履行‘最大限度咨询原则’。
- (8) 我们赞同学校学生人口应反映当地社区种族结构的原则。对此，我们建议在与政府的持续对话中，要求让教会当局在教会学校收生入学方面，有一定的酌处权。”

研讨会为所有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已经在积极应对教会学校所面对诸多问题的参与者，提供了“我们的教会学校的新愿景和新希望”。

这8项决议获得所有与会者一致通过，并会在未来20年内，直到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CMSM）成立之前，在许多方面指引了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沙巴和砂拉越的教会学校理事会的活动和心声。本次研讨会也标志着东马和西马的教会学校如何一起工作，处理它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重要转折点。

此研讨会的一个主要后续行动，就是由大主教拿督彼得锺出任主席和领导的砂拉越教会协会，与丹斯里拿督阿玛陈康南领导的州内阁特别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并提呈和详细讨论了一份题为“政府资助基督教会学校面对的问题”的论文。这是一份经过良好研究的论文，涵盖了当时砂拉越和马来西亚的教会学校所面对的所有关键课题。在与州内阁特别委员会对话中所提出的课题和申诉，也是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和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举办的2020年研讨会所讨论的事宜。

## 六、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1990年代之前，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通常保持非常低调。它仅限于代表西马的教会学校。全国的各教会学校当局，非常需要同一口径的发言。2009年，在丹斯里柏纳东博的鼓励和支持下，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在吉隆坡圣约翰书院举办一项会议，聚集了来自沙巴、砂拉越和西马的教会领袖和教会学校领导人。会后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的成立，它随后向社团注册局注册为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教会学校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代表全国所有教会学校发言的正式团体。现在，教育官员更愿意就影响教会学校的事务，与马来西亚基督教会



学校联合会接触。在某一个时段，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主席拿督叶娟呈，成为了教育部副部长。当她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能够与教育部高级官员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教会学校所面对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年期间，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采取的其中步骤包括出版了关于处理所关注课题的多个刊物：

- (1) 《学校董事会章程》和《基督教会中小学董事会手册》——强化学校董事会。
- (2)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精神、特质和传统》——维护基督教价值观和遗产，以回应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和策划司某位官员关于“教会学校有什么不同”的询问。
- (3) 《以教学为使命和志业》和《受召唤去教导》，鼓励更多青年当教师。
- (4) 《启动学校基督徒团契蓝图》（与圣经联盟合作）。
- (5) 《学习指南》等辅助材料，帮助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圣经知识科的教师和学生。

多年来，已把许多备忘录送交教育总监或教育部长，以期解决教会学校所面对的迫切课题，且举行了许多后续会议。

其中的一份由沙巴、砂拉越和西马所有教会当局签署，并于2016年9月提交给部长的备忘录——《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教会当局与马来西亚教育部之间关于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意义重大。在此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课题，就是为什么教育部《2013-2025年教育蓝图》最终草案中完全没有提到教会学校，并向部长指出，教会学校应受到承认，且列为一个独特的类别。部长听此后立即指示教育总监纠正这一疏漏。在此会议上还提出了允许教会学校收回其学校土地和建筑物的事宜。部长的劝告是，若教会当局有如此用意，它们必须给教育部足够的5至7年时间，让教育部重新安置学生和撤销学校注册。

另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与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官员的会谈，其结果是2013年第1号专业通函肯定了“最大程度咨询”的原则，以及教会学校保持其特质的权利。除了2013年第1号专业通函，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与教育部之间的多个会议，也产生了涉及教会学校所关注事宜的其他4份专业通函。

- (1) 2010年第1号专业通函，关于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考生可应考科目数量的最高限制。
- (2) 2011年第2号专业通函，关于在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设立非伊斯兰宗教协会。
- (3) 2011年第4号专业通函，关于在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放课后教导圣经知识。随后在一封信中正式允许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举行年度SPM圣经知识问答比赛。
- (4) 2011年第1号专业通函，关于被列为“控制学校”的教会学校，其董事会可酌情处理所获分配的10%收生入学名额。

即使有这些通函，教会学校仍面对诸多问题，这是因为县级和州级的官员，甚至不合作的学校校长，都自行诠释这些通函以迎合他们自己的偏见。还制造了新的障碍，使到这些通函的用意和精神受挫。这就好像一只手所给予的，被另一只手拿走了。由于教育部官员退休或晋升而不会长期留在同一职位，这使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进一步复杂化。因此，一以贯之的执行，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照顾教会学校事务的工作，已超出志愿者的能力范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秘书处于2017年成立，以协调教会学校的活动。在过去12年中，政府把每年的拨款汇入学校董事会的银行账户，用于维修和提升教会学校。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解、协调和监督。该秘书处的成立来得及时。以总秘书为首的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秘书处，使到许多教会学校事务得以快速和有效地处理，尤其是需要沙巴、砂拉越和西马的教会当局协商和协调的事务。

这些拨款确实是教会当局非常需要和赞赏的，尤其是在乡区的那些年

久失修的教会学校。事实上，把这些拨款汇入学校董事会的银行户头，使董事会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活动。现在，对学校董事会在教会学校中的角色，已有了新的醒觉和重视。

## 七、当前教会学校的未来前景和愿望

纵观教会学校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和问题，以及在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如此下去，那么教会当局应当如何应对？自1990年代以来，教会学校的未来一直是许多内心探索和辩论的主题。教会学校是否已失去其用处？它们是否应鞠躬谢幕和退出教育体系？教会当局是否应只专注于年轻人的宗教教育，而将“世俗”教育留给政府？毕竟，与过去不同的是，政府完全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教育。展望未来，教会学校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且名义上被标记为“政府资助学校”，还能坚持多久？

政府希望为国内公立学校建立一个综合性教育系统这一事实，已不再是疑问了。现任政府是单一族群和穆斯林为主的政府。伊斯兰化计划将继续注入到正式和非正式的课程。教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族群。这种趋势将很难逆转，教会当局最终将没有合理的理由，去坚持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的教会学校。在此情况下，基督教继续存在于教会学校将不再说得通或可行。

在教育部看来，与过去相比，今时的教会学校可能不再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全国10,223所政府和政府资助的小学和中学里，只有424所是教会学校，总入学人数为197,000人，仅占总入学人数4,772,995人的4.1%左右。与二战前不久情况相比，当时教会学校约占英文学校的75%，以及占总入学人数的78%。此外，并非所有教会学校都位于永久业权地契的土地上。许多教会学校所在的租赁土地最终将到期，甚至可能会在《土地征用法令》下被当局征用。

教会当局坚持它们的教会学校，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尤其是当它们对国家教育和国家建设的贡献大致上没获得重视。与其和教会当局合作以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教育部反而似乎处处阻碍教会学校的健康发展。

## 八、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十年策略蓝图

教会当局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为未来做规划。在廖炳坚总主教的鼓励下，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为主要领导人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规划营，以制定未来的十年策略蓝图（2019-2028年）。此规划营提出了若干举措，并成立了4个指导委员会以开展后续行动：

- (1) 鼓励教会学校学生和年轻人阅读圣经。
- (2) 鼓励更多的基督教徒青年将教学当作一种呼召和志业。
- (3) 设立教学培训设施，为公立、私立学校培训师资。
- (4) 强化教会学校的中学董事会/小学董事会。
- (5) 由教会当局自行或与他方合作，以开办私立教会学校或国际学校或职业中心。

这些每一项举措将面对各自的挑战。许多教会学校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它们具有巨大的潜能，应更好地利用其来满足当前的需求。教会当局正在寻求其他途径以继续参与教育，例如把教会学校转为特殊需求学校，给那些无法跟上学术课程，且会从当前政府学校体系中辍学的人士。目前正受考虑的是职业学校，甚至体育训练中心。

由教会当局本身，或者与其他私人实体合伙，以开办私立学校的举措，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卫理公会和天主教教育当局开办私立学校的历史相当长，最初是为那些当时在公立学校无法自动晋升而辍学的学生。这些学校被改造成为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为更广泛的学生提供教育。这类学校有现代化设施，师资优良，管理完善。这对于那些不满公立学校情况的家长来说，是另一种选择。然而，开办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是一项极其昂贵的事业。即使能取得国际学校执照，设立此类学校所需的投资，也令人望而却步。与私人实体建立伙伴关系也不是答案，因为私人企业是由商业而非慈善考量所驱动的。只有富裕者才能负担得起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的收费，这些收费把B40低收入家庭和受边缘化家庭的儿童排除在外。这与教会学校的传统目标不一致，即是为了所有人，尤其是穷人。这些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 九、继续前进的愿望和意志

教会当局已决定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基督教信仰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教会当局相信，基督教世界观及其伴随的诚实、纪律、勤力、同情弱者和尊重所有人的价值体系，是良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教会学校的精神和特质获得允许蓬勃发展，那么包括学术水平在内的教育水平将走向卓越发展，国家将像过去一样，从基督教会学校所作贡献中受益。此外，教会当局必须成为传教先驱者和无数献身于建设学校的敬业教育工作者，所留下的遗产的好管家。因此，即使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教会当局也决心怀着信心和希望继续前进。它们相信，未来虽然不确定，但最终掌握在上帝手中。

## 十、结语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已建立起了很大的动力，那些拥有教会学校的25个教会当局都深感具有了强烈的共同目标。鉴于不断变化的教育景观和不确定的政治形势，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的协调和监护人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教会当局必须警惕教育的变化和机会。对于教育当局所采取的不利于教会学校福祉的行动，必须给予迅速和协调一致的回应。一位校长或一位县级官员如何诠释或使用教育部通函，最终可能会传开出去，并影响我国其他的教会学校。这主要的情绪是，教会当局将相信上帝，并继续与政府合作，为国家谋福利，成为子孙后代的“盐与光”。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 附录

### 马来西亚教会当局

教会当局 (沙巴)	教会当局 (砂拉越)	教会当局 (马来西亚半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Mission of Sabah</li> <li>• Basel Christian Church of Malaysia</li> <li>•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Kota Kinabalu)</li> <li>• Catholic Mission (Keninga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Catholic Mission (Sandakan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Protestant Church in Sabah</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Mission (Diocese of Kuching)</li> <li>•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e of Kuching)</li> <li>• Catholic Mission (Sib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li> <li>• Catholic Mission (Diocese of Miri)</li> <li>•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li> <li>•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Iban Annual Conference</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Anglican Diocesan Education Board of West Malaysia</li> <li>• Malaysian Catholic Education Counci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La Salle Brothers</li> <li>○ Infant Jesus Sisters</li> <li>○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li> <li>○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li> <li>○ Marist Brothers</li> <li>○ Brothers of St Gabriel</li> <li>○ Archdiocese of Kuala Lumpur</li> <li>○ Diocese of Malacca-Johor</li> <li>○ Diocese of Penang</li> </ul> </li> <li>• Christian Brethren Education Board</li> <li>•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Council of Education</li> <li>• Presbyterian Education Board</li> </ul>

注：

25个教会当局：沙巴6个、砂拉越6个、马来西亚半岛13个。

424所教会学校（国小+国中369所、淡小3所、华小38所、国民型中学14所）。

## 参考文献

（省略。请参考英文原文。）

#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发展规划

沈天奇\*

## 摘要

延续在《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七期所撰淡米尔文学校一文，本期论文将聚焦于剖析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近期发展规划，以促进各界对我国各类学校的了解、交流与合作。本文制作众多教育数据统计表，让各界了解教会学校的现况，以及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团体和教会学校董事会协同推动创办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机构的发展规划。本文亦着重讲解学校拥有权和学校土地拥有权、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分别，并指出其中出现的误解，以促进维护教会学校的权益和发展。

关键词：教会学校、学校拥有权、学校土地拥有权、政府学校、政府资助学校

## 一、基督教会学校的类别和创办者

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会学校涵盖由基督教各类团体<sup>1</sup>、传教士、华裔印裔人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及在英殖民政府时期由某些“州”政府把早期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的学校拥有权，移交给教会团体改办而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资料与档案局研究员。

<sup>1</sup> 这些创办教会学校的基督教会团体涵盖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弟兄会（Brethren Church）、巴色会（Basel Christian Church）以及其他新教教会（other Protestant Churches）。

成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涵盖各源流或各类的学校。早期创办的教会学校包括英文小学和英文中学<sup>2</sup>、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华文中学/华文独立中学、改制中学（前华文中学/国民型中学）<sup>3</sup>。一些教会学校早期是华文小学，后改办为英文小学，惟随后在教育政策下改为国小。近期创办的教会学校或教会教育机构则有私立学校（小学和中学）、国际学校（小学和中学）、职业培训中心、私立学院。教会团体从早期至今都有创办和经营幼儿园。

## 二、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432所教会学校，即马来西亚半岛205所、纳闽3所、沙巴97所、砂拉越127所，其创办年份介于1848年至1969年。全国现有最早创办的教会学校<sup>4</sup>是于1848年在砂拉越创办的古晋圣多玛学校（现为SK St. Thomas, SMK St. Thomas, Kuching）和古晋圣玛丽学校（现为SK St. Mary, SMK St. Mary, Kuching）；马来西亚半岛的是于1852年创办的檳城乔治市莱特街修道院学校（现为SK Convent Lebu Light, SMK Convent Lebu Light）和华盖街圣芳济学校（现为SK St. Xavier, SMK St. Xavier）；沙巴的是于1883年创办、今称的山打根SK St. Mary Town。<sup>5</sup>

<sup>2</sup> 基本上，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1970-1975年）、砂拉越（1977-1982年）教会英文小学媒介语被逐年改为马来语而成为国小。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1976-1980年）、砂拉越（1983-1987年）教会英文中学（中一至中五班级）媒介语被逐年改为马来语而成为国中。不过，有个别教会英小较迟改为国小，如沙巴一些教会英小于1984年才改为国小。

<sup>3</sup> 改制中学（Conforming schools）是指在马来亚（1950年代中甸至1960年代初）、砂拉越（1960年代初）、沙巴（1970年代初）的一些华文中学，先后被改制为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SMKJ）或英文中学。后来，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1976年起）、砂拉越（1983年起）的改制中学和英文中学的主要媒介语逐年改为马来语，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正式被归为国民中学（国中/SMK）。

<sup>4</sup> 檳城大英义校（Penang Free School）于1816年由传教士哈菁（Rev. R.S. Hutching）创办，是一所英文学校，后来不再被视为教会学校，并改制成为国中。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由传教士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创办，后于1843年迁至香港，发展成为一所教会中学。

<sup>5</sup> 马来西亚半岛现有教会学校创办年份介于1852年至1968年，沙巴和纳闽的介于1883年至1969年，砂拉越的则介于1884年至1968年。见本文附录1至附录3。

全国现有200所（46.3%）教会学校于1848年至1941年或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创办，6所（1.39%）在日军占领时期（1942-1945年）创办，109所（25.23%）于二战结束后至马来亚独立前（1946-1956年）创办，78所（18.06%）于马来亚独立至马来西亚成立前（1957-1962年）创办，39所（9.03%）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至1969年创办。

现有226所（52.31%）教会学校于二战后至1960年代（1946-1969年）创办，这是教会学校的辉煌发展期。不过，1970年代开始就没有教会学校获准创办，教会英文小学和英文中学先后遭遇改制，改用国语（马来语）为主要媒介语，成为国小和国中。

表1：全国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2020年统计）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48	4	1909	2	1945	6	1840-1849	4	0.93
1852	4	1910	2	1946	12	1850-1859	6	1.39
1853	1	1912	6	1947	8	1860-1869	5	1.16
1857	1	1914	4	1948	9	1870-1879	0	0.00
1860	3	1915	5	1949	4	1880-1889	13	3.01
1863	2	1917	1	1950	9	1890-1899	25	5.79
1880	2	1919	4	1951	7	1900-1909	32	7.41
1882	2	1920	2	1952	12	1910-1919	22	5.09
1883	2	1922	2	1953	9	1920-1929	31	7.18
1885	4	1923	3	1954	14	1930-1939	55	12.73
1888	1	1924	3	1955	14	1940-1949	46	10.65
1889	2	1925	3	1956	11	1950-1959	117	27.08
1891	2	1927	6	1957	17	1960-1969	76	17.59
1892	2	1928	4	1958	15	合计	432	100
1893	2	1929	8	1959	9			
1895	2	1930	8	1960	14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96	2	1931	5	1961	14	1848-1941	200	46.30
1897	3	1932	6	1962	9	1942-1945	6	1.39
1898	2	1933	7	1963	7	1946-1956	109	25.23
1899	10	1934	6	1964	6	1957-1962	78	18.06
1902	3	1935	5	1965	10	1963-1969	39	9.03
1903	12	1936	5	1966	3	合计	432	100
1904	4	1937	3	1967	6	1848-1956	315	72.92
1905	5	1938	6	1968	6	1957-1969	117	27.08
1906	1	1939	4	1969	1	1848-1962	393	90.97
1907	5	1940	7	合计	432	1963-1969	39	9.03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自马来西亚教育部2020年6月30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0年6月30日教育基本信息、2018年10月31日教会学校名单；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

(MCSC) 60周年纪念特刊(1956-2016)、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CCMSM) 2017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名录》；各教会学校网上资料。

注：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些教会学校的创办年份出现差异。

表2：全国现有10所最早创办的教会学校（2020年统计）

序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1.	YCB1201	SK St. Thomas,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848	半津	580	43
2.	YFB1204	SMK St. Thomas,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848	半津	679	91
3.	YCB1202	SK St. Mary,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848	半津	555	40
4.	YFB1205	SMK St. Mary,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848	半津	594	40
5.	PBB1034	SK St. Xavier,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852	半津	508	37
6.	PEB1110	SMK St. Xavier,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852	半津	1,023	99
7.	PBB1017	SK Convent Lebu Light,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852	半津	211	25
8.	PEB1099	SMK Convent Lebu Light,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852	半津	304	32
9.	YCB2103	SK St. Paul,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853	半津	26	10
10.	YCB2105	SK St. Dunstan,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857	半津	27	9

资料来源：同表1。

在2020年，砂拉越拥有最多教会学校即127所（29.40%），其次是沙巴和纳闽共100所（23.15%），其他依序是霹雳58所（13.43%）、槟城31所（7.18%）、吉隆坡30所（6.94%）、雪兰莪26所（6.02%）、柔佛21所（4.86%）、马六甲18所（4.17%），而吉打、森美兰、彭亨、玻璃市只有少许教会学校。布城联邦直辖区、登嘉楼、吉兰丹则没有教会学校。

表3：全国各区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各创校年份学校数量					合计	
	1848- 1941	1942- 1945	1946- 1956	1957- 1962	1963- 1969	学校数量	比率%
玻璃市	0	0	1	0	0	1	0.23
吉打	7	0	1	0	0	8	1.85
槟城	23	0	6	1	1	31	7.18
霹雳	36	2	9	6	5	58	13.43
雪兰莪	11	0	7	8	0	26	6.02
吉隆坡	19	1	7	2	1	30	6.94
森美兰	4	1	0	1	0	6	1.39

州/ 直辖区	各创校年份学校数量					合计	
	1848- 1941	1942- 1945	1946- 1956	1957- 1962	1963- 1969	学校数量	比率%
马六甲	14	0	1	2	1	18	4.17
柔佛	9	0	9	3	0	21	4.86
彭亨	3	0	1	2	0	6	1.39
纳闽	1	0	2	0	0	3	0.69
沙巴	38	0	16	19	24	97	22.45
砂拉越	35	2	49	34	7	127	29.40
合计	200	6	109	78	39	432	100

资料来源：同表1。

### 三、各类教会学校

根据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统计，2010年马来西亚半岛教会学校有207所，沙巴和纳闽共100所，砂拉越129所，合计436所。2021年全国有424所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教会学校，即国小和国中有369所、华小38所、淡小3所、国民型中学14所。<sup>6</sup>

根据本文对马来西亚教育部、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CSC）、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CMSM）、网上各教会学校的资料之汇总，在2020年6月，全国432所<sup>7</sup>教会学校分为西马205所（47.45%），东马227所（52.55%）；或小学306所（70.83%），中学126所（29.17%）；或263所（60.88%）国小、39所（9.03%）华小、4所（0.93%）淡小、111所（25.69%）国中、15所（3.47%）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此外，估计至少有26所前教会学校仍在运作，以及至少有13所教会学校已关闭。据此综合估计，我国曾有至少471所教会学校。（见表4至表6）

<sup>6</sup> 2012年，全国有437所教会学校，分布在马来西亚半岛208所，沙巴和纳闽共101所，砂拉越128所。见〈教会学校的变质和没落·被政府忽略·没获社会支持·教会学校挣扎求存〉，《星洲日报》，2012年5月8日。

<sup>7</sup> 因欠缺某些资料，此估计数字还未扣除在2017年至2021年内不再是教会团体属下的一部分学校（即前教会学校），不过已把经确定的某些前教会学校从名单和统计数据中扣除。因此，本文上述估计数字会跟实际情况或教会团体统计数字有少许差异。

表4：全国各类教会学校数量和人数（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国小		华小		淡小		国中		改制中学		合计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玻璃市	1	465	0	0	0	0	0	0	0	0	1	465
吉打	3	1,141	0	0	0	0	5	2,084	0	0	8	3,225
檳城	11	4,246	6	3,945	0	0	11	7,038	3	4,885	31	20,114
霹靂	30	11,218	3	2,649	3	859	19	14,191	3	3,957	58	32,874
雪兰莪	16	7,783	0	0	0	0	9	8,727	1	2,885	26	19,395
吉隆坡	17	5,555	1	153	1	151	11	6,899	0	0	30	12,758
森美兰	3	1,429	1	269	0	0	2	1,892	0	0	6	3,590
马六甲	7	2,399	3	434	0	0	6	4,618	2	1,737	18	9,188
柔佛	10	3,876	4	1,378	0	0	7	4,702	0	0	21	9,956
彭亨	4	1,899	0	0	0	0	1	475	1	473	6	2,847
纳闽	1	445	0	0	0	0	2	749	0	0	3	1,194
沙巴	54	21,138	14	6,780	0	0	25	19,618	4	4,767	97	52,303
砂拉越	106	21,512	7	3,978	0	0	13	13,272	1	189	127	38,951
<b>合计</b>	<b>263</b>	<b>83,106</b>	<b>39</b>	<b>19,586</b>	<b>4</b>	<b>1,010</b>	<b>111</b>	<b>84,265</b>	<b>15</b>	<b>18,893</b>	<b>432</b>	<b>206,860</b>
大马半岛	102	40,011	18	8,828	4	1,010	71	50,626	10	13,937	205	114,412
沙巴和纳闽	55	21,583	14	6,780	0	0	27	20,367	4	4,767	100	53,497
砂拉越	106	21,512	7	3,978	0	0	13	13,272	1	189	127	38,951
西马	102	40,011	18	8,828	4	1,010	71	50,626	10	13,937	205	114,412
东马	161	43,095	21	10,758	0	0	40	33,639	5	4,956	227	92,448

资料来源：同表1。

注：

1. 布城、登嘉楼、吉兰丹没有教会学校。
2. 可把表4与附录4至附录6并读。

表5.1：已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现存学校（前教会学校，2020年统计）

序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1.	ABB2085	SK Convent, Ipoh	霹靂	城区	1907	全津	388	31
2.	ABB2098	SK St. Paul, Tanjong Tualang	霹靂	城区	1957	全津	154	18
3.	ABB3046	SK Methodist, Parit Buntar	霹靂	城区	1908	全津	384	42
4.	ABD2163	SJK(T) Methodist, Ipoh	霹靂	城区	1948	半津	115	16
5.	ABD3062	SJK(T) St. Mary's, Parit Buntar	霹靂	城区	1932	全津	182	28
6.	BBD0079	SJK(T) Methodist, Kapar	雪兰莪	城区	1951	半津	708	45
7.	CEB6028	SMK (P) Methodist, Raub	彭亨	城区	1947	全津	163	28
8.	KBB2086	SK Convent, Alor Setar	吉打	城区	1934	全津	439	42
9.	KEB2098	SMK Convent, Alor Setar	吉打	城区	1949	全津	633	55
10.	NBD4069	SJK(T) Convent, Seremban 2	森美兰	城区	1953	全津	645	43
11.	PBB1019	SK Convent, Pulau Tikus	檳城	城区	1922	全津	287	31
12.	PBB2028	SK Assumption, Butterworth	檳城	城区	1933	半津	59	16
13.	PEB1109	SMK (P) St. George, Georgetown	檳城	城区	1884	全津	744	61

序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14.	WBB0052	SK Convent, Jalan Peel	吉隆坡	城区	1949	全津	553	38
15.	WBB0071	SK Methodist (L), Jalan Hang Jebat	吉隆坡	城区	1958	全津	319	26
16.	WBC0126	SJK(C) La Salle, Sri Petaling	吉隆坡	城区	1953	半津	1,833	73
17.	WEB0214	SMK Convent, Jalan Peel	吉隆坡	城区	1949	全津	801	67
18.	YBB6106	SK St. Andrew, Sarikei	砂拉越	乡区	1956	全津	89	13

资料来源：同表1。

注：

1. 上述学校改由教育部或学校董事会“接管”。
2. 霹雳州巴力文打SJK(T) St. Mary's (ABD3062) 被迁入宏愿学校 (Sekolah Wawasan Pekan Baru, Parit Buntar)。
3. 森美兰州SJK(T)Convent (NBD4069) 被迁入宏愿学校 (Sekolah Wawasan Seremban 2)。

表5.2：已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现存学校（前教会学校，2020年统计）

序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备注
1.	SMK Convent, Seremban	森美兰	城区	1904	迁离，改办SMK Puteri于1993开课
2.	SMK (P) Bukit Bintang	吉隆坡	城区	1893	原地改建柏威年广场；迁离，改办SMK Seri Bintang Utara和SK Seri Bintang Utara于2001年开课
3.	SK (P) Bukit Bintang 1	吉隆坡	城区	1958	
4.	SK (P) Bukit Bintang 2	吉隆坡	城区	1958	
5.	SK Kulai 2	柔佛	城区	1967	迁离，改办SK Taman Indahpura 1于2003年开课
6.	SK St. Martin, Kota Samarahan	砂拉越	乡区	1962	教会团体收回土地；2006年迁离，2018年建新校园，改办SK Merdang
7.	SK St. Thomas, Kuantan	彭亨	城区	1950	教会团体收回土地，与合作伙伴于2015年开办Regent国际学校；州政府征地引发法律诉讼；2014年迁离，与他校共校多年，建新校园，改变校名
8.	SMK St. Thomas, Kuantan	彭亨	城区	1956	

资料来源：同表1。

表6：已关闭的一部分教会学校（2020年6月统计）

序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备注
1.	SK St. Patrick, Kulim	吉打	城区	1933	关闭
2.	Sk St. Michael, Alor Setar	吉打	城区	1934	关闭
3.	SK St. George 2, Taiping	霹靂	城区	1915	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4.	SK Stella Maris, Kuala Kangsar	霹靂	城区	1952	关闭
5.	SK St. Michael 2, Ipoh	霹靂	城区	1912	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6.	SMK Assumption, Butterworth	檳城	城区	1933	政府“接管”后关闭
7.	SK Pykett Methodist	檳城	城区	1891	2015年停止招生，2019年底关闭
8.	SK St. Teresa Convent Brickfields 2	吉隆坡	城区	1945	于2018年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9.	SK La Salle (2) Brickfields	吉隆坡	城区	1954	于2018年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10.	SK La Salle (2) Sentul	吉隆坡	城区	1948	于2018年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11.	SK (P) Pudu 2	吉隆坡	城区	1914	于2018年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12.	SK (P) Methodist 2, Brickfields	吉隆坡	城区	1896	与一校合并后关闭
13.	SK St. Theresa Padungan,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940	关闭；原址改办St. Joseph国际学校于2017年开课

资料来源：同表1。

注：

1. 教会团体收回校地，砂拉越古晋SK St. Theresa Padungan (YCB1205) 关闭。在原地开办国际学校 (St. Joseph's International School, YUBV001)，2014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2017年开课。
2. 教会团体收回校地，砂拉越古晋SK St. Joseph (YCB1203) 于2015年停收一年级学生，已于2020年12月关闭（未列入上表）。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的私立小学 (Sekolah Rendah St. Joseph, YDAL004) 和私立中学 (Sekolah Menengah St. Joseph, YGAL004) 于2012年开课，2013年9月迁至目前的原地。
3. 砂拉越SK St. Teresa Serian (YCB8201) 的校舍成为危楼，教会团体收回校地，该校已于2021年关闭（未列入上表）。
4. 本文整理的2020年6月全国432所教会学校名单包括砂拉越的古晋SK St. Joseph和西连SK St. Teresa Serian，不包括古晋SK St. Theresa Padungan。

全国有39所教会华小和1所前教会华小，4所教会淡小和4所前教会淡小，以及15所教会国民型中学，都仍在运作（见表7至表9）。另一方面，砂拉越诗巫公教中学是诗巫南兰路天主教会于1960年创办的一所华文中学/华文独立中学，被列为华文独中，不列为教会学校。

表7：教会华小和前教会华小概况（2020年统计）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教会学校）							
ABC2102	SJKC Sam Tet, Ipoh	霹雳	城区	1934	半津	1,053	69
ABC2103	SJKC Ave Maria Convent, Ipoh	霹雳	城区	1938	半津	1,450	84
ABC2120	SJKC St. Michael & All Angels, Ipoh	霹雳	城区	1932	半津	146	16
JBC1012	SJKC St. Joseph, Johor Bahru	柔佛	城区	1939	半津	242	21
JBC2007	SJKC Chong Eng, Kluang	柔佛	城区	1930	半津	419	31
JBC5017	SJKC Chung Hwa Presbyterian, Muar	柔佛	城区	1923	半津	540	33
JBC6007	SJKC Gau San, Pontian	柔佛	城区	1951	半津	177	19
MBC2061	SJKC Katholik, Kampung Tujuh	马六甲	城区	1928	半津	86	16
MBC2063	SJKC Notre Dame, Kampung Tujuh	马六甲	城区	1948	半津	227	21
MBC2074	SJKC St. Mary, Air Salak	马六甲	城区	1929	半津	121	14
NBC4048	SJKC Sino English, Seremban	森美兰	城区	1945	半津	269	21
PBC0030	SJKC Kim Seng, Bukit Mertajam	槟城	城区	1940	半津	1,404	80
PBC1044	SJKC Shang Wu,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909	半津	1,134	62
PBC1053	SJKC Convent Datuk Keramat,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935	半津	278	22
PBC1056	SJKC Heng Ee,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956	半津	163	15
PBC1057	SJKC Hun Bin, Tanjung Bungah	槟城	城区	1934	半津	823	43
PBC3024	SJKC Sacred Heart, Balik Pulau	槟城	城区	1909	半津	143	16
WBC0138	SJKC St. Teresa, Brickfields	吉隆坡	城区	1936	半津	153	19
XCC4009	SJKC Good Shepherd, Menggatal	沙巴	城区	1927	半津	457	27
XCC4025	SJKC Lok Yuk, Likas,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05	半津	674	40
XCC4030	SJKC Lok Yuk, Menggatal,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27	半津	537	32
XCC4044	SJKC Shan Tao,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38	半津	1,893	77
XCC4052	SJKC St. James,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68	半津	1,286	55
XCC4054	SJKC St. Peter Telipok, Kota Kinabalu	沙巴	乡区	1927	半津	522	25
XCC4202	SJKC Anglo Chinese, Papar	沙巴	城区	1903	半津	124	13
XCC4251	SJKC St. Joseph, Papar	沙巴	城区	1946	半津	386	25
XCC4403	SJKC St. Phillip, Tamparuli	沙巴	乡区	1949	半津	203	18
XCC5031	SJKC Lok Yuk Pinangsoo, Kudat	沙巴	乡区	1915	半津	105	13
XCC5034	SJKC Lok Yuk Batu 1, Kudat	沙巴	乡区	1903	半津	161	15
XCC5042	SJKC Our Lady Immaculate Kudat	沙巴	乡区	1930	半津	127	13
XCC5052	SJKC Sacred Heart, Tajau, Kudat	沙巴	乡区	1930	半津	122	14
XCC5065	SJKC St. Peter, Kudat	沙巴	乡区	1952	半津	183	15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YCC1201	SJKC St. Paul,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952	半津	516	35
YCC1306	SJKC Sam Hap Hin, Kuching	砂拉越	城区	1937	半津	1,090	60
YCC3101	SJKC Sacred Heart Chinese, Sibul	砂拉越	城区	1948	半津	471	39
YCC6117	SJKC St. Martin, Sarikei	砂拉越	乡区	1946	半津	75	17
YCC6305	SJKC Tong Hua, Bintangor	砂拉越	乡区	1931	半津	91	16
YCH3101	SJKC Methodist, Sibul	砂拉越	城区	1903	半津	1,205	65
YCH6101	SK Methodist Anglo-Chinese, Sarikei	砂拉越	乡区	1954	半津	530	40
合计						<b>19,586</b>	<b>1,256</b>
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前教会学校）							
WBC0126	SJKC La Salle, Seri Petaling	吉隆坡	1953	1953	半津	1,833	73
合计						<b>1,833</b>	<b>73</b>
总数						<b>21,419</b>	<b>1,329</b>

资料来源：同表1。

注：

1. 吉隆坡乐圣华小（SJKC La Salle）于2012年从十五碑迁至大城堡。
2. 砂拉越有7所两种源流的华小，包括2所属于教会学校的华小，即诗巫卫理华小（SJKC Methodist, YCH3101）和泗里街卫理英华小学（SK Methodist Anglo-Chinese, YCH6101），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和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表8：教会淡小和前教会淡小概况（2020年统计）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教会学校）							
ABD2160	SJK(T) St. Philomena Convent, Ipoh	霹雳	城区	1938	半津	393	28
ABD6102	SJK(T) St Teresa's Convent, Taiping	霹雳	城区	1903	半津	439	38
ABD9007	SJK(T) Methodist, Malim Nawar	霹雳	城区	1946	半津	27	7
WBD0176	SJK(T) St. Joseph, Sentul	吉隆坡	城区	1924	半津	151	17
合计						<b>1,010</b>	<b>90</b>
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前教会学校）							
ABD2163	SJK(T) Methodist, Ipoh	霹雳	城区	1948	半津	115	16
ABD3062	SJK(T) St. Mary's, Parit Buntar	霹雳	城区	1932	全津	182	28
BBD0079	SJK(T) Methodist, Kapar	雪兰莪	城区	1951	半津	708	45
NBD4069	SJK(T) Convent, Seremban 2 （宏愿学校）	森美兰	城区	1953	全津	645	43
合计						<b>1,650</b>	<b>132</b>
总数						<b>2,660</b>	<b>222</b>

资料来源：同表1。

表9：教会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概况（2020年统计）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AEB2052	SMJK Ave Maria Convent, Ipoh	霹雳	城区	1938	半津	1,623	108
AEB2053	SMJK Sam Tet, Ipoh	霹雳	城区	1952	半津	1,870	145
AEBA002	SMJK Katholik, Tanjong Malim	霹雳	城区	1961	半津	464	45
BEB8653	SMJK Katholik, Petaling Jaya	雪兰莪	城区	1956	半津	2,885	144
CEB0020	SMJK Katholik, Bentong	彭亨	城区	1957	半津	473	40
MEB2099	SMJK Katholik, Kampung Tujuh	马六甲	城区	1958	半津	744	62
MEB2100	SMJK Notre Dame Convent, Kampung Tujuh	马六甲	城区	1960	半津	993	70
PEB1098	SMJK Convent Datuk Keramat,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947	半津	944	74
PEB1103	SMJK Heng Ee, Georgetown	槟城	城区	1966	半津	3,262	199
PEB3036	SMJK Sacred Heart, Balik Pulau	槟城	城区	1950	半津	679	62
XFE2054	SMJK Sung Siew, Sandakan	沙巴	城区	1907	半津	1,344	75
XFE4027	SMJK Lok Yuk, Likas,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34	半津	1,808	106
XFE4045	SMJK Shan Tao,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63	半津	1,008	55
XFE5036	SMJK Lok Yuk, Kudat	沙巴	乡区	1912	半津	607	43
YFB6302	SMJK Tong Hua, Bintangor	砂拉越	乡区	1947	半津	189	25
合计						<b>18,893</b>	<b>1,253</b>

资料来源：同表1。

#### 四、教会学校的津贴类别和城乡学生人数

2020年6月，全国432所教会学校有206,860名学生，当中429所（99.31%）为“半津贴学校”有205,384名学生（99.29%），其余3所（0.69%）为“全津贴学校”有1,476名学生（0.71%）。绝大部分教会学校被教育部列为半津贴学校，这比同年全国1,299所华小的“半津贴学校”比率（67.98%，883所）和全国527所淡小的“半津贴学校”比率（69.25%，365所）来得更高。这种“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学校划分，是教育部官员根据自己的想法另搞一套，完全错误和没有法律根据，且违反教育法令的相关规定，导致教会学校、华小、淡小、改制中学等，长期都面对发展拨款不足问题。

城区教会学校有273所（63.19%）和167,010名学生（80.74%），乡区教会学校则有159所（36.81%）和39,850名学生（19.26%）。这显示教会学校大部分学生（约80%）集中在城区。

表10：全国城乡区教会学校数量和學生人数（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全津贴学校						半津贴学校						合计					
	学校数量		學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學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學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學生人数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玻璃市	1	0	465	0	0	0	0	0	1	0	465	0	0	1	0	465		
吉打	1	0	593	0	7	0	2,632	0	8	0	3,225	0	8	0	3,225			
檳城	0	0	0	0	31	0	20,114	0	31	0	20,114	0	31	0	20,114			
霹靂	0	0	0	0	57	1	32,525	349	57	1	32,525	349	58	1	32,874			
雪兰莪	0	0	0	0	26	0	19,395	0	26	0	19,395	0	26	0	19,395			
吉隆坡	1	0	418	0	29	0	12,340	0	30	0	12,758	0	30	0	12,758			
森美兰	0	0	0	0	6	0	3,590	0	6	0	3,590	0	6	0	3,590			
马六甲	0	0	0	0	18	0	9,188	0	18	0	9,188	0	18	0	9,188			
柔佛	0	0	0	0	19	2	9,435	521	19	2	9,435	521	21	2	9,956			
彭亨	0	0	0	0	6	0	2,847	0	6	0	2,847	0	6	0	2,847			
纳閩	0	0	0	0	3	0	1,194	0	3	0	1,194	0	3	0	1,194			
沙巴	0	0	0	0	40	57	32,965	19,338	40	57	32,965	19,338	97	114	52,303			
砂拉越	0	0	0	0	28	99	19,309	19,642	28	99	19,309	19,642	127	38,951	38,951			
<b>合计</b>	<b>3</b>	<b>0</b>	<b>1,476</b>	<b>0</b>	<b>270</b>	<b>159</b>	<b>165,534</b>	<b>39,850</b>	<b>273</b>	<b>159</b>	<b>167,010</b>	<b>39,850</b>	<b>432</b>	<b>206,860</b>	<b>432</b>	<b>206,860</b>		
<b>总数</b>	<b>3</b>	<b>0</b>	<b>1,476</b>	<b>0</b>	<b>429</b>	<b>3</b>	<b>205,384</b>	<b>432</b>	<b>432</b>	<b>3</b>	<b>206,860</b>	<b>432</b>	<b>432</b>	<b>206,860</b>	<b>432</b>	<b>206,860</b>		

大马半岛	3	0	1,476	0	199	3	112,066	870	202	3	113,542	870	205	114,412
沙巴和 纳閩	0	0	0	0	43	57	34,159	19,338	43	57	34,159	19,338	100	53,497
砂拉越	0	0	0	0	28	99	19,309	19,642	28	99	19,309	19,642	127	38,951

西马	3	0	1,476	0	199	3	112,066	870	202	3	113,542	870	205	114,412
东马	0	0	0	0	71	156	53,468	38,980	71	156	53,468	38,980	227	92,448

资料来源：同表1。

注1：根据教育部统计，上述3所全津贴学校是玻璃市加央SK Stella Maris (RBB0042)，吉打亚罗士打SMK St. Michael (KEB2097)，吉隆坡SMK St. Gabriel (WEB0222)。

注2：教育部官员根据校地拥有权，把学校分为“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这是官员自造的名词，《1996年教育法令》没有这两个名词。后来，官员把自造的“全津贴学校” (sekolah bantuan penuh) 和“半津贴学校” (sekolah bantuan modal) 分别等同于《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政府学校” (sekolah kerajaan) 和“政府资助学校” (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是一种偷换概念和错误的做法。

马来西亚半岛/西马有205所教会学校，即3所城区全津贴学校、199所城区半津贴学校和3所乡区半津贴学校，当中城区学校占202所（98.54%）。东马的227所教会学校全部是半津贴学校，城区学校有71所（31.28%），乡区学校有156所（68.72%）。

表11：全国各区域教会学校数量、学生和教师人数（2020年统计）

区域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数量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大马半岛	205	47.45	114,412	55.31	9,338	56.99
沙巴和纳闽	100	23.15	53,497	25.86	3,637	22.20
砂拉越	127	29.40	38,951	18.83	3,411	20.82
<b>总数</b>	<b>432</b>	<b>100</b>	<b>206,860</b>	<b>100</b>	<b>16,386</b>	<b>100</b>

西马	205	47.45	114,412	55.31	9,338	56.99
东马	227	52.55	92,448	44.69	7,048	43.01

资料来源：同表1。

最多学生的教会学校是檳城恒毅国民型中学（3,262人），最少的是砂拉越加帛的1所国小（SK Lubuk Matawang, Kapit, 18人）。全国有96所教会学校（22.22%）是学生少于150人的微型学校，当中21所的学生少于50人（表13）。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团体或热心社会人士可对此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了解各校具体情况，探讨对策。

表12：学生人数最多的首10所教会学校（2020年统计）

序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直辖区	城乡	创校年份	津贴类别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1.	PEB1103	SMJK Heng Ee, Georgetown	檳城	城区	1966	半津	3,262	199
2.	BEB8653	SMJK Katholik, Petaling Jaya	雪兰莪	城区	1956	半津	2,885	144
3.	YFB3101	SMK Methodist, Sibul	砂拉越	城区	1949	半津	1,933	151
4.	XCC4044	SJKC Shan Tao,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38	半津	1,893	77
5.	AEB2053	SMJK Sam Tet, Ipoh	霹靂	城区	1952	半津	1,870	145
6.	XFE4027	SMJK Lok Yuk, Likas,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34	半津	1,808	106
7.	AEB2052	SMJK Ave Maria Convent, Ipoh	霹靂	城区	1938	半津	1,623	108
8.	XFE4001	SMK All Saints, Kota Kinabalu	沙巴	城区	1903	半津	1,539	85
9.	AEE1026	SMK Methodist (ACS), Setiawan	霹靂	城区	1903	半津	1,537	130
10.	MEB2093	SMK Tinggi St. David, Bukit Baru	马六甲	城区	1912	半津	1,487	78

资料来源：同表1。

表13：学生少于50人的教会学校（2020年统计）

序	学校编号	校名和地点	州/ 直辖区	城乡	创校 年份	津贴 类别	学生 人数	教师 人数
1.	YCB7108	SK Lubuk Matawang, Kapit	砂拉越	乡区	1952	半津	18	8
2.	YCB7103	SK Ng Meluan, Kapit	砂拉越	乡区	1952	半津	19	8
3.	YCB7104	SK Nanga Entuloh, Kapit	砂拉越	乡区	1953	半津	19	7
4.	YCB1317	SK St. Philip, Kuching	砂拉越	乡区	1950	半津	24	10
5.	YCB2103	SK St. Paul,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853	半津	26	10
6.	YCB2105	SK St. Dunstan,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857	半津	27	9
7.	ABD9007	SJKT Methodist, Malim Nawar	霹雳	城区	1946	半津	27	7
8.	XCA6320	SK St. Augustine, Kuala Penyu	沙巴	乡区	1960	半津	27	10
9.	YCB2407	SK St. Barnabas, Betong	砂拉越	乡区	1957	半津	28	11
10.	YCB8217	SK All Saints Plaman Nyabet, Serian	砂拉越	乡区	1959	半津	28	8
11.	YCB2410	SK St. Mark, Betong	砂拉越	乡区	1961	半津	28	12
12.	YCB3502	SK St. Luke Ng Baoh, Dalat	砂拉越	乡区	1956	半津	29	12
13.	YCB2106	SK St. Leo Gayau,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958	半津	32	14
14.	YCB7102	SK Ng Tiau, Kapit	砂拉越	乡区	1959	半津	35	13
15.	YCB8211	SK St. Norbert Paun Gahat, Serian	砂拉越	乡区	1960	半津	39	12
16.	YCB7107	SK Sg. Menuan, Kapit	砂拉越	乡区	1967	半津	39	11
17.	YCB2203	SK St. Michael Plassu, Saratok	砂拉越	乡区	1958	半津	44	12
18.	YCB2101	SK St. Martin, Sri Aman	砂拉越	乡区	1953	半津	45	12
19.	YCB3503	SK St. Mark, Sibul	砂拉越	乡区	1955	半津	45	11
20.	YCB1301	SK Emperoh Jambu, Kuching	砂拉越	乡区	1958	半津	46	12
21.	YCB1327	SK St. James Rayang, Kuching	砂拉越	乡区	1961	半津	47	13

资料来源：同表1。

此外，有253所教会学校（58.56%）介于150至799名学生，81所（18.75%）介于800至1,999名学生，只有2所（0.46%）各有2,885和3,262名学生。对比华文独中，教会学校没有超大规模的学校。

表14：全国教会学校学生人数规模分布（2020年统计）

学生人数 规模	城区		乡区		合计			
	学校 数量	学生 人数	学校 数量	学生 人数	学校 数量	比率 %	学生 人数	比率 %
<b>≤149</b>	<b>25</b>	<b>2,548</b>	<b>71</b>	<b>5,663</b>	<b>96</b>	<b>22.22</b>	<b>8,211</b>	<b>3.97</b>
1-9	0	0	0	0	0	0.00	0	0.00
10-19	0	0	3	56	3	0.69	56	0.03
20-29	1	27	8	217	9	2.08	244	0.12
30-39	0	0	4	145	4	0.93	145	0.07
40-49	0	0	5	227	5	1.16	227	0.11
50-99	9	643	24	1,778	33	7.64	2,421	1.17
100-149	15	1,878	27	3,240	42	9.72	5,118	2.47
<b>150-799</b>	<b>173</b>	<b>78,898</b>	<b>80</b>	<b>26,523</b>	<b>253</b>	<b>58.56</b>	<b>105,421</b>	<b>50.96</b>
150-199	8	1,407	17	2,943	25	5.79	4,350	2.10
200-299	26	6,391	26	6,410	52	12.04	12,801	6.19
300-399	39	13,706	16	5,716	55	12.73	19,422	9.39
400-499	35	15,644	7	3,031	42	9.72	18,675	9.03
500-599	29	16,215	6	3,190	35	8.10	19,405	9.38
600-699	16	10,518	7	4,471	23	5.32	14,989	7.25
700-799	20	15,017	1	762	21	4.86	15,779	7.63
<b>800-1,999</b>	<b>73</b>	<b>79,417</b>	<b>8</b>	<b>7,664</b>	<b>81</b>	<b>18.75</b>	<b>87,081</b>	<b>42.10</b>
800-899	26	22,099	5	4,166	31	7.18	26,265	12.70
900-999	8	7,589	1	991	9	2.08	8,580	4.15
1,000-1,499	32	37,526	2	2,507	34	7.87	40,033	19.35
1,500-1,999	7	12,203	0	0	7	1.62	12,203	5.90
<b>2,000-3,499</b>	<b>2</b>	<b>6,147</b>	<b>0</b>	<b>0</b>	<b>2</b>	<b>0.46</b>	<b>6,147</b>	<b>2.97</b>
2,000-2,499	0	0	0	0	0	0.00	0	0.00
2,500-2,999	1	2,885	0	0	1	0.23	2,885	1.39
3,000-3,499	1	3,262	0	0	1	0.23	3,262	1.58
<b>合计</b>	<b>273</b>	<b>167,010</b>	<b>159</b>	<b>39,850</b>	<b>432</b>	<b>100</b>	<b>206,860</b>	<b>100</b>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0年6月30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0年6月30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据报道，在教育部于2020年落实学校等级调整计划下，学生人数150名以下（1-149人）的学校列为微型学校即C型学校，150至799人的是B型学校，800人及以上的是A型学校。<sup>8</sup>

<sup>8</sup> 〈学生人数降 吉14华小或变微小〉，《星洲日报》，2018年11月23日；〈教部调整学校等级 逾1300学生还是微小！竞智华小务德华小有望升级〉，《中国报》，2019年3月13日。

表15：全国各地各规模教会学校数量和學生人数（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各规模学校数量和學生人数														合计	
	1-29		30-149		150-799		800-1,999		2,000-3,499		学校数量		學生人数			
	学校	學生	学校	學生	学校	學生	学校	學生	学校	學生	学校	%	學生	%		
玻璃市	0	0	0	0	1	465	0	0	0	0	1	0.23	465	0.22		
吉打	0	0	1	139	7	3,086	0	0	0	0	8	1.85	3,225	1.56		
檳城	0	0	3	342	18	7,375	9	9,135	1	3,262	31	7.18	20,114	9.72		
霹靂	1	27	7	834	37	17,016	13	14,997	0	0	58	13.43	32,874	15.89		
雪兰莪	0	0	2	154	13	6,035	10	10,321	1	2,885	26	6.02	19,395	9.38		
吉隆坡	0	0	5	473	20	7,701	5	4,584	0	0	30	6.94	12,758	6.17		
森美兰	0	0	0	0	4	1,698	2	1,892	0	0	6	1.39	3,590	1.74		
马六甲	0	0	3	290	11	4,671	4	4,227	0	0	18	4.17	9,188	4.44		
柔佛	0	0	1	77	17	7,356	3	2,523	0	0	21	4.86	9,956	4.81		
彭亨	0	0	0	0	6	2,847	0	0	0	0	6	1.39	2,847	1.38		
纳閩	0	0	0	0	3	1,194	0	0	0	0	3	0.69	1,194	0.58		
沙巴	1	27	13	1,509	61	26,287	22	24,480	0	0	97	22.45	52,303	25.28		
砂拉越	10	246	49	4,093	55	19,690	13	14,922	0	0	127	29.40	38,951	18.83		
<b>合计</b>	<b>12</b>	<b>300</b>	<b>84</b>	<b>7,911</b>	<b>253</b>	<b>105,421</b>	<b>81</b>	<b>87,081</b>	<b>2</b>	<b>6,147</b>	<b>432</b>	<b>100</b>	<b>206,860</b>	<b>100</b>		

资料来源：同表14。

## 五、学校拥有权和学校土地拥有权的分别

如前述表10所列数字，绝大部分教会学校（429所，99.31%）被教育部列为所谓的半津贴学校，这是非常高的比率，比华小（883所，67.98%）和淡小（365所，69.25%）的半津贴学校比率高出许多。这现象应受到关注和剖析。

此外也出现另一个现象，即教会团体的教会学校在失去校地拥有权，改由政府拥有有关校地后，这些学校就“被视为所谓的全津贴学校或政府学校，不再属于教会团体属下的教会学校”<sup>9</sup>，且从教会学校名单中除名，导致教会学校数量日渐减少。这些错误印象或误解应获得厘清和纠正。

这其中原因是对“学校拥有权”和“校地拥有权”、“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存有错误认知或误解，把它们混为一谈，对这几个不同名词的真正含义和分别混淆不清。

例如有些观点认为，当一所政府资助学校的土地拥有权变成是联邦政府的，该所学校就改为政府学校，以及不再有学校董事会。这观点是一个误解，其实该所学校依然是政府资助学校，仍有学校董事会，不是政府学校。

因此必须认清前述几个不同名词的含义。首先，“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这两个名词早在1970年代出现。教育部一直采用这些名词，目的在于限制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前英文中小学、改制中学（前华文中学）的拨款和发展。

直到1998年1月14日，教育部管理理事会会议批准《1998年学校扩建和重建指南》，根据校地拥有权来划分学校，把校地属于联邦政府的学校列为“全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penuh*），校地不属于联邦政府的学校列为“半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modal*）。事实上，《1996年教育法令》里完全没有“*sekolah bantuan penuh*”和“*sekolah bantuan modal*”这

<sup>9</sup> 为方便说明，本文称这些学校为“失落的教会学校”（The Lost Mission Schools）。

样的学校划分和名词。“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是教育部官员自造或自定释义的名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名词。

2000年5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以及负责拟订《1998年学校扩建和重建指南》的官员，与董教总代表对话。在董教总代表的提问下，该名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主任回答，“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这两个名词以及根据校地拥有权划分学校，是根据官员自己的想法做出来的，没有法律根据，接着便径自离开，对话被迫结束。<sup>10</sup>

2008年11月28日，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主任阿米尔博士接受媒体访问时声称，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是以校地拥有权作为区分；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与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没有分别，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他承认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是不正确的用词，在教育法令下只有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董教总曾对此发表文告，指出其错误之处。<sup>11</sup>

由此可见，教育部终于承认教育法令里没有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名词和学校分类。其实，《1996年教育法令》不是以校地拥有权来区分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但是，教育部却继续把“全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penuh*）等同于“政府学校”（*sekolah kerajaan*），以及把“半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modal*）等同于“政府资助学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该部还在行政措施上，以“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名词，来代替“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名词。该部在文件或资料上，把以前所列的“全津贴学校”改称为“政府学校”，以及把“半津贴学校”改称为“政府资助学校”。这实是以另一种偷换概念方式，假借“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之名，来延续“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差别对待。这是教育部官员自搞一套的错误做法，没有法律根据，违反《1996年教育法令》。事实上，《1996年教育

<sup>10</sup> 见本人在《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七期所撰〈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学校发展概况——起源历程、现况和发展规划〉一文内的附录：关于“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与“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的说明。

<sup>11</sup> 董教总文告（2008年12月1日），针对全津与半津学校的事宜发表文告，（<https://resource.dongzong.my/2008/1928-declare-2008-18>）。

法令》下的“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与官员自造的“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实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此外，“学校拥有权”（*school ownership*）和“学校土地拥有权”（*school land ownership*）是两个不同的拥有权，不能混为一谈或当作是同样的东西。

一所学校的创办者是该所学校的拥有者，该创校者享有学校拥有权。如果该创校者在自己拥有的土地经营学校，创校者也是地主，那么该创校者享有学校拥有权和校地拥有权。如果该创校者在其他人拥有的土地经营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该创校者依然享有学校拥有权，学校拥有权不会变成属于其他人（地主）的，但由于该创校者不是地主，因此不享有校地拥有权。这就犹如A创办了一间公司，虽然在B拥有的土地或建筑物经营该公司，但该公司是属于A拥有的，公司拥有权不会因而变成属于B（地主或建筑物业主）的。

因此，就算某所教会学校的土地拥有权属于联邦政府，或教会团体把校地拥有权交给了联邦政府，或是教会团体的校地因地契期满不获延长而变成州政府/联邦直辖区政府/联邦政府拥有该校地，但是作为创办该所教会学校的教会团体依然享有该校的学校拥有权，该校依然是政府资助学校，不会因为校地是政府拥有的而变成政府学校。

另一方面，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16条款，国家教育体系内有三种教育机构，即“政府教育机构”（*governm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政府资助教育机构”（*government-aid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和“私立教育机构”（*priva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该法令第2条款阐明，“政府学校”或“政府教育机构”是指在本法令第四章下由部长设立和完全维持的学校或教育机构。“政府资助学校”或“政府资助教育机构”是指获得资本拨款（俗称发展拨款）和全部的资助拨款（俗称行政拨款）的学校或教育机构。“私立学校”或“私立教育机构”是指不是政府设立或资助的学校或教育机构。

该法令也对政府资助学校享有的两种拨款作出阐明，即“资本拨款”是指从公共基金中支付给教育机构的款项，用于——（a）提供建筑物；（b）翻修或扩建现有校舍；（c）为新建、翻修或扩建的校舍提供家私或配备；或（d）其他指定的用途。“资助拨款”是指从公共基金中支付给教育机构的任何款项，但资本拨款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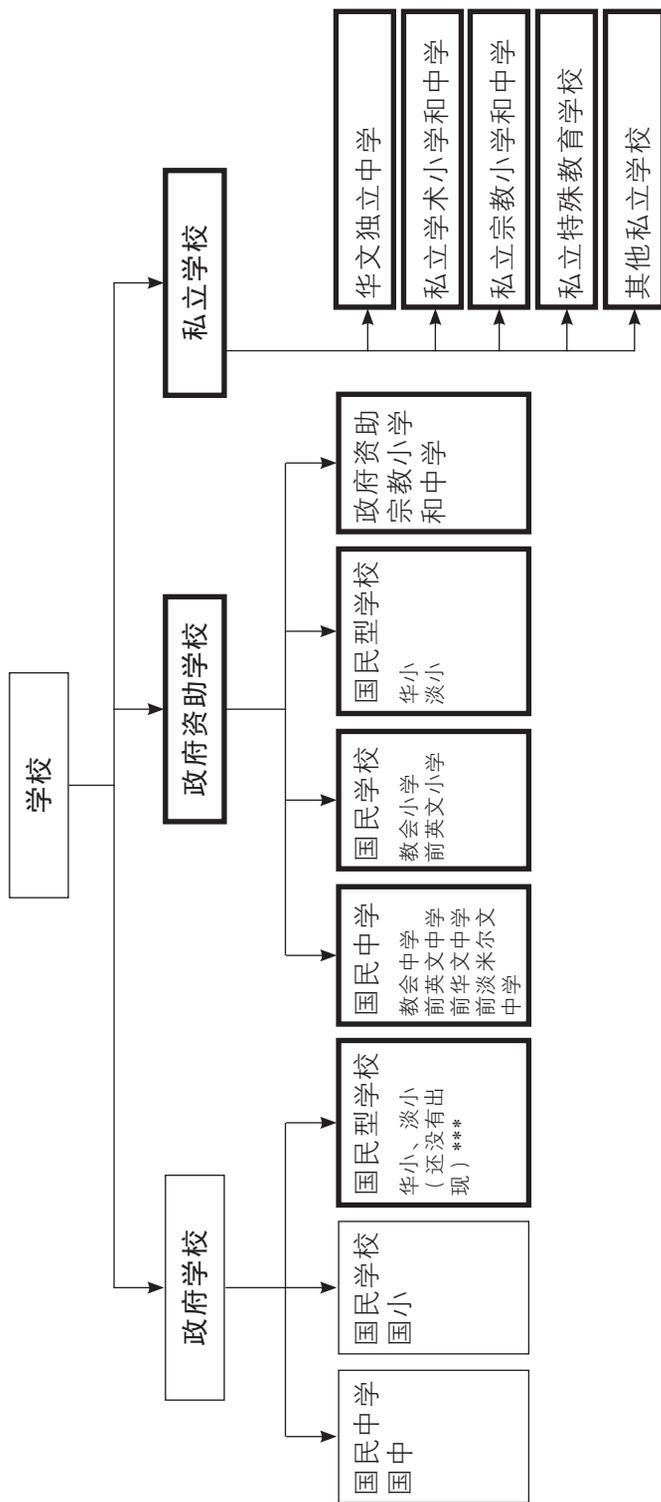
这些教育机构或学校的类型包括“国民学校”（国小），是指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政府小学或政府资助小学；“国民型学校”（华小、淡小），是指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政府小学或政府资助小学，或是以淡米尔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政府小学或政府资助小学；国民中学（国中），是指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政府中学或政府资助中学。<sup>12</sup>

综上所述，兹在图1列出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学校划分。《1996年教育法令》是根据学校拥有权和学校教学媒介语，对学校进行划分和定义。政府学校、政府资助学校、私立学校涉及学校拥有权，而学校土地拥有权与学校拥有权是没有关联的；至于国小、华小、淡小、国中等学校则涉及学校教学媒介语。



<sup>12</sup> 见附录7：关于《1996年教育法令》对几个名词的释义（Interpretation）。

图1：马来西亚《1996年教育法令》下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学校划分



注：

1. 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15条款，国家教育体系必须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和高等教育，但不包括外国侨民学校、国际学校的教育。
2. 上图里粗边框内的学校是《1996年教育法令》所规定必须有学校董事会的学校。
3. 上图里有\*\*\*符号的学校，是指在《1996年教育法令》第28条款下，教育部长可以设立并且必须维持的国民型学校。这类可由政府设立或创办的国民型学校（华小、淡小）是政府学校，必须有学校董事会，以华语或淡米尔语为主要教学媒介，但这类学校至今还没有设立或出现。《1996年教育法令》实施后获得政府批准增建的华小和淡小，是民间设立/创办的学校（不是政府设立/创办的学校），而且不论谁是学校土地的拥有者，有关学校都是政府资助学校。但是，有一些新增建的华小和淡小因校地属联邦政府拥有，而被教育部错误地列为所谓的政府学校。其实，这些校地属于联邦政府，由民间创办的新增建华小和淡小，是政府资助学校，不是政府学校。

政府学校是教育部长（意即联邦政府）设立/创办的学校，政府学校的学校拥有权属于联邦政府。政府资助学校是民间设立/创办的学校，不是教育部长/联邦政府设立/创办的学校，因此民间创校者享有政府资助学校的学校拥有权，学校拥有权不属于联邦政府。私立学校是民间创办的学校，民间创校者享有私立学校的学校拥有权。

教会学校是民间创办的学校，包括英殖民政府时期由某些“州”政府把早期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的学校拥有权，移交给教会团体改办而成的教会学校。各教会团体是各自所创办教会学校的学校拥有者，教会学校接受政府的资助，是政府资助学校，拥有学校董事会作为教会学校的管理者，并享有《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全部资助拨款（行政拨款）和资本拨款（发展拨款）的法定权利。

因此，各界必须认清，那些失去校地拥有权而被错误当作所谓政府学校的“失落的教会学校”，其学校拥有权依然归属于有关教会团体，有关教会团体只是没有了有关校地拥有权，改由政府拥有有关校地，但是这些学校依然是教会学校，是政府资助学校，不是政府学校。因此应继续保留这些学校在教会学校名单里，而不是从名单中除名。例如，虽然一些华小、淡小的校地变成联邦政府拥有，但是这些学校的学校拥有权仍属于创校者的，它们依然继续保留在华小、淡小学校名单里，没有除名。

另一需关注的重要课题是，有些政府当局不延长教会学校土地地契期限，或是征用教会学校土地，甚至要把教会学校从政府资助学校改为政府学校。这引发极大争议，甚至产生法律诉讼案件。举例，此事曾发生在彭亨州关丹圣多玛小学和中学（SK St. Thomas , SMK St. Thomas）<sup>13</sup>，以及吉隆坡咖啡山姑娘堂中学（SMK Convent Bukit Nanas）<sup>14</sup>。咖啡山姑娘堂中学并非首所不获延长校地地契期限的教会学校，因在过去10年曾有5所教会学校在无法延长校地地契期限后，就遭错误地改为所谓的政府学校。<sup>15</sup>在

<sup>13</sup> “Famous school may be on its last lap”, The Star, 4 January 2016.

<sup>14</sup> “CBN will not be demolished”, The Star, 21 April 2021.

“PMO: Land lease for Convent Bukit Nanas extended by 60 years”, The Star, 22 April 2021.

<sup>15</sup> 〈10年间5校不获续租土地 咖啡山姑娘堂学校非首间〉，《透视大马》，2021年4月22日。

咖啡山姑娘堂中学土地课题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后，首相署宣布延长该校的土地租赁期限60年用于教育用途。<sup>16</sup>

## 六、创办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机构

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会学校有超过200年的发展历程，连同其他各类学校丰富了社会的多元文化特质和人才培养，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势。教会学校在其辉煌成就的发展路程中，曾有过高峰期，惟随着政府进一步实施教育和语文单元化政策，从1970年代起经历改制后至今面对种种困难。教会创办的华小、淡小没有改制，其主要教学媒介语依然分别是华语、淡米尔语；然而，教会英文小学、英文中学和华文中学则面对改制。教会华文中学的教学媒介语，先改为英语后再改为马来语；英文小学和英文中学的教学媒介语则从英语改为马来语。此外，教会学校的教职员改由政府委派，教会团体和学校董事会逐渐丧失学校管理权。因此，教会学校的办学精神、特征和校园文化以及优质教育难以传承，导致许多教会学校面对低落困境。

尽管教会团体和教会学校团体曾多次向政府反映教会学校面对的各种问题，而教育部也发出一些专业通函<sup>17</sup>，惟在执行上却出现各种困难，教会学校面对的各种问题仍没获得显著改善。

为开拓发展空间，有些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团体和教会学校董事会提出创办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机构。某些教会团体自置物业、土地，或收回教会学校原有土地和物业，通过公司、基金会或合作伙伴等方式，以创办和管理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有些教会团体在保留原有教会国小、国中的情况下，另开办私立学校、国际学校。

<sup>16</sup> Pejabat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Kenyataan Media : Pelanjutan Pajakan Tapak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Convent Bukit Nanas”, 22 April 2021.

<sup>17</sup> 1.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1: Pemberitahuan Kuota 10 Peratus Untuk Pemilihan Dan Penempatan Murid Ke Sekolah Mubaligh Kepad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Sekolah Mubaligh.  
2.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3: Pelantikan Pengetua Sekolah Menengah dan Guru Besar Sekolah Rendah Mubaligh.

本文从教育部于2021年所列69所私立小学、68所私立中学和193所国际学校名单中，整理出获准开办且具有教会学校办学特色的22所学校，即涵盖了5所私立小学、7所私立中学和10所国际学校。根据教会团体所列资料，还另有1所教会学院和1所职业培训中心，以及在各地设立的神学院。

表13：具有教会学校办学特色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私立学院、职业培训中心名单

序	学校编号	校名	地点	学校名单 排序号
<b>私立小学</b>				
1.	NDA4001	Sekolah Rendah St. Benedict	森美兰芙蓉	12
2.	YDAL004	Sekolah Rendah St. Joseph, Kuching	砂拉越古晋	40
3.	BDAD004	Sekolah Rendah Stella Maris (Caw. Ampang)	雪兰莪安邦	58
4.	BDAC002	Sekolah Rendah Wesley Methodist	雪兰莪 斯里煤炭田镇	60
5.	WDA0009	Sekolah Rendah Stella Maris	吉隆坡武吉白沙罗	68
<b>私立中学</b>				
1.	NGA4002	Sekolah Menengah St. Benedict	森美兰芙蓉	18
2.	NGA4001	Sekolah Methodist Wesley	森美兰芙蓉	20
3.	AGE2002	Sekolah Menengah Wesley Methodist Ipoh	霹雳怡保	24
4.	YGAL004	Sekolah Menengah St. Joseph, Kuching	砂拉越古晋	36
5.	BGAA003	Sekolah Menengah Wesley Klang	雪兰莪巴生	39
6.	BGAC001	Sekolah Menengah Wesley Methodist	雪兰莪 斯里煤炭田镇	55
7.	WGA0004	Sekolah Menengah Stella Maris Pudu	吉隆坡富都	67
<b>国际学校</b>				
1.	CUBE004	Regent International School, Kuantan, Pahang	彭亨关丹	40
2.	AUB2007	Wesley Methodist Ipoh International	霹雳怡保	49
3.	PUBB002	Dalat International School	檳城丹絨武雅	50
4.	PUBB006	Wesley Methodist School Penang (International)	檳城乔治市	61
5.	YUBV001	St. Joseph's International School, Kuching	砂拉越古晋	70
6.	BUBJ008	St. Joseph's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chool PJ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	143
7.	WUB0030	St. John's International Primary School, Kuala Lumpur	吉隆坡咖啡山	178
8.	WUB0026	St. John's Inter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吉隆坡咖啡山	179
9.	WUB0025	Stella Maris International School Kuala Lumpur	吉隆坡武吉白沙罗	180
10.	WUB0020	Wesley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School, Sentul, KL	吉隆坡洗都	190
<b>其他机构</b>				
1.	-	Methodist College Kuala Lumpur (MCKL)	吉隆坡十五碑	
2.	-	Hope Methodist Vocational Centre (HMVC)	霹雳实兆远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私立教育司私立教育机构信息系统（SMIPS）；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际学校网站资料；教会团体网站资料；新闻报道。

注：

1. Dalat International School原于是于1929年在越南Dalat创办的一所私立教会寄宿学校，后因越战于1965年迁至泰国曼谷，不久后迁至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971年迁至槟城丹绒武雅。
2. 教会团体收回彭亨关丹SK St. Thomas和SMK St. Thomas的校地，两校于2014年迁离；与合作伙伴于2015年开办国际学校Regent International School。
3. 各地教会团体创办的神学院不列入上表。

## 七、结语

现有教会学校和“失落的教会学校”所面对的多个关键问题需获得解决或改善。联邦政府应对此负起重大责任，在拨款、师资、教学、校园文化和学校行政等方面，推行公平对待教会学校的有利政策和措施。政府也应尊重教会团体所具有的教会学校拥有权和学校土地拥有权，让学校董事会履行教育法令所赋予管理学校的职权，不应加以蚕食和诸多阻拦。

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团体和教会学校董事会应在全国、州和地方层面，加强组织和运作，促进教会学校发展。各校董事会也应加强组织和运作，培养接班人，进行董事个人注册，维护董事会主权和学校办学特色，设立董事会办公处，加强与各方（如校长、教职员、家教协会、校友会等）的交流和协作，促进学校软硬件建设，提高教育品质和学生表现。

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努力，上述教会和学校组织协同推动了多所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创办。这些学校的创校过程、办学情况和成果是深具价值的研究议题。



## 参考文献

1.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 God's Faithfulness Our Heritage 1956-2016,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60th-Anniversary-Comm-BOOK.pdf>), commemorative book celebrating 60 years of MCSC's mission school work in West Malaysia, 2016, pp.28-35.
2.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 Direc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http://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FCCMSM-Directory-July-2017.pdf>), July 2017, pp.58-69.
3. Bahagian Perancangan dan Penyelidikan Dasar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enarai Sekolah Mubaligh Seperti Pada 31 Oktober 2018.
4.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enarai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30 Jun 2020.
5.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Maklumat Asas Pendidikan 30 Jun 2020.
6. Bahagian Pendidikan Swast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istem Maklumat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 (SMIPS), <https://smips.moe.gov.my>
7.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0: Pelaksanaan Dasar Menghadkan Jumlah Maksimum Sepuluh (10) Mata Pelajaran Dan Penambahan Dua (2) Mata Pelajaran Tambahan Dalam Peperiksaan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13 Januari 2010.
8.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9 Tahun 1998: Penggunaan Budi Bicara Ketika Mengambil Tindakan, (Calon-calon yang dicadangkan ke jawatan Guru Besar dan Pengetua sekolah mubaligh), 3 September 1998.
9.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1: Pemberitahuan Kuota 10 Peratus Untuk Pemilihan Dan Penempatan Murid Ke Sekolah Mubaligh Kepad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Sekolah Mubaligh, 18 Mac 2011.
10.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2 Tahun 2011: Penubuhan Persatuan Agama Bukan Islam Di Sekolah-Sekolah Kerajaan Dan Sekolah Bantuan Kerajaan, 18 Mac 2011.
11.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4 Tahun 2011: Pelaksanaan Pengajaran Bible Knowledge Kepada Murid-murid Beragama Kristian Di Sekolah-Sekolah Kerajaan

- dan Sekolah-Sekolah Bantuan Kerajaan Selepas Waktu Persekolahan, 27 April 2011.
12. Pejabat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angan 1 Tahun 2013: Pelantikan Pengetua Sekolah Menengah dan Guru Besar Sekolah Rendah Mubaligh, 31 Januari 2013.
  13. Chan Geok Oon & Lim Boon Hock, The Mission to Reclaim Mission Schools, (<https://www.necf.org.my/newsmaster.cfm?&menuid=2&action=view&retrieveid=1043>; <https://www.necf.org.my/index.cfm?menuid=169>).
  14.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Gabungan Sekolah-Sekolah Mubaligh Kristian Malaysia, <https://www.fcmsm.org>
  15. FCMSM,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https://www.fcmsm.org/2019/10/the-formation-of-the-federation-of-christian-mission-schools-malaysia-fcmsm/>), 19 October 2019.
  16.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http://www.methodistchurch.org.my>
  17. 其他各教会团体、各教会学校网站内资料。
  18.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教育部/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http://mcoe.edu.my>
  19. Wesley Methodist School, <https://wms.edu.my/school/>
  20. St Joseph’s Institution (SJI), “A new Lasal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pens in Petaling Jaya”, HERALD Malaysia Online, (<http://www.heraldmalaysia.com/news/a-new-lasallian-international-school-opens-in-petaling-jaya/29534/5>), 3 June 2016.
  21. St. Joseph’s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chool PJ, <https://www.sji-international.edu.my>
  22. St Joseph’s Family of Schools, Kuching, <https://stjosephkuching.edu.my>
  23. The Stella Maris Schools, <https://www.stellamaris.edu.my>
  24. Regent International Schools, <https://www.regent.edu.my>
  25. Jolynn Francis, “Two schools to be relocated”,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community/2014/08/15/two-schools-to-be-relocated>), 15 August 2014.
  26. \_\_\_\_\_, “Education ministry plans to relocate SK, SMK St George (M)”, Malay Mail,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16/05/24/sk-smk-st-george-m-to-be-relocated/1126869>), 24 May 2016. (注：目前，这2所学校在原校地运作)

27. Samuel Aubrey, “SK St Teresa Serian will not be replaced by SK Sri Sadong – Radzi”, Borneo Post Online,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20/08/04/sk-st-teresa-serian-will-not-be-replaced-by-sk-sri-sadong-radzi/>), 4 August 2020.
28. St Joseph’s Family of Schools, Kuching, “Official Closure of Sekolah Kebangsaan (SK) St Joseph, Kuching”, (<https://stjosephkuching.edu.my/news-events/official-closure-of-sekolah-kebangsaan-sk-st-joseph-kuching/>), 22 December 2020.
29. \_\_\_\_\_, 〈教会学校的变质和没落·被政府忽略·没获社会支持·教会学校挣扎求存〉, 《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271374.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271374.html)), 2012年5月8日。
30. \_\_\_\_\_, 〈曾经的辉煌不再 教会学校路在何方?〉, 《透视大马》,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chinese/s/29113>), 2017年12月24日。
31. \_\_\_\_\_, 〈校地将还给地主 檳3教会学校2024年关闭〉, 《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1506.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1506.html)), 2019年6月21日。
32. \_\_\_\_\_, 〈教会学校理事会办线上会议 270代表探讨董事部运作〉, 《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45255.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45255.html)), 2020年9月19日。
33. K. Suthakar, “Famous school may be on its last lap”,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1/04/famous-school-may-be-on-its-last-lap-a-top-missionary-school-in-kuantan-is-on-the-verge-of-being-red/>), 4 January 2016.
34. Bavani M., “CBN will not be demolished”,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21/04/21/cbn-will-not-be-demolished>), 21 April 2021.
35. Noel Achariam, CBN not first mission school to be denied lease renewal, The Malaysian Insight,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s/311796>), 22 April 2021.
36. \_\_\_\_\_, 〈10年间5校不获续租土地 咖啡山姑娘堂学校非首间〉, 《透视大马》,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chinese/s/311787>), 2021年4月22日。
37. Pejabat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Kenyataan Media : Pelanjutan Pajakan Tapak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Convent Bukit Nanas”, (<https://www.pmo.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4/KENYATAAN-MEDIA->

PMO-PELANJUTAN-PAJAKAN-TAPAK-SEKOLAH-MENENGAH-KEBANGSAAN-CONVENT-BUKIT.pdf), 22 April 2021.

38. \_\_\_\_\_, “PMO: Land lease for Convent Bukit Nanas extended by 60 years”,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21/04/22/pmo-land-lease-for-convent-bukit-nanas-extended-by-60-years>), 22 April 2021.
39. \_\_\_\_\_, 〈学生人数降 吉14华小或变微小〉, 《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815117.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815117.html)), 2018年11月23日。
40. \_\_\_\_\_, 〈教部调整学校等级 逾1300学生还是微小! 竞智华小务德华小有望升级〉, 《中国报》, 2019年3月13日。
41. 邝其芳, 〈马来西亚学校的种类〉,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地位演变大事纪要(1950年-2010年)》, (<https://www.dongzong.my/infobook/book/book26.pdf>), 加影: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2011年2月, 页140-143。
42. 沈天奇, 〈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学校发展概况——起源历程、现况和发展规划〉,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 第七期, (<https://www.dongzong.my/v3/book/mer>), 加影: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2020年12月, 页29-63。
43. 董教总文告(2008年12月1日), 针对全津与半津学校的事宜发表文告, (<https://resource.dongzong.my/2008/1928-declare-2008-18>)。

## 附录

附录1：马来西亚半岛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2020年统计）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52	4	1927	1	1959	3	1840-1849	0	0.00
1860	3	1928	4	1960	3	1850-1859	4	1.95
1880	2	1929	6	1961	6	1860-1869	3	1.46
1885	2	1930	6	1962	3	1870-1879	0	0.00
1889	2	1931	2	1964	2	1880-1889	6	2.93
1891	1	1932	3	1965	3	1890-1899	23	11.22
1892	2	1933	5	1966	1	1900-1909	16	7.80
1893	2	1934	5	1967	1	1910-1919	17	8.29
1895	2	1935	2	1968	1	1920-1929	17	8.29
1896	2	1936	4	合计	205	1930-1939	34	16.59
1897	3	1938	5			1940-1949	17	8.29
1898	2	1939	2			1950-1959	48	23.41
1899	9	1940	6			1960-1969	20	9.76
1903	5	1945	4			合计	205	100
1904	4	1946	3					
1905	2	1947	2					
1907	3	1948	2					
1909	2	1950	6					
1910	2	1951	4					
1912	5	1952	3					
1914	2	1953	4					
1915	4	1954	7					
1919	4	1955	6					
1923	1	1956	5					
1924	3	1957	5					
1925	2	1958	5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48-1941	126	61.46
1942-1945	4	1.95
1946-1956	42	20.49
1957-1962	25	12.20
1963-1969	8	3.90
合计	205	100
1848-1956	172	83.90
1957-1969	33	16.10
1848-1962	197	96.10
1963-1969	8	3.90

资料来源：同表1。

附录2：沙巴和纳闽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2020年统计）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83	1	1947	1	1840-1849	0	0
1888	1	1948	3	1850-1859	0	0
1891	1	1949	2	1860-1869	0	0
1903	6	1951	1	1870-1879	0	0
1905	1	1952	2	1880-1889	2	2
1906	1	1953	1	1890-1899	1	1
1907	2	1954	2	1900-1909	10	10
1912	1	1955	1	1910-1919	4	4
1914	1	1957	3	1920-1929	8	8
1915	1	1958	1	1930-1939	13	13
1917	1	1959	1	1940-1949	12	12
1920	1	1960	5	1950-1959	12	12
1922	2	1961	5	1960-1969	38	38
1923	2	1962	4	合计	100	100
1927	3	1963	5			
1930	2	1964	3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931	2	1965	6	1848-1941	39	39
1933	1	1966	2	1942-1945	0	0
1934	1	1967	3	1946-1956	18	18
1935	2	1968	4	1957-1962	19	19
1936	1	1969	1	1963-1969	24	24
1937	2	合计	100	合计	100	100
1938	1			1848-1956	57	57
1939	1			1957-1969	43	43
1940	1			1848-1962	76	76
1946	5			1963-1969	24	24

资料来源：同表1。

附录3：砂拉越现有教会学校创校年份分布（2020年统计）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48	4	1949	2	1840-1849	4	3.15
1853	1	1950	3	1850-1859	2	1.57
1857	1	1951	2	1860-1869	2	1.57
1863	2	1952	7	1870-1879	0	0.00
1882	2	1953	4	1880-1889	5	3.94
1883	1	1954	5	1890-1899	1	0.79
1885	2	1955	7	1900-1909	6	4.72
1899	1	1956	6	1910-1919	1	0.79
1902	3	1957	9	1920-1929	6	4.72
1903	1	1958	9	1930-1939	8	6.30
1905	2	1959	5	1940-1949	17	13.39
1914	1	1960	6	1950-1959	57	44.88
1920	1	1961	3	1960-1969	18	14.17
1925	1	1962	2	合计	127	100
1927	2	1963	2			
1929	2	1964	1			
1931	1	1965	1			
1932	3	1967	2			
1933	1	1968	1			
1935	1	合计	127			
1937	1					
1939	1					
1945	2					
1946	4					
1947	5					
1948	4					

创校年份	学校数量	比率%
1848-1941	35	27.56
1942-1945	2	1.57
1946-1956	49	38.58
1957-1962	34	26.77
1963-1969	7	5.51
合计	127	100
1848-1956	86	67.72
1957-1969	41	32.28
1848-1962	120	94.49
1963-1969	7	5.51

资料来源：同表1。

附录4：全国城乡各类教会学校学生人数（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学生人数																	
	国小			华小			淡小			国中			改制中学			总数		
	城区	乡区	合计	城区	乡区	合计	城区	乡区	合计	城区	乡区	合计	城区	乡区	合计	城区	乡区	合计
玻璃市	46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65	0	0	465
吉打	1,141	0	0	0	0	2,084	0	0	0	0	0	0	0	0	3,225	0	0	3,225
檳城	4,246	0	3,945	0	0	7,038	0	0	4,885	0	0	0	0	0	20,114	0	0	20,114
霹靂	10,869	349	2,649	0	859	14,191	0	0	3,957	0	0	0	0	0	32,525	349	0	32,874
雪兰莪	7,783	0	0	0	0	8,727	0	0	2,885	0	0	0	0	0	19,395	0	0	19,395
吉隆坡	5,555	0	153	0	151	6,899	0	0	0	0	0	0	0	0	12,758	0	0	12,758
森美兰	1,429	0	269	0	0	1,892	0	0	0	0	0	0	0	0	3,590	0	0	3,590
马六甲	2,399	0	434	0	0	4,618	0	0	1,737	0	0	0	0	0	9,188	0	0	9,188
柔佛	3,708	168	1,378	0	0	4,349	353	0	0	0	0	0	0	0	9,435	521	0	9,956
彭亨	1,899	0	0	0	0	475	0	0	473	0	0	0	0	0	2,847	0	0	2,847
纳闽	445	0	0	0	0	749	0	0	0	0	0	0	0	0	1,194	0	0	1,194
沙巴	10,934	10,204	5,357	1,423	0	12,514	7,104	0	4,160	607	0	0	0	0	32,965	19,338	0	52,303
砂拉越	6,662	14,850	3,282	696	0	9,365	3,907	0	0	189	0	0	0	0	19,309	19,642	0	38,951
<b>合计</b>	<b>57,535</b>	<b>25,571</b>	<b>17,467</b>	<b>2,119</b>	<b>1,010</b>	<b>72,901</b>	<b>11,364</b>	<b>0</b>	<b>18,097</b>	<b>796</b>	<b>167,010</b>	<b>39,850</b>	<b>206,860</b>					
大马半岛	39,494	517	8,828	0	1,010	50,273	353	0	13,937	0	113,542	870	114,412					
沙巴和 纳闽	11,379	10,204	5,357	1,423	0	13,263	7,104	0	4,160	607	34,159	19,338	53,497					
砂拉越	6,662	14,850	3,282	696	0	9,365	3,907	0	0	189	19,309	19,642	38,951					
西马	39,494	517	8,828	0	1,010	50,273	353	0	13,937	0	113,542	870	114,412					
东马	18,041	25,054	8,639	2,119	0	22,628	11,011	0	4,160	796	53,468	38,980	92,448					

资料来源：同表1。

附录5：全国各类教会学校教师人数（2020年统计）

州/ 直辖区	教师人数					
	国小	华小	淡小	国中	改制中学	合计
玻璃市	39	0	0	0	0	39
吉打	97	0	0	221	0	318
檳城	368	238	0	600	335	1,541
霹靂	985	169	73	1,372	298	2,897
雪兰莪	577	0	0	616	144	1,337
吉隆坡	463	19	17	632	0	1,131
森美兰	116	21	0	161	0	298
马六甲	226	51	0	338	132	747
柔佛	328	104	0	361	0	793
彭亨	153	0	0	44	40	237
纳闽	30	0	0	62	0	92
沙巴	1,596	382	0	1,288	279	3,545
砂拉越	2,052	272	0	1,062	25	3,411
合计	<b>7,030</b>	<b>1,256</b>	<b>90</b>	<b>6,757</b>	<b>1,253</b>	<b>16,386</b>

资料来源：同表1。

附录6：全国城乡各类教会学校教师人数（2020年统计）

州属/ 联邦 直辖区	教师人数											
	国小		华小		淡小		国中		改制中学		合计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城区	乡区
玻璃市	39	0	0	0	0	0	0	0	0	0	39	0
吉打	97	0	0	0	0	0	221	0	0	0	318	0
檳城	368	0	238	0	0	0	600	0	335	0	1,541	0
霹靂	959	26	169	0	73	0	1,372	0	298	0	2,871	26
雪兰莪	577	0	0	0	0	0	616	0	144	0	1,337	0
吉隆坡	463	0	19	0	17	0	632	0	0	0	1,131	0
森美兰	116	0	21	0	0	0	161	0	0	0	298	0
马六甲	226	0	51	0	0	0	338	0	132	0	747	0
柔佛	310	18	104	0	0	0	332	29	0	0	746	47
彭亨	153	0	0	0	0	0	44	0	40	0	237	0
纳闽	30	0	0	0	0	0	62	0	0	0	92	0
沙巴	750	846	269	113	0	0	787	501	236	43	2,042	1,503
砂拉越	469	1,583	199	73	0	0	774	288	0	25	1,442	1,969
合计	<b>4,557</b>	<b>2,473</b>	<b>1,070</b>	<b>186</b>	<b>90</b>	<b>0</b>	<b>5,939</b>	<b>818</b>	<b>1,185</b>	<b>68</b>	<b>12,841</b>	<b>3,545</b>

资料来源：同表1。

## 附录7：关于《1996年教育法令》对几个名词的释义（Interpretation）

- 政府学校/政府教育机构：“government school” or “governm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eans a school or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and fully maintained by the Minister under Part IV.
- 政府资助学校/政府资助教育机构：“government-aided school” or “government-aid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eans a school or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receipt of capital grant and full grant-in-aid.
- 私立学校/私立教育机构：“private school” or “priva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eans a school or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is not a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ided school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 资本拨款：“capital grant” means a payment from public funds to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or – (a) the provision of buildings; (b) the alteration to or extension of existing premises; (c) the provision of furniture or equipment for new, altered or extended premises; or (d) such other purposes as may be prescribed.
- 资助拨款：“grant-in-aid” means any payment from public funds, other than a capital grant, made to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 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 means a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ided primary school – (a) providing primary education appropriate for pupils from the age of six years; (b) us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c) in wh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a compulsory subject of instruction; and (d) in which facilities for the teaching of – (i) the Chinese or Tamil language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if the parents of at least fifteen pupils in the school so request; and (ii) indigenous languages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if it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so to do and if the parents of at least fifteen pupils in the school so request.
- 国民型学校：“national-type school” means a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ided primary school – (a) providing primary education appropriate for pupils from the age of six years; (b) using the Chinese or Tamil languag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c) in which the national and English languages are compulsory subjects of instruction.
- 国民中学：“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means a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ided secondary school – (a) providing a five-year cours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ppropriate for pupils who have just completed primary education; (b) us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c) in wh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a compulsory subject

of instruction; (d) in which facilities for the teaching of – (i) the Chinese or Tamil language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if the parents of at least fifteen pupils in the school so request; (ii) indigenous languages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if it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so to do and if the parents of at least fifteen pupils in the school so request; and (iii) Arabic, Japanese, German or French or any other foreign language may be made available if it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so to do; and (e) preparing pupils for such examinations as may be prescribed, and includes any such school providing a transition class.

#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 华教巨人郭全强



整理：林玉娟、谢春美\*

郭全强先生领导董总16年（担任副主席2年、署理主席2年和主席12年），是位非常杰出的华教领导人。他周身散发出来的魄力和影响力，是经过岁月的沉淀和经验的累积而聚成的人格魅力。在位董总主席期间，他为华教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赢得广大华社对董总的信任和赞扬。他的功绩，令他光芒四射，是位令人敬仰而又亲和力十足的领袖。

2005年，郭全强先生卸下董总主席的重担，回归家庭，过着平淡的退休生活。对于这一位充满领袖魅力的华教前辈，

他的事迹、经验总结及一些体会和感悟，对华

教工作者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同时应为后辈们所应谨记和学习。为了记录郭主席经历过和参与华教的过程，补充和验证文献上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董总资料与档案局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与郭主席进行了数次口述采访。相对于档案、文献等资料，口述历史在构建历史的完整性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为此，在整理本文的同时，本局口述历史团队于2021年顺应采访了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上曾与郭主席并肩的战友<sup>1</sup>，他们是居銮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前财政林国才和董总前副主席许海明局绅。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资料与档案局高级执行员 林玉娟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资料与档案局执行员 谢春美

<sup>1</sup> 因为冠病疫情关系，2021年4月2日，资料与档案局口述历史团队通过线上会议平台Zoom分别采访了郭全强的三位战友。





2007年1月20日，資料與檔案局口述歷史團隊在董總A座行政樓中委室第二次專訪郭主席。

2019年11月28日，郭主席與世長辭，享年90歲。消息傳來，令人為之悲痛惋惜，嘆一代華教巨人隕落，歸入黃土。12月8日，董總在雪州加影董教總教育中心行政樓舉辦一場追思會，昔日華教同道紛紛出席緬懷。追思會特別安排曾與郭主席并肩作戰的親密戰友及同道們發表追思感言。本文擇其重譽錄了數位華教前輩在追思會發表的感言，依序為：居銓中華中學廖偉強校長、柔佛州華校董教聯合會前任主席黃循積、董總前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前任教育主任吳建成。

## 一、童年與成長， 走進華教之路

郭全強先生自1993年獲選為董總主席，至2005年卸下領導棒子，這期間他各地奔波，任勞任怨，為的是民族教育的永續發展，顧全的是後代子孫的前程！當時我國政治氣候轉變，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略作小開放，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因而看俏。在他領導下的董總，遵循超越政黨、不超越政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原則，聯合各黨團，集聚全國華社力量，策動一系列活動如：“1219華教盛會”、“1214千萬心願”萬人宴、“飲水思源運

动”、“征求新纪元学院赞助人”运动、“筹募新院建设与发展基金”运动等。

如此一位有魄力的人，在面对各种打压和威迫时，他从来没想到过退缩，而是全副身心的投入。这跟他在年少时的成长经历、求学时大环境的影响、甚至太平洋战争逃难期间的经历，不无关系。年少时期，他深受郭氏家族中的长辈，尤其是祖父和父亲汲汲营营勤奋打拼的生活态度影响，以至于对他来说，努力，再努力，不断地努力，就是成功的最佳方法，也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我小的时候，祖父他们的奋斗精神，努力去开垦种植业，不讲究享受的生活态度给我很大的影响。另一个灌输到我们脑海的思想呢，是那时候正在进行的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有八路军，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听说了，所以这些影响我们。我就看就两种思想，一个就是父亲、祖父很努力去开垦，去开采，整天不在家，是吗？母亲她们……我母亲咧就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我上

小学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车（剪裁）的裤子啊、衣服啊，我母亲自己车的，又养鸡又洗衣服又什么，很能干的，所以我们就是从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奋斗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讲究享受。另外一个就是抗战，逃难，逃回中国……对我终身影响最大是到中国以后。”

“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我穿过草鞋，吃饭呢，没有油的，就是红色的米饭煮了一大箩，那么就加一点那个包菜，放一点盐水煮的，就这样吃。所以这个时候很艰苦的……冬天的时候我的手都生冻疮，穿的草鞋是用稻米秸秆织的，那时候物质条件很差，因为挨过这些，才会有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的思想，这是大时代产生的，我后来搞华文教育也是一样，所以……我是商人喔，应该是努力去赚钱嘛，我花了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时间去搞华文教育，所以你看那个重心受到影响。”

## 家庭背景

1930年，郭主席出生于柔佛州昔加末，祖籍海南文昌。从他的曾祖父郭始发南渡马来亚算起，郭主席已是马来西亚第四代华裔。小学念的是马六甲培风小学和英华小学，直到1941年11岁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马来亚，导致民不聊生，生命惨遭践踏与蹂躏，迫于无奈之下，郭主席全家随曾祖父郭始发逃难到中国。所以，郭主席初中是在桂林念书，1945年至1948年则是在四川的重庆读高中。

“1948年就考上北京大学，1952年毕业啦！我回来马来西亚呢，不是日本一投降我就回来，我家在1945年日本一投降就搬回来（马来亚）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读高中，所以我就继续在读就没有跟着家人走，我是什么时候回来呢，1957年我就离开中国，那时候我父亲在1956年的时候去世，我是家里的长子，家人就要求我回马来西亚去，我也申请很多年，所以1957年就到香港，住了几年……直到1960年以后（编按：口述历史团

队跟郭主席多次的访谈中，他反复提起于1959年回马，当时他29岁）就申请回到马来西亚（编按：应该是马来亚）。”

就像许许多多南来的华族同胞一样，曾祖父郭始发在树胶园丘当工人，勤奋工作几年后升为工头，就这样慢慢地、一点一滴的购置了数百英亩的橡胶园。这数百英亩的橡胶园由他的两位儿子继承，开启了家族垦殖事业。家族事业发展起来后，曾祖父的两位儿子分家各自发展。郭主席的祖父郭巨川在分家后，选择将橡胶园分给了下一代。

“我父亲就把树胶园卖了拿来做生意，我家里面其他的都是种植，我父亲就是做生意，最初是开忠德洋行，用胶园的钱开忠德，那时候我记得德国的那个照相机Leica是我们做代理的。后来就开巨昌，现在我的店还是叫巨昌，就做各种的生意，我父亲做过很多生意，昔加末这个区里面，开过cold storage，开过杂货店卖米什么，也有旅店，昔加末卖吃的巴刹是我们的……”

郭主席的父亲郭开基非常热衷于做生意，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拓展事业。童年时，郭主席跟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为了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小学教育，父亲将他和姐姐、弟妹送到马六甲念书，住在祖父家里。可以说，他和姐姐、弟妹是由祖父母和母亲养育长大的。直到11岁那年，他们全家逃难到中国。在回想起逃难的日子时，郭主席感慨万千，最后以一句：“不就是你过去那边你就要面对咯”概述了当时困苦的生活。

## 入读北大政治系

高中毕业后，学校本来计划保送他进入南开大学。但在当时的学生总认为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为理想，郭主席也受这种想法影响，因而报考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与北京籍的女同学梁丽明相爱，毕业后和她一起到了韶关，在梁丽明父亲办的碾米厂里帮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梁丽明结成夫妻。

## 回马继承家族事业

1956年，父亲郭开基先生因病在马来亚逝世。郭主席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一起申请回马继

承和管理家族事业。申请的过程费事又耗时，郭主席与妻儿先迁移到香港生活了两年，在香港等待批准的那段时间，两夫妻在旺角租了一层楼住，依靠家里寄来的生活费支撑生计。

直至1959年，郭主席才获得批准回到马来亚，那年他29岁，回到阔别18年的地方，感觉既陌生又亲切，他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当时的局势和环境变化，并且正式接管了家族中的全部生意。他秉承了父辈的开拓精神，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逐渐将家族的生意拓展到了锡矿业、油棕业、木材业、餐馆业和建筑业等。

“回来的条件是怎样？不准参加政治，不准参加任何政党，我回来的时候条件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参加政治，也没有参加什么党，我是无党派的，后来只参加华教啦！呵呵呵……”

## 投入社会活动，参与华教工作

经历多年的风风雨雨，吃尽苦头总算迎来朝阳。郭主席感怀社会赋予他的一切，而他认为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是参与社会活动，为华

人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活跃于乡团、商会，而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领袖魅力，也逐渐显现出来。

“回到马来西亚，过了一两年，我就参加社会活动……海南会馆的活动，我已经有参加海南会馆，作为会员，后来有做董事，那么真正参加华教事业是因为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进了华文小学，在居銮中华三小读书，后来就作为这个家教协会的主席，1973年到1976年是中华三小家教协会的主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因为我比较活跃啦，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中华三小都是一个銮中董事部管辖的，居銮中华中学董事部属下有这间小学，中华一小、二小、三小，那我做三小的家教协会……他们就认为最好也把我吸纳到中学的董事部那边，所以1974年我就成为居銮中华中学的董事。”

“我最初回来对华教也不是认识的，在中国没有种族的教育争斗问题，我回来之后

就是说哎呀，那么大惊小怪，整天要搞华教做什么，我不知道尖锐的斗争嘛，也是慢慢认识的……慢慢就知道办独立中学是很辛苦的，后来才慢慢知道单元化的教育法令，我以前不认识的，不是我对华文的认识低，因为马来西亚的情况我不熟悉，做了銮中的董事，慢慢知道这个斗争很尖锐，政府这个不准，什么都要靠自己筹钱，才慢慢认识的。”

郭主席将他大半辈子的时间奉献给了华教，他相信作为一个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的公民，这是他能做到也必须尽力而为的事。他曾说过，这一生，影响他最为深远的经历是在高中和大学念书时期。他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流离的生活，年轻学子对理想的执著和理念，经历过这一切，总会对身边的人、物、事，对社会多一些关心，总想着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正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郭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社会比较关心，对国家比较关心，因为这个是抗战的时候就有这种对政府不满啦，要改革啦什么这些，对社会比较关心，所以呢就有这种思想，回来以后做生意，一当了学校的一些职务了，家教协会，那么就开始了，第一个我一去不久就筹款建乒乓室了，我到了奎中，奎中从我做了董事长以后，建了五栋大楼，你知道吗？筹了两千多万，就带头来搞这些，自己也投入进去，也开始认识到这个单元化的，以前我不知道这么一个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单元化教育政策，后来就越做越清楚……”

## 成功男人的背后那个坚定的支柱

人生难得一知己，郭主席很幸运遇到了，还结成了连理。当他在华教这条路上越走越颠簸，责任越担越重大的时候，妻儿始终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力量。一直到他75岁时从董总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他所做的决定，都得到家人的支持。

“反正我就是这样过咯！没什么了，已经习惯了。一年不习惯，两年十几年还会怎么样，是吗！不过肯定，怎么样负面情绪、怎么样失掉我们的家庭聚会机会、怎么样使我工作上压力都好，可以肯定的一句，就是我们，以我为首的，我们全家人对他全力支持。这一点一定要肯定，如果我们不支持，他是寸步难走。”

有时候他走得太过了，我也会提出一点意见啦！说你有些可以推的就推咯！你走的太累了啦！但是，这些只是一时半时的，那个争吵啊是有的。我一边生他的气，就一边跟他收衣服，只有这样啦！是嘛！因为想到他不是去做什么，他是去做好事不是去做坏事，那么自己又压下来咯！最多的表现就是，关门大声一点。

我想最主要是两个点，第一就是，我跟全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生在战乱时期，就是我们

的价值观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感情比较稳固。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家庭啊我体会到，求同存异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孩子小不觉得怎么样。孩子长大了，他们又带了媳妇回来，人口增加了，又有孙噢！我13个孙，那么人口增加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他的自我空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好像印好像做饼一样都一样的。所以，他的出生不同，家庭环境不同，他的经历也不同。孩子同一个父母生，他也不同，他的性格也不同。所以慢慢体会到每个人需要有一定的自我，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全强他要去，我要做这个，所以这个家庭共同负责，各自区分他的责任，各人有各人的定位。”——妻子梁丽明口述

“从事华教工作，当然我们大家全家人都很认同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我看我们本身也是这个华文教育的背景，所以在这个工作方面当然是非常非常认同。我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从

小就是这样，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是他的一个事业，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当然都要支持他在做的事业，这个是应该的啦！

他的时间多不在这边，在整个生活上的需要，比如说我母亲的确她是花了很多的精神要看家里，要看生意，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也不是说激励啦！就是很多时候父亲告诉我们说：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教育念完（书），你们就是自己啊！自己要靠自己了，所以这个一路走来我们都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是说都知道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儿子郭家伦口述

如果说人生就像品一杯茶、读一本百科全书，茶的苦和甜、清和涩，书中诠释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快乐，身边一知己相伴，无话不谈，无话不说，这样的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 领导人的责任与担当

郭主席总结他参与教育事业到社团事业，坦荡数语：

“我看啊，搞社团工作，好像乡会这些，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关心会员。同乡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帮忙，要解决他的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董总或者州董联合会的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政府的政策不利华教的时候。另外就是我们的华教不论是小学、中学都有经济困难的，每一间小学，每一间独中都有经济困难，随时我们都要向华社大众筹款……不好的就是他把你们这些都当作是极端分子，你要背这个东西的喔，所以要面对这些，精神上的苦恼是有的。那么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参加做乡团的也好，做商会也好，也是商会会员福利的问题，或者是搞教育也是为传承我们中华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花的时间多，付出多，人生才更有意义。如果认识这一点，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 二、披荆斩棘，走向华教之巅

郭全强先生最为令人乐道的贡献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新纪元学院，完成兴建饮水思源楼和教学楼。当两座大楼终于耸立在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山岗，不但圆了全国华社长久以来的梦想，更展现华社热爱母语教育的心是多么强大！当郭主席于2002年在721华教盛会上带头喊出：奋斗、奋斗、再奋斗，建设、建设、再建设……的口号时，其震撼力感染了全场的人。在他带领下的董总，就如那一声声口号般，不断争取、奋斗、建设，勇往直前，没有退缩。

郭全强参与社团和华教事业的部分历程包括：

### 社团：

- 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  
(1983-1991)
- 居銮海南会馆会长  
(1983-1996)
- 马来西亚工商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年份不详）
- 马来西亚商联控股有限公司  
(UNICO) 董事 (1985-2000)
-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  
长 (1989-1994)

## 华教事业：

- 居銓中华三小家教协会主席（1973-1976）
- 居銓中华中学董事（1974-1977）
- 居銓中华中学总务（1977-1987）
- 居銓中华中学董事长（1987-2005）
-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1988-2005）
- 董总副主席（1989-1991）
- 董总署理主席（1991-1993）
- 董总主席（1993-2005）

## 初识华教

郭主席回国的最初几年，他的言行都非常谨慎。当时的马来亚联邦刚独立不久，对从中国回来的人士都监视得比较紧。郭主席为了避嫌，将家里最大的三名孩子送往英校就读，还请了家教为这三名孩子补习华文。一直到第四个孩子要读小学了，当时的局势也趋向平稳，便让孩子报读华小，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在居銓中华三小完成小学教育。

“我的孩子进了华文小学，那么我自己又做生意的，是吗？经济上还可以。学校的

老师有家庭访问或者是要发成绩单，家长要见老师，我都要去学校的，那么我们也关心学校的情形，跟老师交流，那么多交流了几次，学校就邀请我去参加家教协会，所以我就去家教协会，1973年就开始担任这个居銓中华第三小学家教协会的主席了，这个是开始担任要职，第一次当家协主席，73年。”

他顺理成章进入家教协会，很是活跃，发动筹款建乒乓室，协助学校完善各种硬体设施。他积极及无私的付出得到大家的肯定，于1974年被引荐担任居銓中华中学董事。对他来说，无论身处何种领域，他都会负责任地担起重担，做到最好。

“74年成为董事，那么经过三年，77年他们就认为我要负责更重要的职务，是总务咯！不是董事，是董事里面的总务，那么这个做了总务呢就做了很多年，以后就升做副董事长。那么1987年就正式成为居銓中华中学的董事长。”

“因每年都不敷，那我做了董事长跟总务，我看有几个重要的角色，釜中开始是一个建设时期，1985年我们就建成了一座五百尺长，四层楼高的科学大楼，我做总务，筹几年款，那么这个就完成。后来1991年又成立学生宿舍大楼，四层楼的宿舍，可以容纳几百个学生住的，那么1991年这个完成，那么1998年还是董事长，又一个四层的教学大楼成立在釜中，那么1998年又把行政大楼建起来，四层的，那么这里面前前后后光是硬体建设就差不多两千多万，就那么多年来陆续发动，软体建设上呢，1996年的时候推动学校行政电脑化，规划釜中未来的发展蓝图，我们有商量将来会怎样发展，另外就是这个教职员的评估制，那在1996年我们才开始，那么另外呢就是2002年我们就加强软体建设，就是展开素质教育，配合董总的整个素质教育，那么加强这个行政管理的效率，今年到去年要开始推动这个ISO品质管理，我们大概希望在2005年6、7

月中可以拿到ISO，一种国际水准的行政管理证书，那就把这个学校的行政管理拿上国际的……能够跟国际上一般的学校管理、企业管理接轨，有一套很严密的制度。”

1970年代后期，正是独中复兴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居釜中华中学，经历了二战后学校复办、60年代拒绝改制后重新奠基扎根，正是处于发展扩充关键时期。自1974年郭主席进入釜中董事会，并于三年后担任总务，到后来成为董事长，这十多年间首要的重任就是筹款，学校办活动需要经费，学校的硬体建设更是需要筹大笔的经费，筹款似乎成了学校董事会的重担。他深刻体会到，釜中需要获得社区的支持，才能发展得更稳健，走得更长远。根扎得深了，扎得稳了，就经得起任何的风吹雨打。釜中，是属于居釜人的独中。

“我做了董事长以后跟校长的配合，我们成立了釜中董事会领导的各地区的县委员会，帮助釜中在那个地方，一个村里面或者一个乡镇里面，每个地方都有县委员

会，有十几个县的委员会，每个县都会有十到二十几个的委员，他们就负责代表那个地方，代表銓中董事部来负责銓中讯息的传达，为銓中筹款，那么我们这种赞助人发动了每个月捐钱，一定捐钱给銓中的赞助人，那时候我们达到三千多人，经常地捐钱的，那么就在县的委员会去召赞助人，就好像一颗大树，很多树根一样，所以我们有强烈的各地区、县的，他不但帮我们找钱，鼓励学生到銓中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们銓中的生存靠华社，靠群众，县委员会就是靠群众的，各地方的一个组织来联系，我们的根，群众。这个是銓中很大的成就，一直到现在都发挥很大的作用。”

郭主席担任銓中董事长的次年，就获选为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从此，他有了更宽广的空间可以一展抱负。他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既已担上责任，他总是竭尽所能，临近60的年纪，为了巩固各区域的联系而奔走，出席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校活动，参加在

不同地方举办的会议。当时的柔佛州共有8所华文独中，他就轮流在这8所华文独中召开会议，就算会议地点再偏僻也好，他从不缺席。如此劳师动众，不辞劳苦的奔走，他自有一翻考量：

“有些地方不够积极，但是去到他那个地方开会，他就一定要出席了，是吗？你在别的地方开，他不一定来，但去到他那个地方，……他就一定要出席主持，……”

他以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的名义，举办州级的比赛、运动会、表演等等，由柔州华文独中轮流承办，除了借此加强各校与州董联会的紧密配合关系，也间接加强各校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同时带起华文独中的一股繁荣新气象！

“所以我看那个时候做州董联合会的时候，我最大的成绩一个是经常开会，加强这些联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州董联合会是没有办事处的，也没有专职人员，那我做以后呢，那时候就筹款，两次筹款，买我们的会所，一次是筹了五十多万，再一

次是六十多万啦，就买了会所，有点存款，他们就推举在居銮也请专职秘书，以前没有，是哪一位董事长做州董联合会主席，那个中学的秘书就当董联合会的秘书，所以你文件也没有办法保管，没有这个长久的打算，那以后有了个会所以后，你就记录什么东西都会存下来，也出过特刊了，就有一个历史的记载，有一个中心，我看这是一个会所，加上一个秘书处成立就是我做州董联合会里面两样建设，另外就是跟各地方的独中，我们轮流去开会的，那么就跟大家的关系比较熟。”

## 深耕华教

郭全强担任董总主席时已达63岁，已是一位身经百战和有威望的华教领导了。他基本上稳住了柔佛州华教局势发展，为銮中的未来规划了发展蓝图，为柔佛州董教联合会的发展打下稳固的根基，更为日后董教联合会的接班人铺好道路。

“他能够到董总来主要（是）他把居銮的社会团结

起来了，所以当他1987年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就发动了全国运动、扎根运动，銮中从两百多个赞助人一下子飚升到一千三百个赞助人。所以整个根非常的稳，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就把学校的组织建立起来，所以把学校的这些行政制度全部白纸黑字定下来，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也叫了行政组织天天晚上要开小组会议编立这些各单位的组织规章，所以整个行政组织可以说是也建立了起来。第三，他也非常重视老师的福利，把老师的福利、评估、制度等等都不断的提升。”——居銮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口述（2019年12月8日，追念华教巨人郭全强主席追思会——战友及同道的追思感言）

“他去什么组织，他最关心就是那个组织的财务情况。他在居銮做董事长，整天发动筹钱改善学校的软硬體啊、建设啊，他都是这样做。当他接手董联合会的时候，柔州没有钱。但是他有办法，他以培训老师的办

法筹到很多钱。当我去接手柔州董联会主席，我一看啊已经有一百多万在里面，结果我做这个主席很轻松啊！我相信林国才他是那时的财政，可以证明我这个话是真的。他就使到我们的组织财务状况好起来，就好像最后你看董总做了大楼啊，做了建设啊，但是财政还是很充裕来让接手的人不要有烦恼。”——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前任主席黄循积口述（2019年12月8日，追念华教巨人郭全强主席追思会——战友及同道的追思感言）

身兼多职并没有让郭主席顾此失彼，反之，在他领导董总期间可说是建树良多。他秉持一贯的务实和中庸的态度，捍卫小学母语教育，积极协助及参与发展独中和新纪元学院的建设工作。1990年代，国内政治气候处于“小开放”状态，表面上华教的前景是乐观的，可是实际上华小的发展却是暗潮汹涌，如1995年“宏愿学校计划”、2001年白小事件和2002年“数理英化政策”，足以把华教的最后防线打开一道缺口。在华教面临危机的

紧要关头，郭主席领导董总与教总等团体并肩作战，力保华小继续生存。他认为随着局势的演变，争取华教权益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结合全国各主要华团，以建立对华教的共识。

“但是能够在这十几年来，华小基本上没有关掉，还是顶住啦，没有把教育法令取消掉，我们做不到，但最少华小都顶住，还维持着，不过现在也是在斗啊，还是维持住，这个就很大成就。我看，没有把教育法令改掉，我们做不到，但是呢，独中还维持住，华小还顶住，对吗？又办了一个大专嘛，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后来也起来了韩江学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成绩了。有些人看不到，我们董总里面也有些人看不到，说教育法令你都改不来，华小你都没有办法增加，我们都是不成功嘛，他不知道你不死亡就是成功，你顶住了嘛，如果没有董教总，我看早就完了。我们不顶住，早就完了，已经变质了，你说这个是成绩

吗？当然，大家要……能够维持住，我们就还是算成就（功）啦！”

作为华教最高领导人，郭主席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处事进退有度。自接任董总主席重担以来，他已作好长期为华教奋斗的思想了。捍卫与发展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所以郭全强在获选为董总主席时即提出三个主要目标与工作方向：一、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反对不利华教的政策；二、提升独中教育素质，推动独中教育改革；三、申办高等教育学府。

“最深刻的就是跟政府的关系，矛盾的关系，既要得到他们的批准，又要很客气对他，但是政策不对的又要严格批评，又要求他，这个就是要很多耐力啦！你看，我们本身内部都有一些意见。董总这个大楼，这个行政楼最初有放“董教总行政大楼”，挂在上面，建好了要挂上去，市议会不批准，不给出证书。我们是最后决定拆下来。有些华教工作者说，你为什么要拆下来，自己的招牌都拆下来，

应该斗，跟他斗到底，他不批准你搬进来，你就不要搬进来。你看两种，那时我们想，你跟他斗是没有意思的。拆下来，要求他批准，好了，我现在没有挂了。批准了以后，我现在又挂上去了。退一步，你才进一步。你不退，僵局可能还闹到现在，你还不能够搬进来。有些人就说，你妥协了，是不是要站稳立场，为什么把招牌都拆下来？你会怎样决策咧？拆还是不拆？但是我们要实行的时候就要考虑，你是要成功搬进去嘛，不是要那个招牌，暂时退下来，建好了进来了什么，好，现在挂上去，你又怎样？所以我们还是拆了。所以有时候，一些策略上的问题，我们的看法一致，有时队伍里面有不同的意见。”

## 教育改革、开创华教新纪元

1980年南洋大学遭关闭、1982年独立大学申办失败后，华社仍没放弃实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母语教育体系的决心。1989年，华侨学校产业受托会（由加影八大

注册团体组成)将加影一块8.5英亩地段“华侨岗”捐献给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目的是作为日后发展华教的基地。

1991年董教总发动筹款,以“建设董教总教育中心,开创华文教育新纪元”为号召,至1999年共筹获2600万元。这期间,许多筹款活动接踵举办,义款纷沓而至,包括了“华教火炬行”、“百万松柏献华教”、“1219华教盛会”、“千万心愿”万人宴、“饮水思源”运动及征求赞助人。1993年12月19日,坐落于加影华侨岗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第一期工程“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落成。行政楼的落成只是一个起点,2001年9月,7层楼高的教学大楼及13层的饮水思源宿舍楼竣工,并于2002年举行“721华教盛会”大楼落成开幕典礼。

“建设新纪元要筹两三千万,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硬体建设,把这一栋一栋地建起来,然后老师请到来,到现在维持到一千多个学生,基本上还能够平衡,这个就是很大的成绩了。筹款不容易,筹了三

千多万,是吗?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是比较紧张,因为不是有三千万在手才建喔,那时候才有……董总这边才有几百万,那人家捐了也大概七、八百万,我们就动工了。动工了,你看,如果一做完,两年,你就要给他两千多万,你哪里有这么多的钱来做?一路发动,那个时候就紧张。到最后的时候,还差两三百多万工程就完成了,那时候就到处去想办法,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没有钱出粮了啦,大家帮忙啦!所以在霹雳州又筹了一两百万,两百多万,檳城发动也筹了两百多万,补了这个,所以才有钱交货完成,这个是比较紧张,不过靠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对群众要有一些了解和信心,如果你没有把握人家会捐钱的话,你实在不敢的,不过我们就觉得我们的道理很大,能够说服人家,人家会支持,是有这个信心咯!对群众有信心。”

“维护华小,做出杰出贡献的林连玉老师。支持独



四机构代表主持纪念铜牌揭幕仪式，左起为加影产业受托会主席吕兴、独大有限公司主席胡万铎、董总主席郭全强和教总主席沈慕羽。

中，林老总；发展民族高等教育，中间经过了独大的败诉，到新纪元学院的成立，这个关键领导人出现了，那就是郭全强主席。如果在那个年代没有郭全强主席出现，新纪元学院不可能这么顺利。当然，当年的形势对民办教育有利，不过要筹款，第一栋楼五百多万，第二第三栋楼，三栋楼加起来是三千六百多万，领导这个筹款运动的人，就是郭主席。所以呢，我跟郭主席很

多经历是筹款的经验。他刚开始不太会讲话，要看稿，到后来呢，是不断学习，接近群众，他的语言是非常有魅力，而且是得到响应的。所以刚才你看的短片，他讲那个狗的尾巴切掉还是狗，这样的—个很形象的群众语言，深得人心。所以他的筹款呢，热烈响应、亲自亲为，所以新纪元的建设，用10年建设三栋大楼，最大的功臣就是郭主席的领导。郭主席用了10年时间带领大

家募款，募款的时候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我们去到怡保不是住Hotel的，是住在那个兴安会馆，所以你看那个精神面貌哦，群众是看得到的。”——董总前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口述（2019年12月8日，追念华教巨人郭全强主席追思会——战友及同道的追思感言）

1994年，本着创办独立大学的精神，董总、教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正式申办新纪元学院，以贯彻“开拓学前教育、维护华小、发展独中、创办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的总方针。经过重重波折，新纪元学院终于在1997年获准开办。

“独大不批准，就不能再申请办大学，政府不会批，就办学院咯！学院是大专大学的头一两年的课程，是准备将来慢慢提升大学，这个目标是这样。”

2016年12月30日，新纪元学院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终于，郭全强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铁树开花”，他的心愿、全国华社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五十年，一百年后，未来将频频回首，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将倾听我们以母亲的语言，纵情的歌唱，歌唱民族教育的理想，歌唱中华文化的辉煌，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门槛，来自新纪元台阶上的，我们不灭的歌声……”——吴岸，1999年撰

作为董总主席，郭全强谨记董总创办的宗旨与初衷，他立下了三个目标，并且很努力也很坚定地朝向目标前进。除了各地奔走筹募董教总教育中心建设基金，组织力量应对各种不合理的教育政策，郭主席也兼顾提升独中教育素质，推动独中教育改革的目标。他领导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组织代表团多次到大陆两地考察，举办研讨会探讨独中教育发展的的问题。在参考了中国湖南、盘锦、台湾等地的教育改革经验，吸收了教育理念以及汇整研讨会的各项意见之后，1990年代后期独中工委提出“素质教育”作为独中教育改革的方向。

“有一天，郭主席就问我：‘吴建成，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叫素质教育吗？’我



1997年董教总教育考察团赴中国湖南访问与学习“素质教育”的经验。

就把我能够理解的告诉他，我跟他解释，什么叫做主动学习、想像批判，创新……这些，我发现到他很用心，他那个时候有七十多岁了（编按：90年代郭主席六十多岁），当这个运动来到一个关键时刻，作为领导，他有这个意志力想要去学，真的很难得！跟郭主席谈了之后，他说那我们就应该去中国、台湾看看咯！看教育改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97年董教总就组织了一个教育考察团，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就去了湖南，然后再去台

湾。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敢于去行动的一个主席。所以郭主席他有这种意愿要推教改，那么97年去了回来，我们成立一个小组，就开始去整理出一份教改纲领。”——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前任教育主任吴建成校长口述（2019年12月8日，追念华教巨人郭全强主席追思会——战友及同道的追思感言）

2003年7月，独中工委会举办了以教育改革为主题的第四届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会上正式发布

《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草案）》，尔后于2005年1月9日推出《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这份继1973年《独中建议书》之后，另一份对独中教育有指导意义的历史性文件。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人的知识才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的。郭主席不仅亲身参与办校的前线工作，在后期甚至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领航者，在经过多年的实践，在不断地与当局交涉博弈中，他深深体会到华教的困境是“困”在哪个点，处在何种“境”况？对独中教育未来的发展因而有更深层的理解和领悟。

“我们品尝数十年奋斗所结的果实时，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状。所谓‘流水不腐’，我们的华文独中也必须不断运动，不断求变，不断求新，才能追得上当今世界教育趋向‘多元主义与民主开放’的步伐。因此，今后华文独中，有必要从‘应试教育’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推行‘素质教育’，注

重‘人文与人本思想’，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格健全并有所专精的人才’。这是教育理念的大革新。”

“独中教育要突出它具有独立性、灵活性及优越性的母语教育‘品牌’，同时以现代化的‘包装’，突出它的形象，那就是要求学生都能承传中华文化，即成人又成才。”

“独中教改要关注学生发展，不论在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校园文化、学校结构等方面，都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民族情操、人文关怀、自学能力、创造才华、适应能力等优良素质。”

### 三、千帆过尽，追求生命之光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类也有极限，但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却是无限、无极限的。郭主席相信，只要贯彻始终，初心不变，华教终有一日会得到平等对待的一天。

“从独立到现在，独立前到现在几十年了，那么这种一路走来地强调马来人至上，马来种族主义，就是以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那时候一直贯彻下来到这代，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你现在不容易让他改变。我相信可能要一代、两代人，二十年一个年代来讲啦，可能要两代人，老一批的去了，再一批，再过一些时候才可能会整个把过去这些消除，接受新的多元开放的思想，所以这个会长期，还有几十年，不要想马上就改变……世界在变，所以我相信世界潮流之下开放。我们的政府现在不能一下过去这么久来的单元化思想，不能一下改变，都要有一代两代，这样时间慢慢地受到整个潮流的影响，他会慢慢地改变，我是信心在这里啦！但是不能是一下改变，要求不要过高，所以我们要坚持住，要顶住。”

“我们华教工作者好像接力赛一样，你接力不要等到你真的跑不动了，你跑了一百

米，你还是可以再跑，就让别人又再跑一百米，这样接上去就够力了，是吗？不要跑不动了，好了，你来接啦，那个不叫接力赛了。”

2005年7月17日，郭主席将领导棒子交给新的班子，而他荣升为董总会务顾问。8月7日，董总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为退休的郭主席举办一场欢送会，他在欢送会上接受主持人询问退休后的人生规划时表示，他虽退休了，但还有“剩余价值”，他要善用他的“剩余价值”为社会工作尽一份力。“我本身的观念是相信为别人做事、为社会贡献，生活才有意义”。根据廖伟强校长的说法，郭主席早在2003年时就萌生退休的想法了，当中的纷纷扰扰，廖校长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2003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我担任校长之后的几年，他也开始说他应该也要逐步的退下来了。可是我们觉得他正在巅峰的时候，而且在他带领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还需要他，所以我们一直挽留他。因为我们觉得他对我们华教，不只是对銮

中而已，对董总呢，还有很大的贡献的余地的。所以我时常有跟他讲，我借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说，剩余价值，我跟他谈剩余价值，我说主席，你虽然退下了，你还有剩余价值的，就是用尽为止。所以虽然你退下来在家里面，有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去请教你的，所以他是先退下柔佛州董教联合会，然后再退下董总。那2006年6月才退下我们居銮中华中学董事长位子。不过呢，我们每年重要的活动，甚至我们有时时间允许，他和家人能够接受，我们都会到他的府上去拜会，因为毕竟他都很关心，他非常关心学校，也非常关心董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他的府上再聊起的时候，他也希望说，整个华教啊，都能够永续的经营，能够顺畅的走下去。所以他寄望我们这些后辈啊，大家不要放弃。所以他的退下，我们虽然万般的不舍，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开始退化了，他真的开始退化了，身体不好了。所以有时我们讲

不好听，有时还是要留点后面的一些晚年的生活，回归给他的家人，这个我们觉得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啊！”

口述历史团队在与郭主席的其中一次专访曾问他“退休后计划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想多看点书，书籍的资料，沙巴州（有人）准备请我去讲一个讲座，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到底有什么看法，这个我就很有兴趣，我也有一些资料，啊，就准备去讲讲，能够在这方面多看点书，比别人多看一点，收集资料来传达这个看法给他们。就做一些对这个……目前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传达一种看法。好像我们董总，我倒希望有一天我跟大家职员再讲一下”。

“我告诉你啦，我没有享清福的这种概念的，没有啦！我就到70岁……我相信我到80岁，我还是要有一种要干一些事情的欲望的，我告诉你，我不会停止的。当然，不一定是搞董总主席的，总是一定要搞一些东西，要研究一些东西，你看我现在已

经开始想明年，我跟我太太讲中国的火车路从青海通到西藏，我们就坐火车去，去看一下这一条世界最高的火车。

参加董总搞社会工作几十年，（关键是）价值观问题。我总是觉得要生活得有意义，应该为别人、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能够把我的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搞社会工作。我太太也了解我的，我说退休，她不相信我会完全退休。所谓‘剩余价值’这个倒是真的，我现在不做董总主席，但是有‘剩余价值’。”

郭全强，人如其名，强节逆风赛竹松。古人赋予竹松“不畏严霜、意志刚强、坚贞不屈”的品格，而一代华教巨人郭全强先生，他所体现的正是竹松的高尚品格。董总同仁在赠予郭全强先生的牌匾刻上“全心建教奔星月，强节逆风赛竹松”，代表的是全董总同仁对郭主席的最崇高敬意与肯定！

## 后记： 华教战友眼里的郭全强先生

2021年4月2日，资料与档案局口述历史团队在线上分别与以下三位华教前辈进行访谈，让这三位在不同岗位、不同时期，却在相同的华教事业上并肩作战的战友，从侧面的角度谈他们眼中的郭主席，以及曾经患难与共的点滴。

### 董总前财政林国才： 伯乐与千里马

“郭主席，他不管在哪里，第一要先把家建起来，就把这个小家建起来。你看在釜中也好，他已经把所有硬体建起来，董联会他也是要把这个硬体建起来，包括董总，他都把全部这个硬体要先建起来，才能够推动所有这些行政工作。我看他去每个地方，第一的工作就是募款建设。这个是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的。”

郭生是众人的伯乐，他对这些晚辈啊，就是很会提升这些人才上来。所以在他的领导的时候，很多人就能够因为他的慧眼，在华教方面都是很好的表现。我对他的确

是很尊重，因为其实坦白讲，我本身学历不高，那么他对我那种欣赏，跟那种肯定，所以我讲他是我的伯乐，他也是众人的伯乐。

另外就是郭主席，他就是很亲和力，尤其在，你不管是谁在华教方面，你各区的那种协理区也好，你只要在这方面有一些贡献，你即使帮他搬一张桌椅也好，他都会过来跟你拍拍肩膀，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你看郭主席，他尤其你在外面和他一起共餐的时候，有时候谁跟他买单，他也不知道，吃完后有人跟他买单了，谁，不知道？哈！不知道谁帮他买单，你看从这种点点滴滴，你看到这个主席这个人，受到大家的这种尊重。

郭主席参与整个工作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每次开会他一定有带一个很多新的信息给你，他不会来开会问你要喝茶喝咖啡，绝对不会的。他重要的是说，现在我们整个时代走到什么方向，那么新的什么信息啊！资讯啊！科技呀！他会一一跟你分享，因为他这个他整个就是一种很懂国际关注的领导，所以他会来，就是说每次都会最新的东西，他让你了解，现在整个时代是发生什么事情

啊。这个是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 董总前副主席许海明： 至亲至善至知己， 亦师亦友亦比邻

“郭全强啊，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他为人善良，很善良的人，而且他和蔼可亲。见到他常常笑口常开的。他就是让你微笑。但是我觉得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底蕴。他有这种气质，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华教领袖。

我跟郭全强先生呢，一直以来我是当他长辈领袖或者是领导来看待。我跟他的互动是非常频密的。他时常跟我谈话跟我交流，有时候也给我一些意见，给我一些指导，所以我们之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老实讲他对我非常好，他去北京的时候，他还特地买了一本书送给我。我很珍惜这本书，这个是相当好的一本书。

他每一次去董总开会的时候啊，他都会做一些开会前的功课。所以他对这些要讨论的议题啊，有深入的自己的思考。然后对一些议题的看法，他是胸有成竹的，所以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开放给大家发表意见。他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他是综合他自己的那种看法之后，然后他会想出方案来。往往这些方案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领导人。我也很赏识他主持会议的那种方式和态度。

1980年代，我们的华人社会对教育、华教的意见是有一些分歧的。因为本身有参加政治，所以我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郭全强先生是93年接任（董总）主席，他接任主席过后呢，他就大力的去凝聚华裔社会对董总的信心，还有华教凝聚的力量。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对于董总，对于整个华教，贡献是非常的大。这个时候别人看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有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到90年代结束过后，他很努力的，每次檳城有什么活动，他几乎都尽量的出席。任何的地方请到他，他都是尽量的去出席这些活动，他在继续他的那种演讲的那种方式，每个人都称赞。”

### 居銮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听其言也厉

“因为92年我们成功举办这个万人宴，可以说马来西亚华校里面最盛大的一次宴会，我可以说不甚至也是马来西亚华社能够达到万人的一个盛宴啊！銮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所以第二年呢，就（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加入了学校。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公告示人，我们是一所得到群众支持的学校，所以93年我刚好又升为训导主任之后，那郭主席领导之下就成立了行政改革委员会，就是把学校跟它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办学，所以当时我是负责训导处的这些章程拟订小组。当时我们晚上可以说分很多小组一直开会，我只负责训导处这一组。因为之前，学校就是大家……就是一股热诚去办，这些教育（是）没有非常行政规划完整的一套规则在里面。所以就是从93年开始，郭主席带头要求，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够走上每一个行政规划的方向去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郭主席接触比较多了，所以也慢慢了解到他这个人办事是非常有力道的，要做什么就要去做，不要等待，就是往前走就对

了。这个是初步的认识他，初步的认识的他。

我们也很敬畏他，刚开始是有点怕他，可是那种怕又不是那种怎么小老鼠怕大老虎这样的，它就是一种敬畏之心。那有时候我们聊起来呢，大家又很开心，好像朋友这样。就好像把他当成我们华教路上的一个父亲，他带领我们走进华教，亦步亦趋的把华教走向成之路。

我觉得郭主席啊，每次跟他出去的时候，我们压力很大咯！因为他讲8点，他7点30分在那边等你。每一次我们要到集合地点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了，我们觉得他好像不用睡觉这样子的，可是他出来，他就精神奕奕。有时候我们出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团员在那边打盹了，可是他越讲越爽。他讲话不用打稿的。不管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可以聊。他不只是教育而已，他社会、政治、经济，他什么他都可以畅谈。当然面面俱到，这个是我觉得很佩服他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他使到我们不得不努力，使到我们真的不可以太慢，不可以偷懒，一定要努力。

我相信在董总的同仁里面，也跟我一样的，大家绝对不敢怠慢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那种气势冲过来的时候，就是要不达目标不低头那种人，那种气势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机器要赶快产生，因为能量来了，整个机器就要运作，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啦！虽然好像很忙、很辛苦，不过我相信真的是一个华教运动最强盛的一个动力的时期，大家都感到很自豪，为什么？因为郭主席他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他在发表言论的时候都滔滔不绝，言之有理，非常的吸引人，那我们在身边的人，可能包括一些写稿的人，你可能大家都觉得你写给他稿，他可以把你淋漓尽致的发挥的非常的生动，而且超越了写稿人可能要表达的一些精神。因为有时候写的文稿不是你写就可以讲啊！有些人讲不出那种韵味来的，可是郭主席他就有这种高超的语言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董总里面的同事啊！在他的引领之下，大家都精神奕奕的，做得非常的开心。”

# 《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与构想》 读后

庄华兴\*

书名：《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  
与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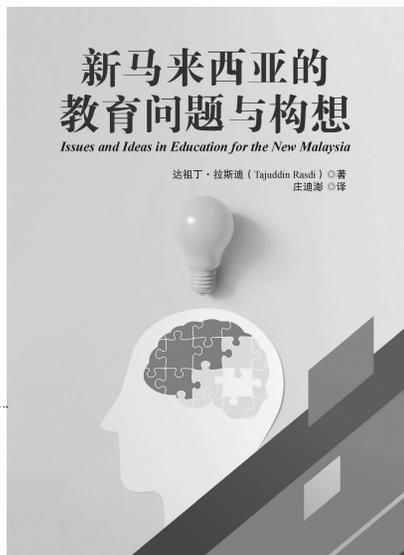
作者：达祖丁·拉斯迪  
(Tajuddin Rasdi)；  
庄迪澎译

出版：董总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第一版）

页数：230

售价：RM30



## 一、内部思想革命的必要

针对当下教育课题进行讨论的马来学者并不乏其人，达祖丁·拉斯迪（Tajuddin Rasdi）即为其中一人。达祖丁本身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在公立与私立大学教建筑学有年，研究领域是伊斯兰建筑学、清真寺建筑学、马来西亚建筑学、房屋与社群。他的文章与人文科系出身者提供的视角与观点颇为不同，体现为务实与开放的精神。这种差异或多或少与他的教育背景（太平华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副教授。

联国民型中学毕业)以及学科训练奠定的思考方式有关,以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使用西方基本知识构造和方法,批判性地研究许多知识分支,从建筑学到宗教、灵性、可持续性及其他许多事务的知识(第29页)。他别出心裁(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的思考显然得力于此。

达祖丁的出现,与一直以来批判体制的左翼马来知识界不同。左翼如卡欣·阿末(Kassim Ahmad)、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赛胡欣·阿里(Syed Husin Ali)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达祖丁则没有背负历史包袱。他选择从「新马来西亚」角度看问题,对国家施政偏差提出了反省以及对多元化的反思,譬如〈谁在扼杀马来文〉一文揭发国立大学为了追求世界排名不惜牺牲马来文,〈土著大会与新马来人〉一文对新马来人缺乏积极与正面的新价值观的批判,以及〈差异令世界顺畅运转〉、〈接纳多元文化主义的四个教育价值观〉、〈非马来文官方声明……有何不可?〉、〈独中统考文凭与国家建设〉对多元主义的拥抱。他憧憬“一个多元的马来西亚”(One-many Malaysia)而不仅仅是“一个马来西亚”(One Malaysia)。这种观点出自一个马来学者诚属罕见。

多元文化主义在马来西亚之所以成为问题,作者归咎于教育体系(只专注生产劳动力)、教育官僚(谋私)和宗教机构(重仪式而忽略普世价值与精神)。宗教作为问题的根源,达祖丁在〈宗教学者是国家建设的祸根吗?〉一文有进一步的阐述。他以实例举出宗教司的种族歧视和偏执情绪、宗教官员好发表肤浅与低劣言论以及宗教权威的至高无上、不可质疑。他甚至把民粹主义宗教学者视为国家建设的祸根。从中他也看到马来社会思考能力简单,易于被操纵的事实。

达祖丁所言固然无可厚非,然而其远因恐怕是长期以来执政者推行的“思想改造工程”所致。自独立以降,马来人被当政者蓄意盆栽

化的思想以及对新事物的抗拒与恐惧，导致各种对他族抹黑（或刻意渲染他族强大）的宣传话语轻易取得阻吓作用。

网络上对达祖丁的辱骂并不少，他被指责为迷失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isme）和多元主义者（pluralisme）。在民族主义者的操弄下，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变成了靶子。这已成为种族-宗教主义者的常用的武器了。笔者以为，欲解决马来西亚的问题，恐怕只能寄望学界拿出绝大的道德勇气破解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伊斯兰宗教势不两立的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促成了赛·胡欣·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所言的“被俘虏的脑袋”（the captive mind），尤其指对某一现象如何被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被诠释（interpretation）以及如何进行概括（generalization）之手法。

马来左翼学者、社会主义党前领袖卡欣·阿末于1986年出版《重估圣训》（Hadis: Satu Penilaian Semula），对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规训提出批判，顿时在宗教界、学术界与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引起震荡与争议，卡欣的言论被视为反圣训，书籍出版后立即被查禁。这件事是马来知识分子冲撞体制的重要案例，虽然内政部介入干预，但它却为马来族群内部开启了思辨的道路，至今不时仍在争论。笔者以为，马来西亚的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必须来自马来学界内部发动的思想革命，而且它需要以普及的方式跟进，推广到全国城乡各角落。

## 二、“新马来西亚”的思考

《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与构想》各文原为英文报章专栏文字，写于希盟政府执政期间，针砭与批评之间，亦寄托了作

者对“新马来西亚”（New Malaysia）的愿望。“新马来西亚”这个词曾时髦一时，它不仅作为希盟政府的执政口号与目标，也是另一部分马来西亚人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曾让多少人对前景充满乐观、信心满满。然而，新政府执政二十二个月后垮台，马来西亚历史进程再开倒车，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此后，大马政情与疫情相互交缠，波涛迭起，魑魅魍魉四处流窜。当下读这本书，再度唤起“新马来西亚”那些事那些人。因此，阅读本书便有了悼亡的意味。

本书分五辑，分别是教育概论、改造学校教育、反思大学、调整伊斯兰在马来西亚教育的位置、打造新的校园建筑。后文谨就笔者比较熟悉的前三辑略提一点意见。

在“新马来西亚”的意义框架中，达祖丁最关注的议题无非是多元性的坚持，而教育是维持多元性的直接途径。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性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并提出他的终极关怀：种族团结之重要性。至于如何达致上述目标，作者的方法是从非核心的角度思考问题，如领养计划（见〈打破常规的国民团结蓝图〉）。但这种社会工程绝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外在条件的配合。马来西亚长期以来推行的单元性、排他性政策，能说改就改吗？供求规律说得很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供应。大马数十年的单元性和排他性政策养成一批数量庞大且思想被俘虏的群体（具体为固打制、保留地意识、特权等），他们长期依恃拐杖或声称拥有超验的所有权，而政党成为长期的监护人，为其护航。学界把这称作政治上的保护政策（system of political patronage）。新政府的诞生让达祖丁看到了曙光，他尝试从“新马来西亚”的角度思考问题，包括如何超越常规的国民团结蓝图，如何面对差异，谈现代教育与同理心，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价值观，以及对马来人与宗教学者提出批判。这些都出现在第一辑，体现了作者的教育观。我们不确定达祖丁代表了多少马来知识

分子的思想，但不难感受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诚恳与良心。马来西亚人长期生活在弄虚作假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这份真诚弥足珍贵，尤其是以他站立的位置。

达祖丁讨论马来西亚教育课题最值得关注。在教育范畴底下谈到的课题亦颇广泛，包括历史教科书（〈我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救世主〉）、独中统考文凭不被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与国家建设〉）等。统考文凭不被承认已是老问题，它如华社身上的疮疤，痂已结患处仍隐隐作痛。倘若马来西亚建国目标仍秉持单元思维，以国族建构为名，少数族群的母语教育权利将持续被排除在主流教育建制之外，这是可以预见的。

统考文凭不被承认，最新的说辞是历史科课程缺乏本土内容以及马来文课程水平低于国家课程。就前者而言，达祖丁留意到独中“历史课程涵盖了更为全球化的历史视角，而且它的一些本土内容同时展现了全球化和本地化的思路”（第107页），惟双双皆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书写反殖民主义和独立斗争史，不同的是仅仅换了某些人物而已，历史时空依旧。显然，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反制式的历史意识与思维。“我希望独中统考文凭和国立学校的历史课程都更着重于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冗长的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叙述。”（同前）作者的建言诚然值得吾等思考。毋庸置疑，继承自中国传统观念的帝王将相史已深入到我们的思维与血液，然而，承载人民记忆的社会史是否更符合多元化的马来西亚历史现实？何况，马来西亚还包括历史经验完全与半岛迥异的东马两州。除了史观的更替与史学范式的转移，达祖丁也提到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每个族群的崛起，不管是华人、印度人、原住民、卡塔尔山人和毛律人（Murut），并认识其传统的社会价值和仪式的人类学构成，以

及当前他们的适应和创新。”（同前）受专栏文字所限，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欠集中与深入。

至于独中的马来文课程水平低于国家课程，达祖丁质疑这种说法，同时他也敏锐地感知到官方的潜台词是企图把马来语文低落的根源，转嫁到独中马来文课程的水平问题之上。他揭发即使以捍卫马来语为己任的国立大学为了追求国际排名，不惜改用英语授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揭发大学研究生为了符合毕业要求，不得不以蹩脚的英语写论文，大学老师为了升等亦作同样选择。他毫不含糊地指出：“马来人教育工作者自己扯了马来文的后腿，以换取国际排名和‘世界一流’的教育。”（第108页）这句话出自一名马来学者，其心情之复杂可见一斑。

### 三、马来文课程属政治问题

究其实，独中马来文课程水平离不开政治问题。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从单元化进一步发展到马来-伊斯兰化，独中的存在难免被视为对现存体制的挑战。如果不检讨或调整民族国家建构的大方向，无论哪一个政党/联盟执政，少数族群的文化、语言与教育权利将在人为手段下被稀释、消解，以换取官方话语力倡的族群和谐与团结。就此而言，独中马来文课程水平只是一个伪命题，独中及其整体建制才是某些民族主义者心头上的隐患与真问题。达祖丁没有戳破，恐怕他对国阵时代留下的“遗产”缺乏全面、根本性的认识。

作为曾经在体制内服务的大学教授，达祖丁对当今高等学府为了追求世界排名而不惜牺牲马来语与走快捷方式的学术歪风颇为深恶痛绝。书中第三辑十篇文章大体上讨论四个问题，即国立大学学术沉沦与改革建议、大学教育与国家建设、学术与政治介入、检讨马来西亚

课程。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曾撰文讨论国立大学为了追求世界排名的“儒林百态”（参庄华兴，2017.12.09），此处不拟赘述，谨就〈玛拉工艺大学应只限马来人就读，但是……〉一文提出一些疑问。全书的基调反映作者反对单元化的态度，然而，作者却说道：“就玛拉工艺大学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强硬支持者的观点，即该大学应保留给马来人，但是该大学必须担当重要责任并承担义务。……如果玛拉工艺大学的经费资助对全体马来西亚人都公平，那么该大学可以保留给马来人”（第151页）。这是“恶小为之无妨”或“小偷小盗无罪”的思维。实在不了解为何作者言论有此矛盾。

#### 四、小结

总体而言，达祖丁的批判与思考能言人所不言，而且诚恳、直率，有时却流于理想化，甚至有些想法让人匪夷所思。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救世主〉一文，为了纠正历史教科书的偏差，他建议“马来西亚人举行一场关于学习历史的全民公投，让学习历史使得我们坐同一条船，而不是在个别舢板上。”（第39页）难道他相信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公投真的能发挥作用吗？达祖丁的建议无异于把多数与少数安置在同一个车厢内，让他们驶向没有共识的远方。通过“领养计划”解决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是另外一个例子。其出发点固然良善，但落实到马来西亚的真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丑恶与腐化到头来恐怕被美化，或反过来被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达祖丁执笔写专栏论事政，在比比皆是教授、专家而没有知识分子的当下，确实少见。他以英文写作，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广泛翻译，默认的读者主要是非马来语社群。与其说他使错力，

毋宁说希望他以母语与自己的族群对话，长期耕耘，或许可以取得丁点的效果。当然，马来媒体不太可能给他提供平台，但华社可以促成之。是时候华社创办一份跨族群跨文化的马来文报，广开言路，传播信息，敲开马来民智另一扇门。这是华社未曾做过的事，但绝对值得去努力。

### 参考文献

1. Fathi Aris Omar, Jimadie Shah Othman, “Kassim Ahmad: Tarik Larangan Buku ‘Anti-Hadis’”, 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201891>), 12 Jun 2012, diakses pada 18 April 2021.
2.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Captive Mind in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XXIV, No. 1, 1972, pp. 9-25.
3. 庄华兴：〈市场大纛下的学术异化现象〉，《当代评论》，（<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7/12/09/1-21/>），2017年12月9日。

### 附录：《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问题与构想》目录

- vi 序一：理想与务实兼具的教改建议 / 丹斯里莫哈末·谢里夫  
x 序二：为教育献铮言谋良策 / 陈友信

#### 辑一 教育概论

---

- 2 打破常规的国民团结蓝图  
7 差异令世界顺畅运转  
11 现代教育的爱与同理心  
15 接纳多元文化主义的四个教育价值观  
20 究竟谁在扼杀马来文？  
23 土著大会和新马来人？

- 27 宗教学者是国家建设的祸根吗？  
32 资助拉曼大学学院以治愈国家  
35 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新阵容：变革抑或大同小异？  
39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救世主  
42 非马来文官方声明……有何不可？  
47 赖特的民主与教育理念：马来西亚建筑学教育的教训  
67 附录（一）赖特演讲稿：代表生命的教育与艺术  
72 附录（二）苏利文演讲稿：教育（取自《幼稚园漫谈》）

## 辑二 改造学校教育

---

- 80 教育政策建议：解决种族和宗教问题中的主流极端主义  
89 改造教育结构与课程  
95 书包沉重的难题……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100 华联国中求学生涯的团结反思  
105 独中统考文凭与国家建设

## 辑三 反思大学

---

- 112 让大学重新聚焦于重建马来西亚  
116 新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学术改革  
121 反思未来所需的国立大学毕业生  
126 学界有志于国家建设吗？  
130 马来西亚大学的60:20:20 本科学位课程分配  
134 马来西亚的“学术自由”谬论  
140 改造《马来西亚研究》课纲  
143 国立大学“变成”私立大学的道德困境  
146 禁书和学术诚信：我们应该关闭大学吗？  
151 玛拉工艺大学应只限马来人就读，但是……

#### 辑四 调整伊斯兰在马来西亚教育的位置

---

- 156 为伊斯兰和学界按下重置按钮
- 160 谁是担任教育部长的最佳人选？
- 164 反思伊斯兰教育，以全球化的文明构想培养穆斯林
- 171 宗教课在国立学校之编列与废除
- 175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是马来西亚的问题
- 179 新的伊斯兰发展局应促进国家建设
- 183 在多元信仰的马来西亚，星期五布道是团结的教育元素
- 189 星期五布道是否支持马来西亚的团结？
- 192 扎基尔在做比较宗教研究，抑或侮辱其他信仰？
- 195 “宣教”（Dakwah）一词对我的意义

#### 辑五 打造新的校园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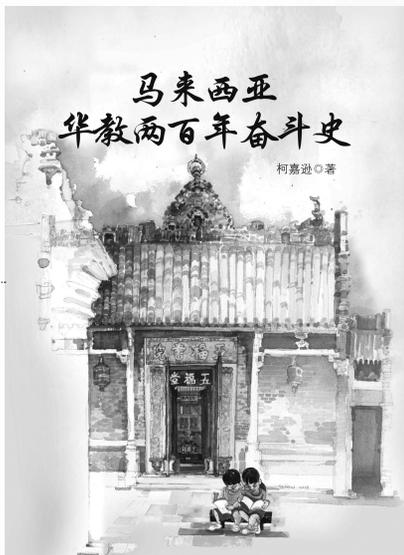
---

- 202 新的马来西亚大学建筑布局
- 206 马来西亚的大学校园设计：摩托车与平庸
- 213 泰莱大学湖滨校园：马来西亚的一流校园
- 218 马来西亚的大学应设普世中心
- 223 重建大学，建设国家
- 228 霸凌与国立学校的困境

# 理解华教运动者立场的入门书

洪敏芝\*

书名：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  
 作者：柯嘉逊  
 出版：董总  
 出版日期：2020年3月（第四版）  
 页数：187  
 售价：RM28



## 一、再出华教奋斗史著作

柯嘉逊博士所著之《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简洁清楚地按照时序整理了华教运动一路走来重要历史。此书自1985年的英文原版问世至今，已有超过30年的时光。古人称30年为一代，因为30年的岁月，足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具有独立思辨能力的大人。那么在经过了30年的时光，重新检视这本著作，吾人究竟可以得出什么新的观点？是我在这篇短文中试图去探讨的部分。

\*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科学博士、马来西亚槟城州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总经理。

本书书写的1980年代，在国内政治方面，两线制的论述才刚萌芽，政党轮替仍是遥不可及甚至无从想象；社会方面，殖民时期造成的族群隔阂仍在，五一三事件阴影下的执政者试图以强调主流的国家文化来形塑国族；这些外在的因素直接冲击了当时的华文教育系统，也形塑华教运动的抗争基调。

此原版书是在那样的氛围下完成的。据作者自述，他是在深入研究了本地华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之后深受感动，又因为当时相当缺乏以英语为主的华教论述，因而诞生了这部著作。柯博士作为华教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因此遭受牢狱之灾，他的感受必然是很深刻的。而本书的笔调，亦是从小华教运动者的视角出发，因此书中不时会出现作者对事件发展的批判。

## 二、记载华教运动历史轨迹

所以，这本《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不仅是叙述了华教运动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同时也是一部让读者能够去贴近华教运动者思想心灵的窗口。对于有兴趣理解马来西亚华语文教育发展的读者，这也是一部浅显易懂的入门书籍。因为本书按照时序书写本地华语文教育于殖民时代、独立运动、国族建构，以及政治改革等历史关键时期，同时也触及本地教育制度受族群政治影响而带来的转变。更可贵的是，本书也可作为理解多元族群社会中，少数群体在经历殖民和后殖民时代所可能面对问题的精彩案例。

将时空重新聚焦到现在，马来西亚面对华裔人口比率的减少，中产阶级的增加，华文小学也逐渐受到友族的接纳；政治方面，政党轮替已经成为事实，两线制甚至是多元政党结盟的情形正在酝酿。科技方面，信息的流通已经不再仰赖纸本印刷的流通，和1980年代已经不

可同日而语。有点可惜的是，虽然这个版本增添了一个章节补充千禧年以后的华教运动，但内容却很简短，对于其中个别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仍需另寻资料和数据，才能就相关课题有更全面的理解。

### 三、思考华教的未来面貌

此外，随着华文在世界的影响，和更多的友族接受华文教育，有的已经是第二代接受华文教育，这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促成华文教育转型为全民教育的契机。《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提供了一个历史照后镜，让读者得以回顾本地华教运动一路走来，以抗争为主轴的步调姿态。在重读这两百年的过去，使我不禁思考，华教运动的下一个两百年会是什么面貌？运动者又会如何调整步伐和策略，来回应这个时代。

### 附录：《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目录

- x 前言： 庆祝华文教育两百年
- xv 序一： 母语教育在大马宪法的地位 / 麦克·贝洛夫
- xix 序二： 重温华教简史，前瞻华教未来 / 陈友信
- xxiii 序三： 认识华教奋斗历程 / 魏维贤
  
- 1 导言
  
- 15 第一章 华文教育的诞生

---

- 17 1.1 早期的华文学校
- 20 1.2 现代华文学校

23 第二章 反对殖民地当局的管制

---

- 23 2.1 《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
- 26 2.2 《1925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
- 28 2.3 经济萧条时期（1929-1932年）
- 29 2.4 重新实施管制（1935年）
- 32 2.5 日治时期（1941-1945年）

35 第三章 公民权与华文教育

---

- 36 3.1 战后的公民权建议
- 41 3.2 《巴恩报告书》与《芬吴报告书》（1951年）
- 44 3.3 《1952年教育法令》

47 第四章 国民学校方案

---

- 48 4.1 教总领导斗争
- 51 4.2 《1954年华文教育备忘录》
- 55 4.3 《1954年教育白皮书》
- 58 4.4 南洋大学——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

60 第五章 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

---

- 61 5.1 《1956年拉萨报告书》
- 66 5.2 1956年新加坡关于华文教育的报告书
- 68 5.3 李特调查团
- 69 5.4 《1957年教育法令》

73 第六章 “独立” 中学的诞生

---

- 74 6.1 《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
- 79 6.2 《1961年教育法令》

## 83 第七章 政治与华文教育

---

- 83 7.1 1995至1964年大选
- 87 7.2 《1967年国语法案》
- 89 7.3 1969年大选
- 92 7.4 新经济政策

## 94 第八章 新经济政策下的华文教育

---

- 96 8.1 《1972年教育修正法令》
- 99 8.2 独中复兴运动
- 99 8.3 1975年，全国华团向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呈备忘录
- 105 8.4 设立独中统一考试
- 106 8.5 1979年《马哈迪教育报告书》

## 108 第九章 独立大学

---

- 113 9.1 独大案件
- 118 9.2 高庭判决
- 120 9.3 独大上诉案
- 124 9.4 联邦法院的判决

## 129 第十章 八十年代的华校

---

- 129 10.1 八十年代初期的争论
- 133 10.2 1986年大选
- 134 10.3 1987年10月大逮捕事件

## 140 第十一章 九十年代的华文教育

---

- 141 11.1 《1996年教育法令》带来的问题
- 143 11.2 改革独中：九十年代的素质教育
- 144 11.3 新纪元学院的诞生

146 第十二章 新千禧年的挑战

---

- 147 12.1 新千禧年的几项课题
- 150 12.2 华文小学严重短缺
- 152 12.3 用英语教授数理科
- 153 12.4 小四课程加入爪夷书法

155 结论

---

- 155 应有公平民主的教育制度
- 157 华文独中的教育改革
- 158 华社一贯支持华校
- 159 华教运动的两大组织
- 160 母语教育是一项人权
- 160 国际承认多元文化主义
  
- 162 注释
- 176 列表
- 179 参考书目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稿约

- 一、《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的教育类半学术性刊物，分别于每年5月和11月出刊。本刊出版目的旨在激发国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针对本地重大教育政策、现象和课题从事研究和探讨，从而促进教研风气，提升学术素质，并透过汇集上述研究成果，发挥相互砥砺研讨的作用，繁荣本地华文圈子在教育领域的研究。
- 二、在评论论文稿类外，本刊也欢迎立意新颖、内容充实的研究笔记、教学札记、调查报告、观察心得、书评等各式文稿。来稿一般以1万5千字为限，特约稿不在此限，来稿格式请参考本刊的“撰稿体例”。
- 三、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邮。
- 四、所有来稿皆会送交本刊编辑委员会审稿，来稿采用与否由编辑委员会做最后的决定。若需要，编辑委员会可以要求来稿须作修改，再予以采用。
- 五、来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一概不退还稿件。稿件3个月没有回复，作者可另行处理。本刊将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适当修润，不愿改动者请事先说明。稿件一经刊登，致赠样刊五本，并付有薄酬。
- 六、本刊已授权台湾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将论文全文内容，制作成数位化检索资料库，收录于“CEPS中文电子期刊服务”，并以电子形式透过光盘、网络、线上资料库等公开传输方式，提供用户使用（包括检索、浏览、下载、打印、传输等）。一旦投稿本刊，即代表投稿著作之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经本刊刊登后，即授权本刊以“无偿非专属授权”之方式，让华艺数位公司将论文全文内容数位化处理，且为符合数据库之需求，得进行格式之变更。



来稿请寄：《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编辑部收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子邮箱：edureview@dongzong.my  
电话：03-87362337；传真：03-87362779  
联系人：沈天奇（董总资料与档案局）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撰稿体例

本刊为便利编辑作业，论文来稿应依照以下撰稿格式：

- 一、来稿首页列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服务机关、通讯地址和电邮。
- 二、各章节标题，依一、（一）、1.、（1）……等顺序表示。
- 三、中文标点符号，书名一律采用《》，篇名则用〈〉，引号采“ ”。
- 四、年代写法一律为“1990”，“1997”。
- 五、注释一律采同页注格式。
- 六、注释体例，格式如下：

## （一）专书

中文书籍：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八方文化，2006年，页112。

外文书籍：Asmah Haji Omar,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3, pp.29-31.

## （二）论文

中文论文：黄祯玉：〈独中教师是谁？——实然与应然的探讨〉，《新纪元学院学报》第5期，2008年，页69-77。

外文论文：Patt, John T. “Some Aspec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Malaysia”,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Papua New Guinea*, Vol. 9, No. 1, 1976, pp.3-15.

## （三）报纸

孙和声：〈种族、文化、认同与权力的纠葛〉，《东方日报》，第13版，2006年1月27日。

## （四）再次征引

1. 再次征用，可以简便方式处理，如：

注1：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八方文化，2006年，页112。

注2：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页112。

## （五）互联网资料

论文：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m\\_supplem\\_c.htm](http://www.cuhk.edu.hk/ics/21c/m_supplem_c.htm)），2005年10月，总第43期，读取时间：2007年10月1日8.30。

评论：黄孟祚，〈照顾病友的社会学习〉，《燧火评论》，（<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608/>），2015年6月8日，读取时间：2015年8月11日13.00。

新闻：〈大马等国正式签署跨太协议〉，《当代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29338>），2016年2月4日，读取时间：2016年2月4日10.33。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Publishe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主页 / Homepage: [www.dongzong.my](http://www.dongzong.my)

电邮 / Email: [edureview@dongzong.my](mailto:edureview@dongzong.my)

电话 / TEL: 603-87362337

传真 / FAX: 603-87362779

印刷 / Printer: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价: 马币12

Price: RM12

出版日期: 2021年12月 /  
December 2021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 (半年刊)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Semiannual)

出版人: 陈大锦

Publisher: Tan Tai Kim

### 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总编辑: 锺伟前

Editor-in-Chief: Choong Woei Chuan

执行主编: 沈天奇

Executive Editor: Shum Thin Khee

助编: 谢春美、林玉娟、张碧之

Editorial Assistant: Sia Choon Bee, Lim Geok  
Kian, Chong Pic Chee

### 编辑委员 Editorial Committee:

王桢文 Ong Chang Boon (大山脚日新独中校长)

刘荣禧 Lau Eng Hee (前马六甲州华校督学)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  
系助理教授)

张永庆 Chong Joon Kin (波德申中华中学校长)

陈炳易 Chin Peng Yee (美里砂拉越师范学院副院长)

林毓聪 Lim Yock Chong (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华文科  
科长)

梁胜义 Leong Seng Yee (董总执行长)

徐威雄 Ser Wue Hiong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  
高级讲师)

郭荣锦 Quek Weng Kim (前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助理  
总监)

蔡庆炆 Sua Sin Zang (芙蓉中华中学校长)

潘永强 Phoon Wing Keong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学术董事)

封面题字: 林源瑞

美术: 龚秀霞

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Publishe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本刊园地公开, 欢迎投稿。

惟作者自负文责, 其观点不代表董总的立场。

##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